目录

[达利欧：中美未来战争的可能形式及胜率分析 1](#_Toc52268783)

[前言 1](#_Toc52268784)

[正文 2](#_Toc52268785)

[注释： 45](#_Toc52268786)

[桥水达利欧最新作品：中美未来战争的可能形式及胜率分析！（深度长文！） 46](#_Toc52268787)

[前言 47](#_Toc52268788)

[我认为美中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48](#_Toc52268789)

[我关于国家力量的主要原则是： 49](#_Toc52268790)

[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51](#_Toc52268791)

[1、各自处境 52](#_Toc52268792)

[2、贸易/经济摩擦 55](#_Toc52268793)

[3、科技摩擦 58](#_Toc52268794)

[4、地缘政治摩擦 62](#_Toc52268795)

[5、资本摩擦 67](#_Toc52268796)

[6、军事摩擦 74](#_Toc52268797)

[7、文化冲突 77](#_Toc52268798)

[8、同自己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87](#_Toc52268799)

[大选将如何可能让美国崩溃 92](#_Toc52268800)

[中国大周期和货币 127](#_Toc52268801)

[1、背景 129](#_Toc52268802)

[2、中国历史简述 132](#_Toc52268803)

[3、中国的经验及运作方式 139](#_Toc52268804)

[4、从1800年到现在 148](#_Toc52268805)

[5、1800至1949的衰退 150](#_Toc52268806)

[6、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152](#_Toc52268807)

[7、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154](#_Toc52268808)

[**万千悲喜，唱罢古今。** 171](#_Toc52268809)

## 达利欧：中美未来战争的可能形式及胜率分析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f707c1d55cb4431efd0e7ff

作者：达利欧

翻译：投资山海经

### 前言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中美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对中美关系的意义。由于美国和中国现在在许多领域中都是强国，它们在这些领域中处于“冲突”或“战争”中，因此我们将研究它们的立场。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旧版本和经典冲突的新版本（例如，经典技术战争中的新技术，经典军事战争中的新武器等），因此我们将在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的背景下，以及我们从研究这些案例中学到的永恒和普遍原则。我将研究人们可能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将这样做，而不必深入了解未来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进行说明。在本章中，我还将从传达事实到分享观点（即分享我不确定的猜想）做更多的事情。（注意：我们对本系列中的章节编号进行了重新排序，使原来作为第二章附录的内容成为自己的一章。因此，本章是9月11日之后的下一部分评论“第5章：中国及其货币的大周期”，编号为第7章。）

与我的其他各章一样，**如果你想快速阅读本章，则可以阅读粗体字；**如果你想阅读原则，则可以阅读斜体字。

### 正文

我将首先介绍我的关于与所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等）有关的关系的三个原则，包括中美关系。像我的其他任何原则一样，你可以接受或随意保留它们。这些正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事实，并为我工作。如果你不感兴趣，请随时跳过它们。

我认为与中美关系有关的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相互威胁关系，尽管双方都需要就哪种类型的关系达成一致。***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主要的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他们将考虑对对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试图给予对方以回报。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尊重和考虑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在集贸市场上的两个友好商人或在奥运会上的两个友好团队一样竞争。如果他们选择建立双输互为威胁的关系，他们将首先考虑如何伤害对方，以期迫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境地，以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种类型的双输关系中，他们将比生产性交往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历史表明，小规模战争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而演变成大战争，甚至比选择这条道路的领导人都糟糕得多，因此几乎所有各方都希望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任何一方都可以迫使第二条路径在另一条路径上，而双方都需要遵循第一条路径。在各方的心中，无论他们选择哪种方式，都应将其作为相对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事方应意识到另一方可以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东西，并且在不太冲动的情况下欣赏交流的质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当事方应意识到权力将由承受痛苦的相对能力来定义。以及施加它的相对能力。当它不是不能确切地确定双方要奖励和惩罚对方的力量，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因为双方在如何伤害对方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第二条道路肯定会清楚地表明战争结束后，哪一方占主导地位，哪一方必须服从，这就引出了我的主要权力原则。

#### 关于权力的主要原则是：

拥有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会一直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这是因为，当压力来临时，那些既有权执行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又有权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权力的顺序如下：当出现分歧时，不同意的一方将首先尝试在不诉诸规则/法律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就自己该怎么做达成一致。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同意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些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尊重规则的人会诉诸于使用他们的权力。当一方诉诸权力，而争端中的另一方没有足够的威慑去屈服，就会有一场战争。战争是对相对权力的考验。战争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可以遏制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将是决定谁得到什么的任何必要条件。战争通常会确立一方的至高无上地位，随后将是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明显最强大的实体作战，直到这个实体不再是最强大的实体。那时，这一动态将再次开始。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将要失败的战争并不明智；最好是商定最佳解决方案（除非一个人想成为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即欺负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关系比双输关系的回报高得多。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硬实力”不是最佳途径，而使用自己的“软实力”更可取。[1]如果一个人处于两败俱伤的关系，则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摆脱困境，最好是通过分离，尽管可能是通过战争。为了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权力，通常最好不要表现出来，因为它通常会使他人感到受到威胁并建立自己的反威胁能力，这将导致相互威胁的关系。通常，最好将权力像一把隐藏的刀一样处理，在战斗时可以将其带出。但是有时候，在必须采取行动时，展示自己的力量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自己的谈判地位和防止争斗是最有效的。了解对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是什么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为之奋斗，以及他们将如何抗争。这一点最好是通过观察他们过去的关系类型和他们使用权力的方式，通过想象他们在追求什么，并通过反复试验来测试，可以最好地发现这一点。但有时相互测试也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使双方陷入艰难的境地，不得不在战斗和虚张声势之间做出选择。针锋相对的战争不断升级，往往使冲突超出双方合乎逻辑的要求。知道力量平衡在哪里，即知道在战斗中谁会赢什么，而谁输了什么，应该牢记在心，因为在考虑解决争端的“公平”方法时，当事方始终保持头脑中的平衡水平，例如在考虑谈判协议的条款时，应考虑战斗会导致什么结果。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拥有不需要的权力也是可取的。那是因为维持权力也要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和金钱。权力带来的是责任的负担。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大量权力是最好的，但我经常被权力较弱的人相对于更有权力的人是多么幸福感到震惊。在考虑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考虑何时达成协议和何时战斗也很重要。为此，重要的是想象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当一个人的权力最大时，使用自己的权力来谈判协议、执行协议或打一场战争都是可取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相对能力下降，则应尽早战斗，而如果它的相对能力下降，则应稍后战斗。当然，有时候战争是合乎逻辑的，对于保持或获得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所必要的。这使我了解了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 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具有旗鼓相当的权力，其中包括摧毁对方的权力时，除非双方高度信任，自己不会受到对方不可挽回的伤害或杀害，否则战争致死的风险很高。想象一下，你面对的是一个既可以与你合作，也可以杀死你的人，你既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们都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你和你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先杀了对方，那是因为生存至关重要，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杀死你，而且你也清楚在他们被杀之前杀死你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博弈论中处于这种位置的现象称为“囚徒困境”。因此，为避免致命的战争，有必要建立相互保证的保护措施，以防对手对彼此造成的生存伤害。建立利益和依赖关系的交换，使人们无法忍受进一步的损失，这巩固了良好的关系。因为a）大多数战争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强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结果不确定，b）战争的代价巨大，c）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它们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在你有信心不会遭受不可接受的损失的情况下，才必须加入，所以你必须认真考虑你到底要为什么而战

虽然在本章中我主要关注中美关系，但我们和全球决策者正在玩的游戏就像一场多维棋局，需要每个棋手考虑许多同样在博弈的关键参与者（即国家）的许多立场和可能的举措，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广泛的他们必须权衡的一系列因素（经济、政治、军事等），以使他们的行动顺利进行。例如，现在在这场多维博弈中的相关其他参与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他们都有许多考虑因素和组成部分会决定他们的行动。从我玩的游戏中（即全球宏观投资）——我知道为了做出成功的决定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是多么复杂。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并不比掌权者做的事情复杂，而且我知道我无法获得像他们所掌握的那样好的信息，所以我认为这很自大我比他们更了解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处理它。因此，如果我认为我比他们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处理这件事，那就太傲慢了。基于这些原因，我谦虚地提出我的观点。带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我将坦诚的告诉你们，我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

#### 中美的处境

在我看来，命运及其大周期的表现，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地位，他们带领美国经历了相互促进的大循环成功，这导致了过剩的后果，导致了许多领域疲软，同样，它们也导致中国经历了周期性的大衰退，导致了无法容忍的恶劣环境，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导致了它现在所处的相互促进的上升

例如，命运和巨额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陷入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在该阶段，美国债务过多，需要更多的发债，它不能用硬通货来偿还债务，因此它必须以经典的后期印钞方式将债务货币化，以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上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是美国成功导致这些过分行径的结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美元才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美国人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从中国）过度借贷，这使美国处于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很多钱的脆弱状态，并使这些其他国家处于持有债务的脆弱状态。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债务正在迅速增加并通过其货币化，并向持有债务的国家支付了显着的负实际利率。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经典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想在世界储备货币中节省很多，这导致它向想要借入这么多钱的美国人提供了如此多的贷款，这使中美两国陷入了困境。当这些战争在进行中时，笨拙的债务人-债权人关系就变得尴尬了。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了激励机制和资源的到位，促使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国内秩序，并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大实力所需要的生产力。在传统的中国经济衰退周期中，由于由于债务和资金薄弱，内部冲突以及与外国大国的冲突，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衰退，正是这些可怕条件的极端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激励机制和市场/资本主义方法的产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的财富，以及中国日益关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幸的境地：要么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要么选择撤退。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所以也是它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是保卫台湾，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何处，也无法拼出它的名字；二是因为这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美国现在在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它是这样这样做是不经济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取决于维持不断增强的力量，而不产生导致其衰败的过度行为。能够维持200-300已实属不易，但也没有国家能一直持续壮大下去。

到目前为止，在本书中，我们着眼于过去500年的历史，尤其着眼于荷兰，英国和美国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衰周期以及中国历代的1400年，这使我们进入了当下。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放在让我们来到这里的大背景下，并查看事物运行方式的因果关系模式，以便我们可以将自己置于更好的角度。现在我们需要下来，更详细地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希望不要忽视这一大局。当我们往下看时，TikTok，华为，香港制裁，关闭领事馆，移动战舰，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等许多细微的事物将开始变得显著，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暴风眼中。每件事情都能展开再写一章，在这里我不打算这样做，但我会谈谈主要的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种主要的战争类型：1）贸易/经济战争；2）技术战争；3）地缘政治战争；4）资本战争；5）军事战争。尽管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不会发生而是继续合作，但我们必须切实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应该利用过去的历史案例和我们对实际发展的理解来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我们看到它们在不同程度的游戏中发生。不应将它们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发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尝试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否在试图加快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还是他们试图缓解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战争，情况会更好）？为了防止这些冲突升级失控，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红线”和“绊线”是什么标志着冲突严重性的变化。现在，我们结合历史经验和他们提供的原则来审视这些战争。他们是在试图加速冲突（某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实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或者他们是否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不发生战争，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失控，两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红线”和“跳闸线”是什么，这标志着冲突的严重性发生变化。现在让我们结合历史教训和它们提供的原则来看看这些战争。

#### 1、贸易/经济战争

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能会从摩擦演变为威胁生死的对抗，具体取决于战斗方希望达到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美贸易战过于严重，它只包含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那些关税（例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Tariff-Act—of-1930））。我们已经看到贸易谈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该协定正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正在初步实施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谈判”是为了测试彼此的力量，而不是求助于全球法律和法官（就像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如何通过这些力量的考验，将会决定战争将如何进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力量考验将会多深入，将采取何种形式。

除贸易争端外，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还有三大经济方面的批评：

1.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发展的干预主义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国内产业。

2.中国政府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中国人正在窃取知识产权，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在政府的间接控制之下

总体而言，美国对这些事情做出了反应，既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例如，让他们向美国人开放市场），也做出自己的干预（对美国封闭中国市场）。中国人不会承认做这些事，因为承认做这些事的公关成本太高，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表现得像一支为正义而战的军队的领袖，反对做坏事的邪恶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双方指责对方做坏事，而不披露他们所做的类似事情的原因。作为一个原则…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保持道德高地是很容易的。然而，当斗争变得激烈时，就更容易为之前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尽管比称其为不道德的行为更道德）。当斗争变得更激烈时，在对所要做的事情的理想主义描述（对国家内部的公共关系有好处）与为赢得胜利而进行的实际事情之间出现了二分法。那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希望说服其选民“我们是善的，他们是邪恶的”，因为这是集会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为此而死或丧命。。虽然是真的，

关于贸易战，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贸易协定，而且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它可能会改善的可能性，而且，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所有的贸易谈判都将被搁置，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获胜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场冲突。这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应对正在展开的大周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两个政党都同意的一件事，也许是唯一的一件事，是对中国鹰派。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强硬派有多硬，以及这种强硬态度是如何表达和反应的。

##### 这场战争怎么会恶化？

传统上，贸易/经济战争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各国切断另一方的基本进口（例如，中国切断美国生产大量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国切断中国的基本技术和从其他国家进口基本产品（例如，美国切断中国从台湾进口半导体、从中东或俄罗斯进口原油，或是澳大利亚的金属））——就像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一样，这是随后军事战争的一个短期先行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向。我并不是说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但我确实想明确一点切断任何一方重要进口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重大规模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那没有发生，那么发展将遵循其正常路线，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将主要基于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竞争力而演变。

为这些原因两国，尤其是中国，都在转向更多的国内生产和“脱钩”[2]正如习主席所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的变化”，“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过去40年，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能力，未来五年，我们应该看到两国之间的相互独立程度会越来越高，很明显，在未来的5-10年中，中国可以减少的依赖减少的比率将比美国大得多。

#### 2、技术战争

技术战争比贸易战争要严重得多，因为谁赢了技术战，谁就可能赢得经济战和军事战。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大型科技领域的主导者，这些大型科技领域是未来的产业。中国的科技行业在国内迅速发展，为中国在中国服务，并成为世界市场的竞争对手。同时，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地区（例如台湾的半导体芯片）的技术。这使美国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的影响，并使中国人容易与美国或非美国必不可少的技术隔绝。

美国现在似乎总体上具有更大的技术能力，尽管它因技术类型而异，但美国也正在失去领先地位。例如，尽管美国在先进的AI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5G方面却落后。作为对这一领先优势的不完美反映，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两倍，而中国所占份额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所占份额。这一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营公司（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公司（即国企）的技术发展，它们在中国的规模比在美国要大。如今，最大的中国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和第七大科技公司，仅次于一些美国最大的“FAAM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正由中国人领导。例如，现在全球40％的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都在中国，中国在5G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它在AI/大数据竞赛的某些方面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其他技术中也存在类似的领先优势，例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金额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超美国。当然，有些技术，甚至是我们最知情的情报机构，都不知道它们在秘密开发。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其技术和其支持的决策质量。大数据+大AI+大计算=卓越的决策能力。中国人每人收集的数据远远超过美国（他们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多），他们在人工智能和大计算方面投入巨资，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投入到这些技术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至于提供资金，VC和政府都在向中国开发者提供几乎无限量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大学和从事科技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生的数量约为美国的八倍。尽管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当然也有一些新创新的大中心，特别是在顶尖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但美国并没有脱离竞争，它的相对地位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请记住，中国是一个36年前领导人对我给他们的掌上计算器感到惊叹的国家，想象一下他们36年后会在哪里，这并不遥远。

为了应对技术威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公司（例如华为，TikTok和微信）在美国使用，试图破坏其在国际上的使用，并可能通过制裁措施阻止它们获得生存权，从而损害其生存能力，阻止它们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美国这样做是因为a）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进行间谍活动，b）因为美国担心它们和其他中国技术公司更具竞争力，c）为报复中国人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免费进入中国市场吗？尽管这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正在迅速提高竞争力。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杀死威胁中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尽管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遏制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竞争，这无疑是一种威胁，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但不久前，中国已经开始对美国做同样的事情，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在许多方面都在不断完善，因此美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伤害。从惊叹于廉价计算器开始，它们已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

关于技术窃取，尽管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2019年CNBC全球CFO理事会（CNBCGlobalCFOCouncil）的一项调查中称五分之一的北美公司声称其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窃取了[3]），但确实存在没有完全说明针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如果一家公司在一个国家（例如，华为在美国）内违反法律，人们会希望看到这种犯罪行为被合法起诉，这样就可以看到证据显示技术中嵌入了间谍设备。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对竞争力增长的担忧是中国科技公司遭受攻击的诱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政策制定者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反对允许美国人民自由竞争，，而美国人民早已被教育认为，竞争既是公平的，也是产生最佳结果的最佳过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很难防止。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英国人对荷兰人和美国人对英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偷窃”意味着违反法律。当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就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而且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并不总是会被作出决定的人透露。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暗示美国采取侵略行动的原因不是很好的理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我只是说它们可能与所陈述的不完全相同。保护主义政策长期存在，以保护公司免受外国竞争。华为的技术肯定是有威胁的，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好。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并将它们与美国同类公司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没有在美国竞争。出于同样的原因，亚马逊和许多其他美国科技公司没有在中国自由竞争。在任何情况下，正在进行技术脱钩，这是中美之间更大脱钩的一部分，这将对五年后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战争的恶化会是什么样？

尽管如此，美国仍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尽管它正在迅速缩小）。因此，截至目前，中国对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非美国来源的进口技术的依赖性很大。这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脆弱性，为美国创造了强大的武器。最明显的是它存在于先进的半导体中，尽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术中。与世界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aiwa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Company）的合作关系是众多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该公司向中国和世界提供了所需的芯片，并且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对中国的福祉至关重要的此类中国技术进口有很多，而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从中国进口则太少了。如果美国切断中国对基本技术的获取，这将标志着战争风险的重大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事态继续如火如荼地发生，那么中国将在5到10年内比美国在技术上更加独立，而且地位将比美国强得多，届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技术更加脱钩。

#### 3、地缘政治战争

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海的主权，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百年屈辱”时期以及在此期间外国“野蛮人”的入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至今有充分的理由：a）在其境内拥有完全的主权；b）收回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中国部分地区（如台湾和香港）；c）永远不要软弱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被外国势力摆布。中国渴望主权并维持其独特的做事方式（即其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美国要求他们改变中国内部政策（例如，变得更加民主，以不同方式对待藏族和维吾尔族，以决定中国与香港和台湾的往来等）。一些中国人私下指出，他们并没有规定美国应如何对待其境内的人民。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倾向于传教，即将他人的价值观，犹太教-基督教信仰，道德和经营方式强加于人，以及他们的运作方式和这种倾向在几千年后形成的，从十字军东征前开始，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劝说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可能威胁到中国采取它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它的能力。中国人认为，他们拥有主权和处理他们认为的事情的能力是最好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也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会推翻他们的政府，即中国共产党，如果可以的话，这也是不可容忍的。[4]这些是最大的生存威胁，我相信中国人会死而复生，美国要想防止热战，就必须小心对待中国，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希望通过战争以非暴力的方式影响他们，但要避免热战

很难想象和平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将永远不会兑现其暗示的承诺，除非被迫，否则不会允许台湾和中国统一。他们指出，当美国出售台湾的F-16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美国看起来并不是在促进实现和平的既定目标中国的统一。因此，他们认为，要保证中国的安全和统一，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反对美国的力量，希望美国在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大国时，能明智地默认。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更强。同样，中国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强大。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场新的主权之争，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台海危机”，我将非常担心。美国不参战将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帝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和其他地区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扩大远远超过了损失。例如，在英国的情况下，这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为捍卫台湾所做的努力越多，失败的战争或撤退就越受屈辱。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捍卫台湾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优势，而命运似乎正在使这一现实更加接近现实。如果美国真的打仗，我相信一场以牺牲美国人生命为代价的台湾战争在美国将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导致一场更广泛的战争，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希望对那场伟大战争的恐惧和它将产生的破坏，就像对相互保证的毁灭的恐惧一样，能够阻止它。

同时，从我的讨论中，我相信，中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想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想强行控制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希望尽其所能并影响其地区内的国家不同）我知道，中国领导人知道热战有多可怕，也担心无意间陷入一战的泥潭。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希望建立合作关系，我怀疑，他们很乐意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红线”（即，如果越过红线，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未来会有更具挑战性的时期。例如，正如习主席在2019年新年讲话中所说的“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充满信心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5]

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领域是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是基于邻近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离他们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获得必需品（例如，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被切断必要的矿物和技术），以及其次是他们的出口市场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领域是第一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其边境（如中国海）和关键供应通道（如“一带一路”国家）或主要进口产品供应商的国家，以及对同盟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其他第三国。

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活动得到了显著扩展，这些活动是经济性的，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如贷款、购买资产、修建道路和体育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而这些活动都是经济活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允许中国人在其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敌对国家建立类似朝贡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离中国越近，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正在努力解决与美国或中国结盟是否更好的问题，而最接近的国家则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多的考虑。在与世界不同地区的领导人的讨论中，我反复听到有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经济和军事。他们几乎都说，如果要根据经济来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对他们更重要，如果他们在军事支持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时，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保护他们。大多数人怀疑美国会为他们而战，而亚太地区的一些人则质疑，如果美国愿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获胜。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意义重大，其运作方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主要国家提供经济利益以帮助确保理想关系的方式大致相似。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消失。几年前，美国没有重要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发现大多数国家会遵守；唯一的敌对国家是苏联（它不是什么竞争对手），它的盟友以及一些不是经济对手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等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其中大多是美国在世界秩序建立之初设立的，随着美国的不断退出，这些组织逐渐弱化，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5-10年中，除了在其他领域存在脱钩[3]之外，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这些领先大国保持一致。除了金钱和军事实力，中美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利用其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的建立方式，即风格和价值至关重要。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听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将两国领导人描述为“残酷的”，这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他们不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意愿去做，就会受到惩罚，他们也不喜欢被逼入对方的怀抱。看看这些联盟会是什么样子是很重要的，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实力较弱的国家的联盟所击败，而这些国家的联合体又是共同强大的.或许最值得关注的关系是中俄关系。自1945年新世界秩序开始以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者中有两个结盟，共同制衡或制衡第三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各自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例如，来自俄罗斯的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以及来自中国的对俄罗斯的融资）。另外，由于俄罗斯军事实力强大，因此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通过观察这些国家是否在与美国或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例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外，两国当然还有很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和机遇。那是因为有不同的派别在争夺对两国政府的控制权，领导人的更迭必然会带来政策上的艰难变化或者不可能预料到。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料到，这些变化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预料到的，因为无论谁掌权，都将面临现在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正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周期方式展开。因为所有的领导者（以及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这些进化周期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都会在这些挑战的不同部分上下功夫周期，他们（和我们）都有一系列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其他人在过去的周期中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研究这些人在类似阶段遇到了什么，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遭遇，并运用一些逻辑，我们无法完全想象各种可能性

#### 4、资本战争

资本战争的两个主要风险是被资本拒之门外（对中国而言，这比对美国的风险更大），以及丧失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国而言，对中国的风险更大）。

在第5章中，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战争动作。这些都是中美冲突中的可能性。这些举动的现代术语是“制裁”。目的是将敌人从所需的资本中切断，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权力。制裁有多种形式，其大类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在每个类别下都有许多版本和应用程序。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000项制裁措施。[7]我将不深入研究各种版本和目标，因为这太离题了。要知道的主要是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制裁手段。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最大，并且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通过阻止金融机构通过威胁与目标实体打交道的财务指示与全球金融市场隔离，防止金融机构与他们进行交易，从而使大多数实体无法从中获得金钱和信贷。这些制裁绝不是完美的或无所不包的，但通常是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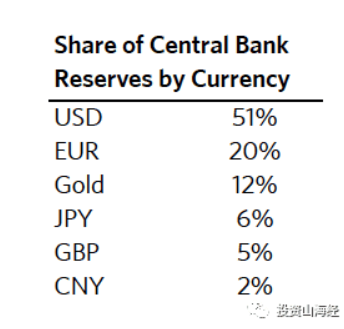
由于金融市场制裁是如此有效，它们自然会导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其伤害的国家采取措施绕开它们（例如，通过开发替代支付系统）或破坏美国施加制裁的权力他们。例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遭受这些制裁，而面临更多制裁的风险更大，它们现在都在发展并与对方合作开发替代性支付系统。中国的中央银行将很快成为第一个提出数字货币的主要中央银行，这将使其使用更具吸引力。使中国的货币成为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而以美元为代价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将需要时间，并且应被视为未来五年中两国关系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的最大力量来自能够印制世界货币（即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操作能力（例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美国有失去部分这种权力的风险，而中国有能力获得其中一些权力。那是因为购买和持有美元债券的愿望正在减少，原因是：a）外国人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例如中央银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数额过大基于许多关于储备货币持有量应有的良好长期措施，[8]b）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银行正在以惊人的快速步伐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的数量，如果没有美联储将其大量货币化，将很难找到足够的需求量，c）持有该债务的财政激励措施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和名义实际收益率可忽略不计，d）并且在潜在的战争时期，将债务作为交换手段或作为财富储备持有是比和平时期更不可取。此外，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债务（顺便说一下，仅相当于约27万亿美元未偿债务的4％）是相关风险。另外，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以针对他们采取，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增加这些资产的其他持有人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从而减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另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和运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其资金流动实行管制和/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这使得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不那么受欢迎。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美元贬值的影响正在累积。同时，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这使得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测试以下限制：a）可以同时产生多少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b）实际回报下降且为负；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通过资本管制加以限制），以及d）法定货币体系。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少，也无法说到极限。到那时，修复为时已晚。从我对存在这些条件的过去历史极端案例的研究以及对美国货币和债务的当前和即将出现的供求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债券的购买者正在测试在不破坏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可以从储备货币中挤出多少货币和信贷的限度。从与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交谈，包括那些现在正在执行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以及那些在过去做过的人，没有一个我与之交谈过的一个人，当他出示证据时——即与当前案件相关的历史案例和当前美元计价货币和债务的供求状况——都不同意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领域，并在测试可能的极限。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美元的价值或作为储备货币将大幅贬值。美元和美元债务的情况与利率的情况类似（并与之相关）。如果几年前你问过是否会达到这些极限，即我们的名义和实际值是否为负长期利率，在资本市场上，债务和借款数额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没有实施资本管制来迫使这种情况发生——所有这些知识渊博的人都会说“难以置信”。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持有人和买家债务将接受这笔交易，而不是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领域。人们会看到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时最大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规模如此之大，而利率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战争年代，需要政府资本管制，利率目标明确）看看最通货紧缩和最萧条的经济时代，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所以“难以置信”是一个明智的评估，但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通过观察谁购买了什么原因的物品，我们可以了解原因。但是，这一经验教训与在市场上定期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这就是说，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比人们预期的发生得更多。因此，尽管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测试极限，但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说美元将是很快就会减少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我们可以识别出它出现时的样子，并知道，如果它出现，它可能将无法停止。当债务持有人将资产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他们将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聪明的债务人将大量借入美元债务，这些债务人将利用廉价的资金来获得更高的回报，而这些举措将要求美联储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a）允许利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水平（因为这种上升会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以及b）印制钞票购买大量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的实际价值债务。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它看起来像是经典的货币防御。如该章所述，面对这种选择时，中央银行几乎总是印钞，购买债务并使货币贬值，这变得自我强化，因为所收取的持有货币的利率不足以补偿货币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建立新的国际收支水平的水平为止，这是一种花哨的说法，直到有足够的强迫出售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以及美国人充分抑制购买这些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为止。他们可以用更少的债务来支付。

关于美元，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替代货币来替代它，美国怎么会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因此，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在当前持有的外汇储备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由于历史原因和影响其相对吸引力的基本因素，这六种货币被用于这些数量。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储备货币的使用，就像一种语言的使用一样，由于货币的使用不容易改变，所以使用储备货币的根本原因要滞后很多年.目前使用最多的四种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是1945年后旧的主要帝国，尽管它们的基本吸引力有限。它们来自G5国家，与G5一样不合时宜

至于每种货币的基本吸引力：

•讨论了美元，所以我不再赘述。

•欧元是一种结构薄弱的货币，这些国家是由货币联盟长期束缚在一起制造的，该货币联盟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在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弱势。

•日元是一种在国际上没有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的货币，它面临着许多与美元相同的问题，包括债务过多且增长迅速，货币化使其支付的利率不具吸引力。而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领导力量

•英镑是一种过时的货币，其基本面相对较弱，而在我们对一国的经济/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多数衡量中，该国相对较弱。

•持有黄金是因为它在最长的时间内表现最好，并且像英镑一样，因为它是从过去的时间（即1971年之前，当时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持有的。黄金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之前所说的法定货币被套印的弱点。同时，由于黄金市场规模有限，黄金的规模也有限

•人民币是唯一一种被选为储备货币的货币，因为它的基本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最大，经济大体上是最大的，它设法使其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对稳定，而且它的储备和其他优势都很大，而且它没有0%的利率，没有负的实际利率，也没有债务问题的印刷和货币化，尽管它有很多的国内债务需要重组，但它的缺点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它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自由浮动，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必须得到更好的发展，它的清算系统还不发达，它还没有建立起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表明，每当不希望使用货币时，都会将其出售并贬值，并利用资本寻找其他投资（例如，黄金，白银，股票，房地产等）进行投资，因此一种货币的贬值不需要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性外汇市场在没有其他货币储备的情况下，它可以看到另一种货币储备的减少

如果美国不破坏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它们将有可能迅速发展，并与美国的货币和信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你不会一次看到所有这些，但是你会看到它在接下来的5-10年中以惊人的快速发展。如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所示，发展与事物的自然弧线是一致的。同样，如果中国人继续实行稳健的政策并良好地发展自己的市场，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具有重要的增长潜力，因为相对于其基本面而言，投资不足。例如：

•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两者约占全球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的13％，而人民币仅占世界贸易融资的2％，而美元则占50％以上。增加贸易融资在人民币中的比重很容易。

•尽管中国约占世界GDP的19％[9]（并且其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并拥有约15％的全球股票市值，但在MSCI股票指数及其资产仅占投资组合中外国资产的2％。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总体上占世界GDP的20％，并且增长速度较慢，但它现在在MSCI股票指数中的权重超过50％，在非美国货币中的比重约为48％。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因为投资落后于发展，特别是对外国投资者而言。

正如之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的发展中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世界领先的资本市场以及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发展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步领先的帝国，传统上落后于中国的基本面，就像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以及程度较小的香港和深圳）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一样。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似乎有可能再次被迫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选择：a）通过对战争变得更具侵略性（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更具侵略性的资本战争）来破坏这一进化道路；b）接受进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大、更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以牺牲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为代价的挤压，尤其是在未来5-10年我们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限制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举措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危害微乎其微，但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股票交易所的竞争力，这将支持中国和其他地方交易所的发展。例如，蚂蚁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交易所上市，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这些中国交易所，也可以错过这些投资，在那里上市，而不是在其他交易所上市

#### 5、军事战争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会与军事专家交谈，并且我会对此主题进行研究，以便我能沿用所提供的知识。服用或自担风险。

不可能想象下一场大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是因为许多武器都是秘密研制出来的，而且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并投入使用以来，各种形式的战争中，制造痛苦的创造力和能力都有了极大的增长，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更多的武器系统。当然，核战争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我听说生物、网络、化学、太空和其他类型的战争也有同样可怕的前景。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测试，因此它们将如何运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头条新闻是：a）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战争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极限，b）中国在军事上比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东海和南海，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输掉一场战争，而c）美国在全球和总体上更强大，并且可能“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d）尽管一场更大的战争过于复杂，无法想象，因为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秘密存在的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都同意的唯一一点是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中国的军事力量改善速度，与其他改善速度一样，非常快，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b）未来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更快，特别是如果其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5-10年内获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台湾，东海和南海以及朝鲜是最大的热点，而印度和越南则是第二大热点（原因我将不赘述）。

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大热战而言，它将包括所有上述类型的战争，再加上最大程度地进行的战争，因为在为生存而战中，每一种战争都会像历史上其他国家那样，向对方倾尽所有，所以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致命得多，因为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可以互相伤害。

在考虑战争的时机时，我牢记一个原则当国家内部出现大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有利时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国家面临萧条和冲突的挑战时，日本采取了控制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行动，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当出现领导层过渡和/或领导力能力薄弱，同时出现重大内部冲突时，应认为敌人采取进攻行动的风险会增加。但是，如果中国在选举前的形势有所好转（例如，在选举前，中国的形势可能会有所改善，5-10年后，中国可能会更加自给自足和更加强大后再进行战争不迟），而美国可能会更加希望早日发动。

我现在要添加其他两种类型的战争：1）文化战争，它将推动双方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包括他们宁愿死而不愿放弃的条件；2）与自己的战争，这它将决定我们的有效性，这将导致我们在我们之前探索的关键方式上的强弱。

#### 6、文化战争

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共同面临的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是决定他们如何相处的最大因素。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如何相处，这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冲突时将如何处理对方。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将为之奋斗并为之奋斗，因此，如果我们要和平解决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是什么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它们。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做出大多数决定，要求高水平的文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孝敬等级制度中的上级，他们还追求“以德治国”“无产阶级”，通俗地说，生产力创造的机会和成果的利益是广泛分配的。相反，美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管理国家，要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偏爱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崇尚革命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所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差异中的大多数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共同信念而言，它们通常并不十分重要，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众多的共同信仰，而且这些信仰并不是所有中国人或所有美国人都持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得很自在，反之亦然例如，中国人在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其他领域的治理体系更像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件事，在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它们是决定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性分歧。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理解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产生相似愿望、产品和结果的类似经济自由）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在方法上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它们经常反映在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领导人到政策制定者的层面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是很小的，有些则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会为之奋战至死、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而个人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像集体稳定那么重要。

这些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差异上，比如说，中国政府更像家长，规定孩子玩什么样的电子游戏，每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他们不受政府监管，因为这被认为是父母个人的决定。有人可能会争论这两种方法的优点。中国的等级文化使得中国人很自然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国的非等级文化则让他们这样做对于美国人来说，在是否这样做的问题上与他们的政府抗争是可以接受的。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影响着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他们必须戴上面具来回应COVID-19的反应，这导致了二级后果，因为中国人遵守指令，而美国人不遵守——案件数量、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等。这些文化决定的处理方式差异影响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许多事情的不同反应，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自由媒体，等等-这些加起来有很多不同的运作方式

虽然这些不同的文化处理方式有利弊，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它们，但我确实想了解一下这一点使美国人成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换言之，人们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信的人们相处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鉴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录及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可能性，不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多试图迫使中国人和他们的制度更加美国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对他们最基本的信仰的征服，他们将为保护这些信仰而战斗到底。为了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美国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人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有能力，明智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比让普通民众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更可取，因为他们认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能力都较低。大多数人认为，一般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和那些寻求当选的人会给予什么来选择领导人他们是为了购买他们的支持，而不是什么对他们最好的，例如，一般的投票人群会选择那些会给他们更多钱的人，而不在乎钱从哪里来。而且，他们相信柏拉图所相信的，就像在几千年来从民主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的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最近发生在1930-45年期间）民主国家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很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而人们却为应该做什么而争吵，而不是支持强者，他们还相信，他们的领导人选拔制度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多代人的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任期都只是沿着这条发展路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10]他们认为，对集体最有利，对国家最有利，最能由高层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是大公司特别是多代公司的典型治理方式，因此，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制度遵循这种做法的基本原理，也很难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民主决策过程的挑战；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争论，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选择是在a）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做各自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利和b）让中国人和美国人战斗为了他们认为不可妥协的东西而死

就两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手段而言，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手段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历史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导致的，穷人、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共产主义；2）典型的权利（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无论谁在制度上取得成功，以及更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并且在所有社会都有波动，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倾还是右倾是不对的。在其有限的历史中，美国人的偏好也存在着类似的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历史更长，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历史悠久一样，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更大范围的波动。基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比核心价值观正在演变的趋势更大的周期性波动。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现在正在两国发生，所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翼”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与此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的文化倾向和自下而上的、不分等级的文化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中，美国人自下而上/不分等级的文化倾向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身上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终会胜出，我将把它留给其他人来讨论，希望没有偏见，不过我要指出，大多数有见识的历史观察家都得出结论，认为这两种制度都不总是好是坏什么是最有效的取决于a）环境和b）人们使用这些系统的方式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系统可以持续地运行良好，事实上所有系统都会崩溃，如果a）系统中的个人对它的尊重不超过他们个人想要的；b）系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被破坏。

因此，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星球上发展，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愿为之牺牲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引导他们走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都会为a）拥有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而战斗到底；b）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权利和能力来阻止这种权利。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a）对权威的尊重，这体现在当事人的权力上，（b）要求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最近发生的这种文化冲突的例子发生在2019年10月，休斯敦火箭队（DarylMorey）的总经理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运动很快就撤下了自己的微博，并解释说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球队的观点或NBA的观点，莫雷随后遭到美国方面（即媒体、政界人士和民众）的攻击，因为他们没有站出来支持言论自由，也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攻击，中国方面追究全联盟的责任，并对其进行处罚，从中国国家电视台撤下所有NBA比赛，从网上商店拉NBA商品销售，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因为他表达了批评的政治观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美国人认为个人所属的组织不应因个人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中国人则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需要受到惩罚，而个人所属的群体应该为其中的个人行为负责。人们可以想象，由于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存在差异，在更大的情况下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举个例子，中国人在上位的时候，往往希望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让处于从属地位的党知道自己处于从属地位，服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领导的文化倾向/作风，他们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例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第一波COVID-19疾病和死亡的大浪潮中急于获得个人防护设备，却无法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来源获得，我向我的中国朋友寻求帮助，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这是中国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国的文化差异，但他们中的许多国家都很难达成共识走开

我想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和接受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中国人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因此，问题是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是应该与中国人战斗，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不干涉对方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a）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们强烈认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太困难、不恰当，而且可能是不可能的；b）归根结底，美国有能力把事情强加给中国人，而中国能够把事情强加给美国，这将是我们亲戚的一个功能权力

在思考我们可能达成一致的实际原则时，我想知道美国人、中国人和你我是否能就那些真实的原则达成一致（抛开我们是否希望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够，这将有助于确定我们期望的前进道路

•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立场，而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了自己的地位。如果有人质疑谁有什么权力，就会有一场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理想的情况是没有激烈的战争，但当不清楚和重要的时候，它通常不会和平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会弄清楚谁拥有什么权力，所以如果那些权力较小的人知道他们的权力较小，他们就应该溜进从属地位，这样权力和地位的改变就不会发生战斗，如果他们拒绝进入在从属地位上，会有争斗和对弱者的痛苦的打败，这就是权力交接如此痛苦的原因

•国际关系中唯一真正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因为国际上没有相互商定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没有其他的规则可以用来判断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惩罚那些不公平的，比个人力量更强大的人，最重要的是你是赢还是输。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人排成一排准备战斗，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开枪，英国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革命党人获胜，认为英国人愚蠢，新兴的美国人做了正确的事。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能不能同意，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应该停止抱怨对方的不公平行为，而应该专注于聪明地玩游戏来处理发生的事情？

•在那些最愚蠢的事情中，赢得金钱比失去生命更重要

•在国际关系中，除了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外，没有其他规则（例如，关于战争中道德的规则），但有不同的方法更有可能导致更好的结果。例如，有些方法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赢结果，有些方法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输结果，而那些更有可能导致双赢结果的方法则更好。为了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我们需要在考虑到对另一方和自己要知道如何交易这些好。[11],[12]

•我太容易陷入愚蠢的战争（即，比任何理智的人都认为值得的战争）更容易陷入愚蠢的战争中，因为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权力下降的代价，以及d）决策必须迅速时存在的误解。关于囚徒困境，想象一下，你面对的是一个既能与你合作，也能杀死你的人，你既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们都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在对方杀了对方也是最重要的，但你也要知道自己是最重要的，尽管你知道在你杀死他们之前先杀了你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通常会陷入的情况；他们需要有办法确保对方没有办法杀死他们，以免走上试图先杀死他们的道路。愚蠢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要求每一方升级或失去敌人在最后一步行动中捕获的，并被认为是软弱。为了和平的胜利，双方都必须避免这些。与此相关的是，衰落的帝国倾向于与崛起的帝国作战，这是因为作战/撤退的计算往往会导致一个人更倾向于战斗，而不是仅仅根据预期的结果来进行战斗，因为撤退就是失败例如，尽管美国为保卫台湾而战似乎不合逻辑（例如，如果美国有70%的可能会失败），如果美国不为盟友而战并赢得胜利，那么，如果中国不支持美国，那么如果美国不为其盟友而战并赢得胜利，那么这些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就会大打折扣。此外，这样的失败会让领导人在本国民众面前显得软弱，从而失去他们继续执政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还有，当冲突迅速发生时，由于误解而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动态都会产生对战争加速的强大吸引力，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诉求增加了愚蠢战争的危险，所以最好是a）让领导人如实、深思熟虑地解释形势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在一个民众意见很重要的民主政体中尤其重要）或b）选出最好的领导人最糟糕的是，让领导人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不诚实、情绪化。当民众被激怒并想打仗时，战争的风险就会超出逻辑范围。政治领导人通常会激怒民众，以获得政治支持。因为负面情绪需要时间来扭转，它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危险。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发生，例如，在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中，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3%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中国促进人权，50%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让中国对它在COVID-19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负责”。[13]虽然我没有对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民意调查，但很多人告诉我，美国的情况已经恶化了，只要这些人要求加快冲突的速度，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打仗和赢得战争的最聪明的方法是在竞争中战胜对手，以便有实力与他们谈判。我们是否可以同意，a）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体制和能力的竞争中，b）双方不可避免地会遵循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体制，c）美国人在权力上稍有领先，但这种领先地位正在缩小，而且他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因素（如17我在第1章中指出，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人口较少的帝国，如果他们管理好自己，也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这一切都意味着，坚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

#### 7、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使我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战争

与我们自己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最能控制自己的强弱。因为很清楚是什么让国家强弱，而且这些强弱是可以衡量的，很容易看出每个国家的情况。第一章列出了这些因素，并用17个指数衡量。我将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然后在最后一章“未来，“我将展示大多数国家的这些指数，并探讨其领先指标，以便我们对未来作出预测

建立一个伟大帝国最重要的东西是…

•…足够强大和有能力为成功提供基本要素的领导能力,其中包括…

•…良好的教育我所说的强教育不仅仅指传授知识和技能，我还指教…

•…坚强的性格、礼貌和强烈的职业道德在家庭和学校里都有人教，这会提高礼貌，反映在诸如…

•…低腐败以及高度尊重规则，例如法治.

•人们能够很好地一起工作，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下，他们应该如何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当人们有知识、技能、良好的品行、有礼貌地一起工作时，还有…

•…良好的资源配置系统，这一点通过…

•…对最好的全球思维持开放态度,国家拥有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会导致他们获得…

•…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带来的收入大于开支，这导致他们…

•…收入增长强劲，这样他们就可以

•…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教育系统和研发，这导致他们…

•…快速增长的生产力（每小时工作更具价值的产出）。提高生产力是增加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手段。当他们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时，他们可以成为…

•…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都是有价值的。随着国家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它们自然会获得…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这要求他们有…

•…强大的军队为了保护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影响那些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

•…强大、广泛使用的货币、股票和信贷市场自然，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被更多地用作首选的全球交换媒介和财富的首选储藏库，这导致他们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并建立了

•…至少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资本，扩大全球贸易

正是通过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加强和坚定不移的改进，各国才得以崛起并保持其实力

同时，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会播下周期性衰退的种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现为…

•…竞争力下降因为…

•…成功和富有会让一个人被新兴竞争对手模仿导致…

•…不那么努力地工作，更悠闲地从事更少的生产活动尤其是…

•…新一代、不那么坚强的一代人从那些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努力工作以获得成功的人手中接过了缰绳，而且，成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全球强国也会导致一个…

•…有储备货币的，这给了一个…

•…能借更多钱的“过高的特权”，这导致…

•…欠外国人的债越来越深它维持着他们超越基本面的力量，为维持帝国所需的国内过度消费以及军事和战争开支提供资金。当最富有的人通过向最贫穷的人借款而负债时，这是相对财富转移的一个非常早期的迹象

•债务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济成功既导致了金融泡沫，也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人们从中受益过多所以…

•…当经济压力很大时，贫富之间的冲突会更大，先是逐渐加剧，然后逐渐加剧，这导致…

•……政治极端主义加剧，即左派（寻求重新分配财富的人，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和右派（寻求将财富保持在富人手中的人，例如资本家）的民粹主义-这导致…

•……富人担心他们的钱将被带走和/或受到敌对对待，这导致他们将钱和自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中，如果允许的话，继续导致...

•……相对于支出需求减少税收，这导致……

•……更大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税率，导致……

•……在那些被征税，花钱和提供工作的人要离开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过程。导致...

•……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使状况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提高了税率和赤字，造成了更多的空心化。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央行为了尽可能刺激债务增长而压低利率，央行失去了用硬通货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所以…

•…当经济衰退时，a）更多的内部争夺货币，b）更多的中央银行印钞，最终使货币贬值。

•因为维持帝国的军费比维持帝国的财政收入要大得多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在财政上的主导地位，削弱了它在国外的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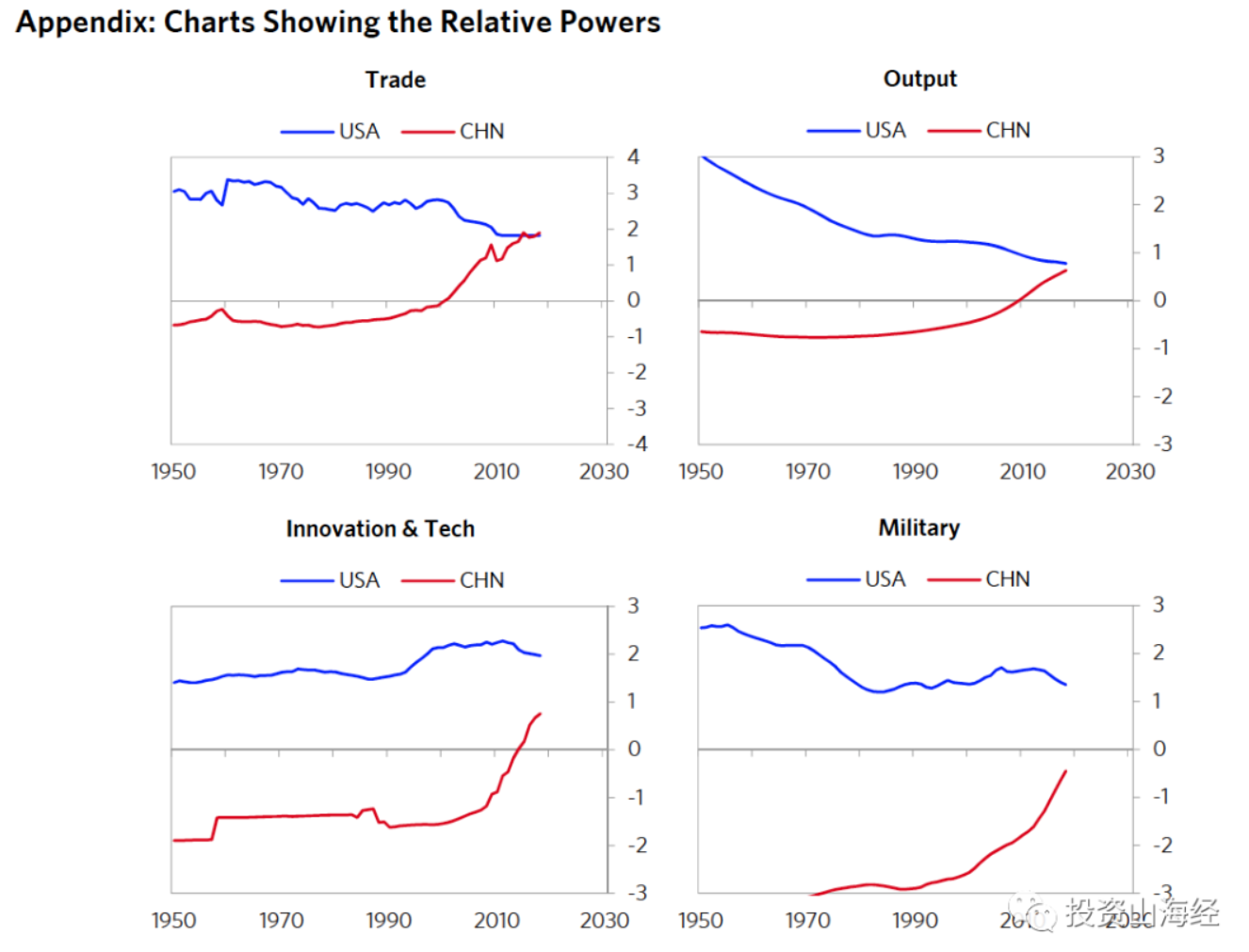
•这些破坏性的条件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从而缩小了经济蛋糕，并引发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分配日益萎缩的资源的更多冲突，这导致了更多的内部冲突，越来越多地导致双方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他们想要控制局面以实现秩序。这是民主受到专制制度最大挑战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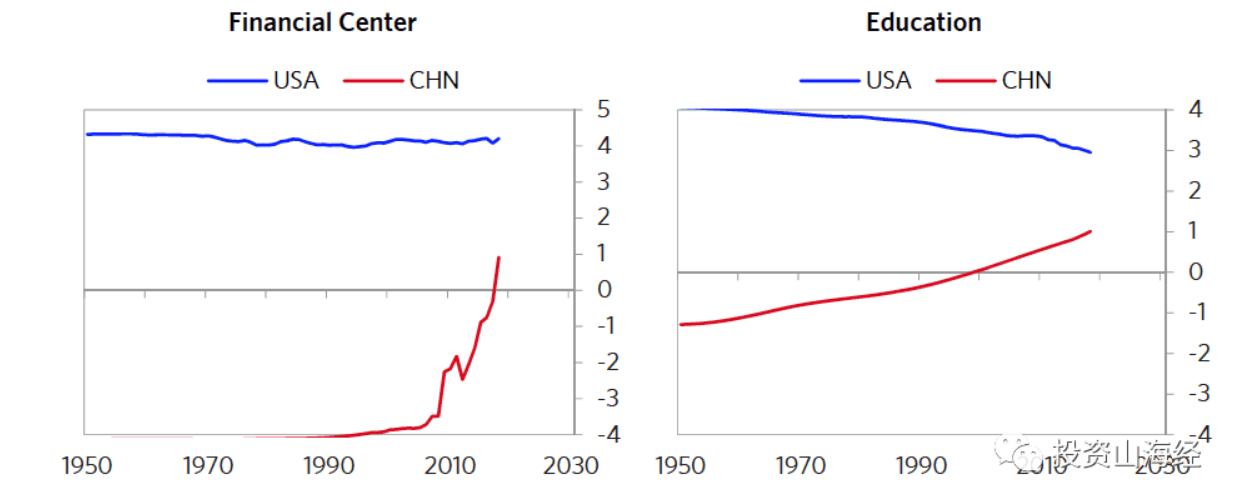
•一个正在崛起的竞争性国家通常会获得足够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便在其疲软时期挑战现有的主导力量。在国际上，新兴国家A）更有效地竞争，以赢得市场和领土影响；b）填补撤退国留下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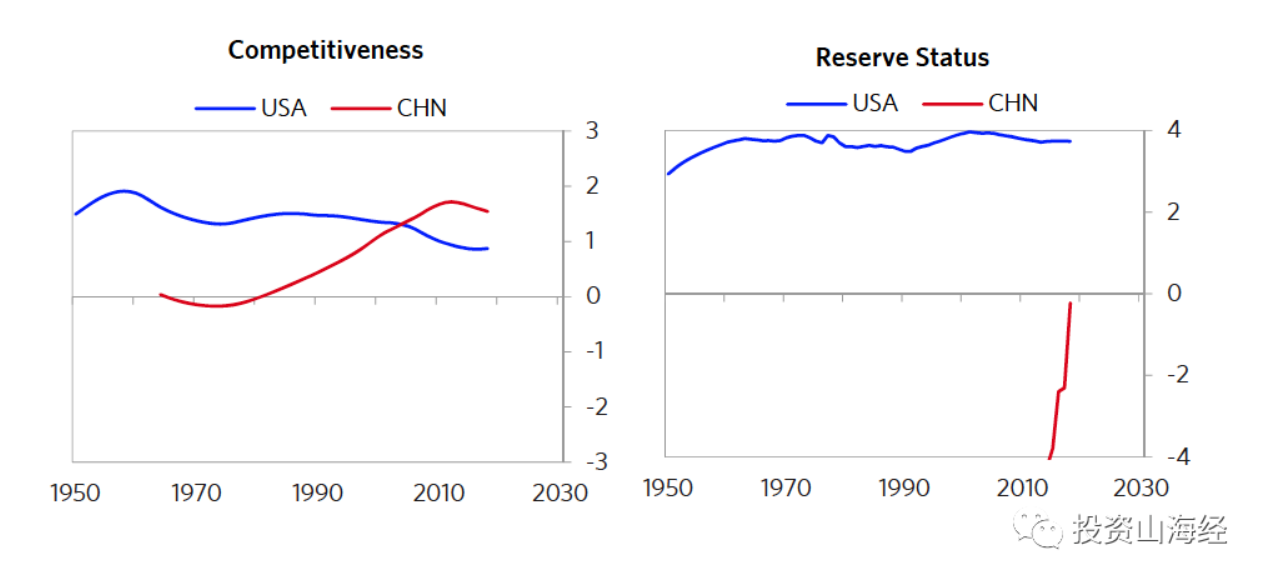
•其他外部冲击，如自然行为（例如，瘟疫、干旱或洪水）可能发生在脆弱性时期，一旦发生，就会增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的风险。

中美两国的内部战争和挑战比外部战争和挑战更为重要和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内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战争，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例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战争，民族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是可以测量的，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做出改变，使这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正如丘吉尔对英国人民说的：“值得胜利！”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探讨国家内部秩序的形成和丧失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试图展望未来。以下图表显示了我们对美国和中国八大最重要大国的指数。它们你自己说吧。我会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发展。







### 注释：

[1]例如，尽管我一直拥有并保留着在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专制地做出决策的所有权，但我选择不使用这种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我创建并运行了一个理念－精英体系（在《原则》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在保持极高的标准的同时，我也选择对与我共事的人更加慷慨，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产生我们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关系和结果，这比我更有力地运用我的“硬实力”要好得多。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良好的人际关系给予一个人巨大的力量，它们本身就是极好的回报。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没有什么比那些关心彼此、愿意付出一切的有能力的人的合作更强大和更有回报的了。

[2]建立自给自足的主要计划以“双循环”为名

[3]https://www.cnbc.com/2019/02/28/1-in-5-companies-say-china-stee-their-ip-within-the-last-year-cnbc.html

[4]人们普遍认为，“政权更迭”是美国管理世界秩序的常用手段。

[5]这番话是特别针对台湾统一问题发表的。

[6]脱钩虽然是必要的，但很难实现，而且会导致效率大幅降低。一位知识渊博的认识将其描述为条块分割而非基础广泛的脱钩，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7]参见：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9/05/why-united-states-uses-announces-so-much/588625/

[8]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所占的份额很大，这与a）国际投资者为平衡其投资组合而持有的资产配置比例，b）适合于满足贸易和资本流动资金需求的储备货币持有量，c）美国债务市场资本化的相对规模对于其他市场的资本化，以及d）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规模和重要性。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现在不成比例地庞大，因为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得它被视为比实际更安全的资产，而且，由于美元借款规模过大，现在，负责确定其在不同市场的持股比例的人，大多不倾向于根据将要出售的美国债券的数额增加股份，事实上，他们正在考虑减少在美国持有的股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需要美联储进行更大规模的购买。

[9]平价调整后的购买力。

[10]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解决美国政策和方向缺乏连续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他们选择代表哪些人来代表美国公众，这似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转变。

[11]举一个过于简单的双赢方法的例子，如果每个国家选出他们想得到或希望受到保护的前十项，，并在这些东西上加上100分来表达他们有多想要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交易。例如，我预计，在中国的清单上，最重要的将是与台湾的统一，事实上，他们会为此而开战。我无法想象，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的清单上几乎是同样的高，而美国的清单上的东西会非常高，所以他们应该愿意用它来交换，让双方都高兴。

[12]虽然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我希望能够利用深思熟虑的分歧的力量来处理美中战争。例如，我想象如果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能够公开发表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分歧，比如总统辩论，那将是多么美妙啊，我相信，这将使我们更加了解，更有同情心，并增加和平解决的机会。

[13]<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

## 桥水达利欧最新作品：中美未来战争的可能形式及胜率分析！（深度长文！）

https://wemp.app/posts/a79f0585-4bba-46e5-a583-3f65a5a620e7

达利欧先生在9月25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这个主题也恰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外交、产业、经济金融方方面面最为核心的主题，对于中美关系究竟走向何方？这一我们作为投资者存在诸多困惑的领域，达里奥先生以非常客观、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对中美实力对比给出了一些非常有参加价值的度量指标。

### 前言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中美当前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由于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竞争和摩擦，因此我们将研究它们的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眼之所见的只是各种传统而经典的冲突形式（如现代科技背景下的传统科技摩擦，现代装备下的传统军事摩擦），因此我们将通过历史规律寻找出一些永恒和普遍原则。尽管我会研究不同的可能性，但本章还不会涉及对未来的猜想，这部分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进行说明。在本章中，我还将在传达事实的基础上更多分享观点（即分享我不确定的猜想）。（注意：我们已重新排列了本系列中的章节编号，使原来作为第二章的附录成为其自己的章节。因此，本章是9月11日“第5章：大周期”观察之后的下一部分。“中国及其货币”编号为第7章。）

与我的其他章节一样，**如果您想快速阅读本章，可以只阅读粗体字。**

我将首先介绍我的对于所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等）有关的三个原则，包括美中关系。像我的其他任何原则一样，您可以接受它们或者所有保留。这些原则是我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我来说确实很实用。如果您不感兴趣，请随时跳过它们。

### 我认为美中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互为威胁的关系，尽管最终变成哪种关系都需要双方的一致行动。**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以双赢的合作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关系，他们将考虑对对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尝试将其给予对方以换取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互相尊重和慎重考量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在集贸市场上的两个友好商人或在奥运会上的两个友好团队一样竞争。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互不相让的相互威胁的关系，他们将首先考虑如何伤害对方，以期迫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境地，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双输的关系与建设性的交往相比，将更容易遭受破坏性的冲突。历史表明，小规模冲突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其后果比当初选择这条路的领导人预想的要糟糕的多，因此几乎所有各方都希望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尽管双方都应该选择第一条路径，但是双方都有能力迫使局势朝着第二条路径发展。在各方的心中，无论他们选择哪种方式，都应考虑相对实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应意识到另一方可以施加的筹码，并重视有质量的利益交换，避免冒进。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双方需要意识到对痛苦与损失的承受能力与打击对方的能力同等重要。由于双方会采取何种手段让对方蒙受更大损失本身就是一件不确定性很强的事情，第一种情况显然要安全的多。但是，第二条道路肯定会更清晰地判定胜负。这使我思考对于大国关系原则的看法。

### 我关于国家力量的主要原则是：

**拥有实力，尊重实力，明智地利用自身实力。**拥有实力是一件好事，因为拥有实力可以蔑视一切协议，规则和法律。在紧要关头，那些有能力落实他们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甚至有能力直接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力量的顺序如下。当存在分歧时，意见分歧的各方将首先尝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无需遵循规则/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同意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还没有用，那些在既定规则下无法满足自身诉求的人将诉诸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当一方诉诸力量引发争端而另一方并没有被吓倒时，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对相对力量的考验，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局部地。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决定谁最终能得到什么的必要条件。战争通常会在建立一方的霸权后实现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明显最强大的实体作战，直到该实体不再是最强大的实体。到那时，这种动态将再次开始。尊重实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将要失败的战争并不明智；最好是协商出最佳解决方案（除非有人想成为炮灰，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自身实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即霸凌。它的内涵是要意识到建立双赢比双输要更好，而双赢关系的建立需要真诚和信任。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使用“硬实力”不是最佳途径，而使用“软实力”则更可取。[1]如果处于一种双输的关系模式中，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方法就是与对方解耦，尽管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明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是最好不要把力量表现出来，因为它通常会使他人感到受到威胁并建立自己的反威胁能力，这反而将导致相互威胁的关系。通常，最好将自身实力像一把刀子一样隐藏，只是战斗时拔出。但是有时候，当局势紧张时，展示实力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的谈判地位和避免真正冲突是最有效的。知道对方最关切或最不关切的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哪些事情是对方愿意或不愿意为之战斗的，以及战斗的方式。通过考察他们过去的国际关系以及他们使用自身实力的方式，展望他们今后可能的行为模式，并反复试探，可以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有时相互试探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使双方陷入艰难的境地，即不得不在战斗和被诈之间做出选择。针锋相对的冲突不断升级往往使冲突超出双方合乎逻辑的要求。双方应该始终牢记力量平衡的位置在哪里，即知道在冲突中的利益与损失，这是让双方冲突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处理结果的前提，就像在沟通协议时考虑到在法院上将会如何斗争一样。尽管大家通常渴望拥有实力，但谁也不想拥有无用的实力，毕竟维持实力时需要消耗资源的，尤其是时间和金钱。实力带来责任和担当。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强大的力量是最好的，但常常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实力较弱的人比实力较强的人更具幸福感。在考虑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考虑何时达成协议以及何时进行斗争也很重要。为此，重要的是要考虑实力会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实力强大时，最好使用实力来谈判协议，执行协议或战争。这意味着，如果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则应尽早斗争，反之则应拖延斗争的时间。当然，有时候战争对于满足自身诉求是合理且必要的。这使我开始思考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 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具有相当的实力，其中包括消灭对方的实力时，发生致命战争的风险很高，除非双方对自己不会遭受对方毁灭性打击的事实存在高度互信。**想象一下，您正在与一个可以与您合作或消灭您的人打交道，并且您可以与他们合作或消灭他们，而你们两个都不确定对方会做什么，此时你会怎么做？即使您和对手要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合作，但你们每个人要做的合乎逻辑的事情是在对方消灭你之前先消灭他。因为生存至关重要，而且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消灭你，尽管你确实知道在你消灭他们之前消灭你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博弈论中，处于这一位置的现象称为“囚徒困境”。因此，为避免致命的战争，建立一套相互保证不对对方进行致命性破坏的保护机制很重要。建立利益交换和依赖关系，使人们无法忍受进一步的损失，有助于巩固了良好的关系。因为a）大多数战争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更强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结果不确定，b）战争的代价巨大，c）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兵者凶器也，即便你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无法接受的损失，但也需要慎重考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否得当。

**尽管本章我主要关注点在中美关系，但是我们和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如同在一个多维度的棋局，要求每个玩家考虑一些关键玩家（即国家）的许多立场和可能的举动，这些国家有广泛的因素需要权衡，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例如，现在参与到这个多维度棋局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他们都有许多因素考虑，这些因素将会决定他们的行动。从我玩的游戏（即全球宏观投资）中，我们知道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以做出制胜决定是多么复杂。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不像那些当权者那样复杂，我知道我无法获得与他们一样的信息，所以如果是说我比他们更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处理那将是一件很傲慢的事情。出于这些原因，我谦逊地提出我的观点，带着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会诚实的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世界在这些摩擦中如何运转的。

### 1、各自处境

**在我看来，命运和它的大周期表现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位置。他们带领美国经历了一个相互促进的成功大循环，导致了过度行为，导致了许多领域的衰弱。同样，中国历史上也一度经历了大周期的衰退，导致了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导致了中国现在所处的相互促进的上升。**

例如，命运和巨额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周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债务过多，并且需要迅速产生更多的债务，它不能用硬通货来偿还债务，所以它不得不用经典的后周期印刷货币的方式将债务货币化，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典型地说，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是美国的成功导致这些过度行为的后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取得的巨大成功，美元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国人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过度借贷，从而使美国处于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很多钱的脆弱地位，这些其他国家在持有一个过度负债国家的债务方面处于脆弱的地位。美国正在迅速增加债务并将其债务货币化，并向持有债务的国家支付显著的负实际利率。换言之，正是因为传统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存了很多钱，这导致它向那些想借钱的美国人放贷，这使得中国和美国在这些摩擦进行时，陷入了尴尬的债务债权关系。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导致了激励措施和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促使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国内秩序，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劲所必需的生产率。在中国（1840至1949，译者注），由于债务和货币疲软、内部冲突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典型的中国金融收缩导致了中国的大周期衰退，与此同时，美国崛起。正是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激励机制和市场经济方法的产生，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巨大进步，巨大的财富，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幸的境地，不得不在a）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和b）撤退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美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以下两个选择中做出选择：一是考虑中国台湾问题，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也不会拼出它的名字；b）撤退。正是因为这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美国现在7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是不经济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取决于维持不断加强的力量，而不产生导致其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公司已经有200-300年的时间了。没有人能永远做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在这本书中，我们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特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衰周期，以及中国王朝的最后1400年，这些把我们带到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置身于让我们站在这里的大局故事的背景中，并看到事情如何运作的因果模式，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现在我们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希望不要忽视这一大局。当前，不知不觉的小事情，TikTok，华为，中国香港相关，关闭领事馆，移动战列舰，空前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以及其他许多将开始显得更大，我们将发现自己在暴风雪中，每天都向我们袭来。每一项都需要一章的篇幅，我不打算在这里做这样的研究，但我将涉及主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种主要类型的摩擦需要考虑：**1）贸易/经济摩擦，2）技术摩擦，3）地缘政治摩擦，4）资本摩擦，5）军事摩擦。**虽然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摩擦”不会发生，在摩擦发生的领域寻求合作，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些“摩擦”的存在，我们应该利用过去的历史案例和我们对正在发生的实际发展的理解，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和如何处理。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在不同程度的博弈中出现。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一个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的发生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试图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在试图加速一场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实力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是他们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摩擦，他们会过得更好吗？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失控，两国必须清楚地知道“红线”和“跳闸线”是什么，标志着冲突严重性的变化。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和它们所提供的原则来看看这些摩擦。

### 2、贸易/经济摩擦

**就像所有的冲突一样，贸易摩擦可以从一场礼貌的争论变成一场危及生命的摩擦，这取决于战斗人员想走多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贸易摩擦走得太远**——它只包括一些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让人想起我们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例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我们看到，贸易谈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项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该协定正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正在初步执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次“谈判”是为了考验彼此的力量，而不是指望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来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力量测试，所有这些摩擦将如何进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力量测试将走多远，将采取何种形式。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还有三大经济指责。**

1.中国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本国产业。

2.中国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显著的是制定政策，从外国公司特别是敏感行业得到先进技术。

3.中国知识产权的问题，有些行为被认为是国家赞助的，有些则被认为是政府之外的直接控制。

一般来说，美国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既有试图改变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例如，让他们向美国开放市场），也有自己的做法（对中国关闭美国市场）。美国不会承认做了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获取知识产权），就像中国人承认做了一样，因为承认做这些事情的公关成本太高了。当他们寻找自己事业的支持者时，所有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在为正义而战，而邪恶的军队却在做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双方指责对方在做坏事，而没有披露他们正在做的类似事情。作为一个原则…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很容易保持道德高地。然而，当战斗变得艰难时，就更容易为之前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与其说它不道德，不如说它是道德的）。随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在理想主义描述正在做的事情（这有利于国内的公共关系）和为赢得胜利而做的实际事情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在摩擦中，领导人想让他们的选民相信“我们是好人，他们是邪恶的”，因为这是争取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为这一事业做一些特殊安排。如果一个务实的美国领导说，除了人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道德法则之外“战争中没有法律”和“我们必须遵守和他们一样的规则，否则我们就会愚蠢地把一只手放在背后强迫自己去做”，那这样不容易激励他人。**

**关于贸易摩擦，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好的贸易协定，而且这场摩擦恶化的风险大于它改善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贸易谈判都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后才开始。除了选举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获胜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场摩擦。这将对美国和中国如何应对正在展开的大周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两党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采取强硬态度。中国的态度到底是如何表达和反应的，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场摩擦怎么会恶化？

**传统上，贸易/经济战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双方切断了另一方的基本进口**（例如，中国切断了美国生产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国切断了中国的基本技术）和/或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必需品（例如，美国切断了中国从台湾进口半导体、从中东或俄罗斯进口原油、或从澳大利亚进口金属）就像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一样，**这是随后军事摩擦的一个短期先行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朝这个方向的运动。**我并不是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我想明确的是，切断任何一方重要进口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重大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收支的演变将走上正常的道路，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将主要根据各国不断演变的竞争力而演变。

基于这些原因，**两国正在转向更多的国内生产和“解耦”。**[2]在过去的40年里，它获得了这样做的能力。今后五年，我们应该看到两国更加独立。很明显，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削减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将远远大于此前。

### 3、科技摩擦

**科技摩擦比贸易摩擦要更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哪方赢得了科技摩擦的胜利很有可能也会在经济和军事的竞争中获胜。**

**两国现在是全球大型科技行业的两大主导，而大型科技领域将是未来的行业发展方向。中国的科技行业已经在国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以服务在中国的中国人，并成为了全球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同时，中国也保持着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科技的高度依赖（例如，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芯片）。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增长的发展和竞争的影响，也使得中国很容易被切断与美国或非美国的基本技术的联系。**

**总体而言，尽管在不同类别的技术上表现参差不齐，美国现在似乎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但是美国正在失去领先地位。**例如，尽管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方面却落后了。作为对这一趋势的不完美反映，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两倍，而且中国的份额增长速度快于美国。**这种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公司（即政府）的技术发展，这些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大。**如今，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全球第五大和第七大科技公司，仅次于美国最大的“FAAM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正在由中国主导。例如，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中国，中国在5G竞赛中领先，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的某些方面领先，中国在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方面也同样领先。在其它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美元交易额居全球首位，远远领先于美国。当然，还存在着我甚至是我们消息最灵通的情报机构都不知道的一些正在秘密开发的技术。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升其技术和决策质量。**大数据+大AI +大计算=最优决策。中国人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人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多），他们在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投入巨资，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投入到这些及其它技术领域的资源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在提供资金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几乎都在向中国的开发者提供无限量的资金。在人才方面，中国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约是美国的8倍。美国整体的科技能力领先（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落后），当然也有一些大型创新中心，尤其是在顶级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所以美国并没有出局，美国在科技域领先的相对位置正在下降, 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升。请记住，中国的朋友在36年前还在惊叹于我送给他们的掌上计算器，并想象一下36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子，那并不遥远。

**为了应对技术威胁，美国正在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TikTok和微信）在美国的使用，试图削弱它们在国际上的应用范围，并可能通过制裁来阻止他们获得生产所需的配件从而削弱它们的生存能力。**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a) 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从事非意愿活动？b) 美国担心这些中国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c) 为报复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其市场？尽管这些说法都存在争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公司和其他的中国公司正迅速变得更具竞争力。作为对这种竞争威胁的回应，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杀死有威胁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虽然美国正在切断获取知识产权的渠道，它本可以在不久前以更强有力的手段达成这一目的，因为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知识产权。中国正开始对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将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都在变得更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从惊叹于廉价的计算器中走了很长的路。

**关于技术获得问题, 虽然普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五分之一的北美本土公司在CNBC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2019年的调查中声称存在知识产权问题[3]）,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对中国科技公司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国家违反了法律（比如华为在美国），人们会希望看到这种犯罪行为受到法律起诉，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证据，表明这些技术中嵌入了非意愿设备。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对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担忧是中国科技公司受到攻击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政策制定者会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允许与美国人民的自由竞争，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竞争是公平的，也是产生最佳结果的最佳过程。非意愿获得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实践问题，自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也一直难以防范。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英国对荷兰这样做了，美国对英国也这样做了，都是为了让自己更有竞争力。“非意愿获得”意味着违法。当两国间发生战争时，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往往不会被决策者披露。我并不是在暗示美国的激进行为背后有不好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只是说，它们可能不完全像陈述的那样。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目的是保护企业免受外国竞争。HUAWEI的技术无疑具有威胁性，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更好。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并将它们与美国同行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不在美国竞争。亚马逊和其他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之所以不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主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如何，**科技行业正在解耦，这是两国更大程度解耦的一部分，将对5年后的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摩擦恶化将是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美国在技术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尽管优势正在迅速缩小）。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非常依赖从美国和美国能够影响的非美国来源进口的技术。这给中国制造了巨大的弱点，同样也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它最明显地存在于先进的半导体领域，尽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术中。世界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动态是许多值得关注的有趣动态之一，该公司向中国和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而且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有很多类似的技术进口对中国的福利至关重要，而从中国的必要技术进口对美国福利影响则少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那将是冲突风险大幅上升的信号。另一方面，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在5-10年内，中国将比美国在技术上更加独立和强大，届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技术的进一步解耦。**

### 4、地缘政治摩擦

**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正如你能想象到的, “100年耻辱”时期和外国“蛮族”的入侵给中国足够充分的理由来 a）在其境内拥有完整主权 b）拿回那些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c）绝不能变得软弱以至于被列强随意摆布。**中国渴望主权和维持独特的做事方式（即文化）是为中国拒绝美国要求他们改变中国内部政策的原因。一些中国人里指出，他们都没有要求美国应该如何对待美国境内的公民。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倾向于改变宗教信仰。把他们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信仰、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这种倾向从十字军东征前就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文化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可能会威胁到中国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的能力。中国人相信，他们拥有主权和能力去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这是由他们的等级管理结构决定的，是不可妥协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也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颠覆他们的秩序，这也是无法容忍的。这些都是存在的最大威胁，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会誓死捍卫[4] 。如果美国想防止一场热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必须小心。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会希望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避免一场热战收场。

**可能最危险、最重要、难以和平解决的主权问题就是中国台湾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美国永远不会兑现其允许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的隐含承诺。他们指出，当美国向台湾出售f -16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看起来肯定不像是美国在推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既定目标。因此，他们认为，确保中国安全、团结的唯一途径就是拥有对抗美国的力量，希望美国在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能够理智地默许。我的理解是，现在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强了。此外，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强军事实力。所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场正在出现的主权之争，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中国台湾海峡危机”，我将非常担心。**“美国会为中国台湾而承担过多吗?”不确定。如果美国不参战，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它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以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及其以外地区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一损失。以英国为例，它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在中国台湾事务方面做得越多，输掉冲突或撤退所造成的耻辱就会越大。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美国一直在做着帮助中国台湾的大戏，而命运似乎正在让它更接近现实。如果美国真的打起来了，我相信一场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与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冲突在美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冲突，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导致一场更广泛的冲突。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希望对这场大战及其带来的破坏的恐惧，就像对相互毁灭的恐惧一样，能够阻止这场冲突的发生。

同时，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我相信对方**有强烈愿望不与美国开展一场冲突，或者强行控制其他国家（不同于想要获得在其所在的地区为所欲为和影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能力）**。我知道，大家知道一场冲突有多可怕，也担心无意中重蹈第一次世界失去秩序的覆辙。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更喜欢合作关系，而且，我怀疑，他们会很高兴地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影响范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红线”（也就是说，如果越过这条红线，就会导致一场冲突)，而且他们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5]

**在全球影响方面，两国都有对于各自来说特定重要的地区，主要基于地域远近（他们最为关心地域是与他们最接近的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对于必需物料的获取（例如，他们最关心保持必需矿物或者科技的供应渠道不被切断），较小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出口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地区，第一是那些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他们的边界领土（例如,在中国海域）和那些在关键供应航道（比如纽带和通道国家）或是那些关键进口物料的提供方，第三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相关联国家。

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活动显著扩大，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行为主要都是经济活动，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例如，贷款、购买资产、建设道路和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协助和其他支持）来实现，而美国却在减少对这些地方的投资。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允许中国人在本国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竞争国家建立类似历史上相互协助的关系，这些国家离中国越近，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就越大。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纠结，是与美国结盟更好，还是与中国亲近更好，那些地缘上最接近的国家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大的考虑。**在与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讨论中，我一再听到有人说，有两大首要考虑因素——经济和军事。他们几乎都说，如果要从经济角度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对他们更重要（贸易和资本流动），而如果他们从军事支持视角做选择，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美国是否会提供军事帮助。大多数人怀疑美国是否会为他们而战，而亚太地区的一些人则质疑，如果美国想赢，它是否有能力获胜。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投资意义重大，其工作方式与美国在二战后为关键国家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大体相似，以帮助确保所需的关系。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消退。就在几年前，美国还没有明显的对手，所以美国很容易就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会遵守；唯一的竞争力量是苏联（它算不上是什么对手），它的盟友，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经济实力。**过去几年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一直在减弱。在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之初由美国建立的。随着美国退出这些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削弱，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5-10年里，除了在其他领域的解耦[3]之外，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会与这些主要大国保持一致。除了金钱和军事力量，中国和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的形成——风格和价值观很重要。看看这些协助安排表现如何是很重要的，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整体上更强大的弱国联盟击垮。**也许最值得关注的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自1945年世界新秩序开始以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中有两国结盟以中和或制约第三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例如，中国从俄罗斯获得自然资源，中国为俄罗斯提供融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国家是否与美国或中国在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来观察进展。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之外，当前美国国内当然也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机遇。这是因为美国两党在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而领导人的更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难以或不可能预料的政策变化。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测，但这些变化并非完全不可能预测，因为无论谁掌权，都将面临当前存在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正在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大循环方式展开。因为所有的领导者（以及这些演化周期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些周期的不同部分上车或下车，他们（以及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定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其他的人在过去的周期中都是在相同的阶段中进进出出，通过研究这些人在类似的阶段中遇到了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他们遇到的困难，并运用一些逻辑，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可能的范围。**

### 5、资本摩擦

**两种主要的资本摩擦风险是：与资本隔绝（对中国来说，这是比美国更大的风险）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国来说，这是比中国更大的风险）。**

**在第5章中，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摩擦策略。**这些都是两国冲突的可能性。这些行动的现代术语是“制裁”。**目标是切断对方的资金来源，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力量。**制裁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制裁。在每个类别下都有许多版本和方式。截至2019年，美国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大约8000项制裁[7] 。我不打算深入研究不同的版本和目标，因为那太离题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迄今为止拥有最重要的阿森纳制裁。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也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它有能力通过威胁那些与目标实体打交道的金融机构，阻止金融机构与之打交道，切断它们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从而切断目标实体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这些制裁绝不是完美或全面的，但通常都是非常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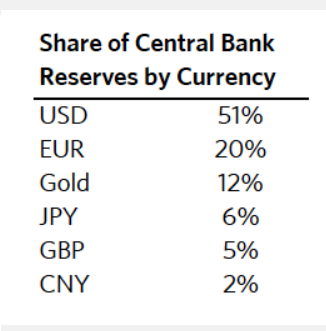
**由于金融市场制裁如此有效，它们自然会导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国家想方设法绕过制裁（例如，开发一种替代支付系统），或者削弱美国施加制裁的权力。**例如，很多国家都面临着这些制裁，而且面临的制裁风险要大得多，它们现在各自发展并合作开发一种替代支付系统。中国央行很快将成为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主要央行，这将使数字货币的使用更具吸引力。**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方面，无论取得什么进展，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应被视为未来5年两国关系解耦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能够印世界货币（即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操作力量（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美国正处于失去部分这种力量的危险之中，而中国正处在获得部分这种力量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买入并持有美元债务的意愿正在减弱，因为a）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在外国人的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如央行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占比过高，基于外汇储备规模合意性的长期衡量标准来看的话[8]；b）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这是可怕的，而且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部分债务货币化的话，美国财政部发债的需求将得不到满足；c）持有这些债务的激励缺乏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收益率为负；d）在潜在的战争时期，持有债务作为交换媒介或财富储备不如在和平时期受欢迎。此外，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债务（顺便说一下，这只相当于约27万亿美元未偿债务的4%左右）存在一些风险。此外，因为其他国家意识到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会对他们采取，任何针对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行动，都可能增加其他美元资产持有者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从而降低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并且让多数国家方便使用，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其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以及(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执行货币政策，这使得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下降。正如你所看到的，美元走弱的影响正在累积。与此同时，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这使得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试探同时采取以下措施的极限a）创建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b）不断下降的负实际收益率，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可以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其使用）和d）法定货币体系。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少，我们不能说它到了极限，直到它达到。到那时，要想解决就太晚了。**从我对历史上存在这些条件的极端案例的研究中，以及从我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美元和债务供应和需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债务的投资者正在测试不破坏储备货币地位的前提下创造货币与债务的极限。**从与世界上在这个领域最有知识的人交谈，包括那些现在管理着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以及那些过去做过的人，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在看到证据后——无论是历史案例与当前案例的关系，还是以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的供应和需求的现状——不同意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领域，并在测试什么是可能的极限。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相信美元会大幅贬值，或在不久的将来仅作为储备货币之一。美元和美元债务的情况就像利率的情况一样（并与之相关）。如果几年前你问是否会达到这些极端——比如，名义和实际长期利率为负，资本市场上债务和借款规模如此之大，政府也不施加资本管制来改变这种情况——所有这些有知识的人都会说“难以置信”。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很难弄清楚为什么债券的持有人和买家会接受这种交易，而不愿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领域。人们应该看看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时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规模如此之大，利率却保持在低水平（这是战争年代当政府需要资本管制和利率目标），再回顾最通货紧缩。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通过观察谁以什么原因买了什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然而，这个教训与人们经常在市场上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那就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的频率比人们预期的要高。因此，尽管大多数人，尤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试探极限，但没有人，包括我在内，应该肯定地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在短期内大幅下降。然而，我们可以意识到它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并且知道，如果它来了，它可能无法被阻止。这些债务的持有者将会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资产投向别处，以及聪明的债务人将大量借入美元债务，他们将利用这种廉价资金获得更高回报，这些举措将要求美联储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a）允许利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因为利率上升将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b）印刷钞票购买大量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正如第2章和第3章所描述的，它看起来像一种经典的货币防御机制。在那一章中解释过，当面对这样的选择，中央银行几乎总是印钞票，购买债券，货币贬值，并且开始自我强化，因为持有货币的利率不够高，不足以弥补货币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新的国际收支平衡为止。换句话说，直到有足够多的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被强制出售，以及美国人减少购买这些资产，从而减少用债务支付。

**关于美元，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当没有好的替代货币来取代美元时，美国如何能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所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当期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如下：



由于历史原因和影响它们相对吸引力的基本面因素，这六种货币是最常用的储备货币。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储备货币的使用，就像一种语言的使用一样，滞后于使用它的基本原因很多年，因为货币的使用不容易改变。**目前，四种最常用的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1945年后的老牌帝国，尽管它们的基本吸引力有限。他们来自G5国家，和G5一样都是过时的。

至于每种货币的基本吸引力：

美元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欧元是一种结构薄弱的货币，由货币联盟勉强维系在一起的国家创造出来，这些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很薄弱。

日元是一种国际上不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的货币，而且面临着与美元相同的许多问题，包括债务过多且快速增长，以及货币化导致其支付的利率缺乏吸引力。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领导力量。

英镑是一种过时的货币，基本面相对较弱，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缘政治实力的大多数标准中，这个国家相对较弱。

黄金之所以被持有，是因为它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好。像英镑一样，因为它也是过去的储备货币。在1971年以前，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之前描述的法定货币的弱势。与此同时，由于黄金市场的规模有限，所以作为货币的规模也有限。

人民币被选择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因为中国较强的基本面——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其经济规模与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大体相当，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相对稳定，而且它的外汇储备和其他优势都很大。此外，它没有零利率，没有负实际利率，也没有债务的印刷和货币化问题，尽管它有很多国内债务需要重组。它的缺点是应用不广泛，不能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自由浮动，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需要更好的发展，清算体系不发达，还没有建立起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已经表明，每当货币不被需要时，它们就会被抛售并贬值，资本进入其他投资领域（如黄金、白银、股票、房地产等），因此一种货币的贬值并不必然需要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替代货币市场。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储备货币地位下降，而没有另一种储备货币可供选择。***

**如果美国不干预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它们可能会迅速发展，并日益与美国货币和信贷市场展开竞争。你不会一下子看到所有这些，但你会看到它在未来5-10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荷兰、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表明，发展与事物的自然曲线是一致的。此外，如果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政策，并良好地发展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面已经具备。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债务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因为相对于它的基本面，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是如此的不足。例如：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两国贸易额（包括进出口）均占全球贸易的13%左右，但人民币在世界贸易融资中仅占2%左右，美元占50%以上。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融资份额将相当容易。

**中国占世界GDP的19%[9] (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占全球股票市值的15%左右，目前只占约5%权重MSCI股票指数，和人民币资产仅占投资组合中外国资产的2%左右。相比之下，虽然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约为20%，而且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但它目前在MSCI股票指数中所占比重超过50%，在非美国资金中占48%左右。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因为投资滞后于发展，特别是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正如之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的发展中所解释和展示的，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等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成为主要帝国的重要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香港和深圳）发展相对缓慢，这制约了中国基本面的发展。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将再次被迫做出选择，a）试图通过在冲突中变得更有侵略性来破坏这条进化之路（当前情况选择通过一个更激进的资本摩擦）和b）接受这种演变可能会使中国变得相对强大，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代价是牺牲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未来5 - 10年。**我们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削减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造成轻微伤害的同时，它们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竞争力，而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股市的发展。例如，蚂蚁金服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证交所上市，让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于中国的交易所，或者那些不在这些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措施蚂蚁金服的投资机会。

### 6、军事摩擦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有机会与军事专家交谈，并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我会把他们给我的消息传递下去。由您自己承担接受或者放弃风险。

**我们无法想象下一场大战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并将其用于行动以来，许多武器被秘密研制出来的，其创造力和造成创伤的能力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现在，战争的类型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每一种战争中都有比任何人知道的更多的武器系统。当然，核战争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我听说过生物，网络，化学，太空和其他类型战争的前景同样令人恐惧。其中许多未经测试，因此它们如何生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头条新闻是：a）两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摩擦升级，因为双方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极限，b）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在军事上比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输掉一场战争，然而c）美国在全球和总体上更强大，可能“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尽管d）由于存在众多未知因素，一场更大的战争非常复杂，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为方式以及秘密存在的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唯一同意的一点是，这样一场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中国军事力量的进步速度与其他改善速度一样，非常快，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b）未来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更快，特别是如果其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5-10年内取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中国台湾，中国东海和中国南海以及北朝鲜是最大的热点，而印度和越南则是第二大热点（原因我就不谈了）。**

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冲突而言，它将包括上述所有类型的冲突，以及最大程度地进行的更多冲突，因为在求生之战中，彼此之间会相互抛弃，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致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多我们互相伤害的方式。）

在考虑战争的时机时，**我谨记一个原则，即当国家内部动荡不安时，这是敌对国家利用其弱点的适当时机。**例如，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行动控制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当时欧洲国家正遭受经济萧条和冲突的挑战。历史也告诉我们，**当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力薄弱时，同时又存在较大的内部冲突，敌人发动进攻行动的风险是很高的。**例如，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能存在这些条件。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当即下手会更符合利益，而对于中国（由于先前图表中显示的进步和减弱的趋势），则在以后（例如5-10年）进行战争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因为那时候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更加强大。

我现在要添加另外两种类型的战争：1）文化冲突，它将推动双方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包括他们宁愿死而不愿意放弃的情况；2）与自己的战争，它将决定我们的有效性，同时决定我们以先前探索的方式将变强变弱。

### 7、文化冲突

**人们如何相处对于决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共同面对的情况至关重要，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成为决定彼此相处方式的最大决定因素。**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我们刚刚探讨的冲突时将如何相处。由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因此，如果我们要和平解决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是什么，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它们。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使其领导者和社会做出大多数决定都是自上而下，要求高标准的文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孝顺和尊重上级。他们还寻求“集体决策”，通俗地说就是创造的机会和生产力成果所带来的利益得到广泛分配。相比之下，美国文化使其领导者自下而上地管理国家，要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欣赏革命思想和行为，并且不尊重人们的地位和思想。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推动了他们选择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类型。**

需要明确的是，大多数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共同信念而言，它们通常并不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舒适，反之亦然。而且，它们并不普遍。例如，在其他领域（例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华人拥有的治理体系更像西方民主体系。尽管如此**，这些文化差异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多数事物，在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它们是决定性的差异，它们决定了当事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其争端。中美双方彼此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未能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去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虽然两国的对外开放增加了它们的互动和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类似的经济自由产生了相似的愿望，产品和成果）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但在方式上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它们经常反映在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美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影响，特别是在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层面。**在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则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人会为之而战至死。**例如，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国政府更像一个父亲，规定孩子们玩哪种类型的电子游戏以及他们每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它们不受政府监管，因为这被视为个人的决定。有人可能会争论两种方法的优点。中国的等级制文化使中国人自然地简单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国的非等级制文化则使美国人能够与政府就是否这样执行做斗争。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也会影响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必须佩戴口罩以应对COVID-19的反应，这会导致两种不同后果，因为中国人遵循指示，而美国人却不这样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会影响中美两国人对许多事情的反应方式，例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自由媒体等，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许多不同国家运作方式的不同。

尽管用不同文化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各有利弊，在这里我不打算探讨它们，但我想传达的是，**文化差异让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信的人们相处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反之亦然。鉴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录以及其背后底蕴深厚的文化，中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不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大。试图迫使中国人和他们的体系变得更像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对他们最基本信念的屈服，他们将为保护这些信仰而战斗到死。要实现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正如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美国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一样。

例如，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即大多数中国人在选择领导人时都认为，有能力，明智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比以“一人一票”的原则让普通民众做出选择更为可取，因为他们相信普通民众信息不足，能力不足。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普通民众将一时冲动地选择领导人，或者基于当选的人会给予他们什么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例如，一般选民会选择那些愿意给他们更多钱的人，而不关心钱从哪里来。）而且，他们认为，就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同时历史也证明了，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民主国家转变为专制国家的情况下（最近一次发生在1930-45年间），民主国家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容易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为应该做的事情而斗争，而不是支持强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让后者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还认为，他们的挑选领导人的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多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任期只是沿着发展弧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10]他们认为，对集体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事情，并且最好由上层人士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大公司（尤其是多代公司）中典型的治理。因此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采用的这种方式的基本原理，也很难像他们一样看到民主决策过程中的挑战。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要探索这些决策系统的相对优点，我只是在试图澄清双方都有争论，以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彼此的眼光看待事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a）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彼此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做每个人认为最好的事情；b）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了他们认为不可妥协的东西而战斗到死。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历史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就经济学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经典左翼（有利于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穷人，财富的再分配等）；2）经典右翼（支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论谁在这个体系中获胜，以及更有限的财富再分配）——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所有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都有过摇摆，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或右是不正确的。在美国有限得多的历史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好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有更长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更长的历史，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更大的波动可能。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是围绕进化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正在演变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都在发生这样波动，所以说市场主义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青睐，反之亦然。在任何情况下，深层的文化偏好和明显的区别都不存在。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文化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及其政治体系中，美国人的文化倾向则是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文化倾向同样深深地植根于其中。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终将获胜，我将留给其他人辩论，希望没有偏见。尽管我会指出，大多数知识渊博的历史观察者都得出结论，这些系统都不总是好事或坏事。**什么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取决于a)环境和b) 使用这些制度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如果a）其中的个体对它的尊重超过他们个人的需求，和b）这个制度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顺应时代，所有制度都将崩溃。**

所以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应对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以在这个共同的星球上以最佳方式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愿为之而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会为以下两种情况而拼死奋斗：a）拥有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包括政治观点），以及b）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能力来阻碍这种权利的实现。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以下两点：a）对权威的尊重，这种尊重是通过相关各方的权力来体现和体现的；以及b）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行为负责的责任。最近发生的这种文化冲突的例子是在2019年10月，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片。他迅速撤下了推文，并解释说他的观点不代表他的球队或NBA的观点。莫雷随后遭到美国方面（即媒体、政客和个人）的攻击，因为他没有站起来捍卫言论自由。中国方面则认为整个联盟都有责任，并且惩罚了他们，从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上删除所有的NBA比赛，从网上商店下架NBA商品，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因为他发表的政治观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有多么重要，以及美国人如何认为不应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个人参与的组织。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有害的攻击应该受到惩罚，个人所属团体应对个人的行为负责。人们可能会想象，在更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在彼此之间如何相处的深层信念上的这种差异，会引起更大的冲突。例如，当处于上级职位时，中国人倾向于明确这一点，让处于从属地位的党派知道它处于从属地位并服从，如果它不做这些事情，就会受到惩罚。那就是中国领导层的文化倾向/风格。他们也可以是很棒的朋友，他们将在需要时提供支持。例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第一波COVID-19疾病和死亡大潮中急于获得个人防护设备时，却无法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渠道获得该设备时，我向中国朋友求助，他们提供了所需的大量物资。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对中国的慷慨和严厉惩罚既感激又反感。这些文化差异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方的共同满意，但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并接受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会为自己做出不同于别人想要的选择。例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而中国人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因此问题是应该怎么做。美国人应该和中国人开战，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互不干涉对方的行为? 我认为a）迫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做他们坚决认为不利于他们的事情是困难的，不适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b）最终，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能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将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实力。

我想如果美国人与中国人、读者与我可以在一些原则上达成共识（先不考虑我们是否真的希望这些共识成真），那么考虑一些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实用性原则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对我们寻找前进的方向会有极大裨益。

**每一方都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了它所处的位置。如果搞不清每一方对应有多少实力，那就定会发生争端去解决这个问题。理想情况下，这不一定需要通过激烈冲突解决，但是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不甚清晰却又十分重要，通常它难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时间会逐步解释每一方对应的实力，因此当那些实力相对弱的一方意识到了它们的真实实力后，它们会自然而然的滑向附属位置，最终完成实力与位置的和平变更。如果它们拒绝滑向附属位置，战争会让实力较弱的一方品尝失败与痛苦。这也是为何实力的更迭如此冷酷。**

**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规则就是不存在任何规则。这是因为在国际社会缺乏广泛认同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没有条约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公，并且缺乏惩罚手段去制裁那些做事不公但实力却远强于个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就变成了输赢。**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军士兵列队准备射击时，美军躲在树后偷袭英军士兵。英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并认为这一做法有违公平，但是美军则认为英军需要为自身的愚蠢付出代价，以及这一做法是完全正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停止抱怨其他国家做法不公，并且应该更加有智慧地去迎接博弈了吧？

**胜利意味着在赢得那些十分重要的东西的同时，不失去对己方而言已经十分重要的东西。因此，当战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远超于获益时，轻言战争是愚蠢的。**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确定的规则，但是最有实力的国家往往会建立一些对自身的约束（例如，确立战争中道德底线的相关规则）。有许许多多约束都可以对事态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有些约束可以带来双赢的结果，而另外一些选择可能是双输。显然，那些能带来双赢结果的选择是更佳的。想获得双赢的结果，每一方都需要在深思熟虑后通过磋商来解决争端。这要求各方都对对己方重要的、对对方重要的，以及交易的艺术了然于胸。[11], [12]

**滑向一场愚蠢的战争往往比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例如，有些人认为，开启一场给所有人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战争的理由，可以仅仅是，它值得），其中带来战争的原因可能有a）囚徒困境，b）以牙还牙的报复模式，c）国家实力下降所带来的成本，d）在快速决策时误判了现状。**所谓囚徒困境，请想象一下你身处一个别人可以同你合作或杀了你，以及你可以同别人合作或杀了别人的场景。关键是各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选择？尽管对于你和你的对手而言，最佳的选项是合作，但是从理性角度讲，对于各方而言，最佳的选项是在对方杀了自己前，先杀了对方。这是因为自保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的本能。尽管你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杀了你，但是你非常确信在自己杀死对方前，对方不选择合作是完全符合对方利益的。相互敌对的国家经常发现自己会处在这种情景下；这时，为了避免率先进入选择“杀人”的困境，它需要去确定对方无意选择“杀人”。另一个导致愚蠢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以牙还牙的思维方式，它迫使每一方都必须选择升级措施作为回应，否则一旦没有良好的反击敌人最新的回击，它会被直接视为软弱。从追求和平的角度，以牙还牙必须被双方一致避免。从另一个角度看，走向衰弱的帝国往往会选择同正在崛起的帝国对抗，尽管理性上这并不是最佳的选项。因为对抗\撤退的计算结果往往推动一方选择对抗，而不是理性的从预期收益的角度权衡利弊；毕竟，撤退往往被视作一种失败。此外，这种失败也会让领导人被国内舆论视作软弱，并损失其在国内持续执政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在冲突快速变化时，由误解产生的误判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动态因素极大地推进了冲突的升级，尽管很多时候开启一场对双方而言皆造成巨大破坏的战争远不如用更加和平的方式竞争和合作。

**用不真实的和情绪化的言论煽动人民对于另一国家的敌意也增加了导致愚蠢战争的危险性，因此a）领导人应当真诚地并设身处地的解释现状以及现阶段政府所做的措施（这对于民主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民众的想法是很有影响力的）或者b）选择一个合适的领导人，并把事情完全放心的交给他处理。最糟糕的情况是，c）一个领导人不真实地和情绪化地煽动人民。**当人民敌意上升并且不惧战争时，超出理性范围的战争的风险显著增加。政治领袖常常煽动人民以强化自己的政治支持。由于负面情绪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会提高战争发生的危险。这一现象目前在两国都存在，即使美国现在更为严重。 尽管我没有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看法的相关调查，许多人告诉我情况明显恶化。我们不应该让民众成为推动局势升级的推手。

**赢得“战争”并战胜对手的最聪明的方法是，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磋商解决问题。**我们是否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一致：a）美国和中国正在制度和实力上展开竞争，b）两方都会不可避免的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道路，c）美国实力正在缩水但依然保持领先，d）历史证明，尽管人口数量很重要，但是其他因素（例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17个指标）也可以让人口并不多的国家在处理好自身发展后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追求领先地位中，最重要的对手是自身。

接下来我将阐述，我们要打赢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战争”。

### 8、同自己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同我们自己的战争是最重要的战争，因为我们对自身的强弱有着绝对的控制。因为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变强或变弱十分清晰，同时这种强弱优势是可被度量的，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到每个国家的行为。这些因素已经在第一章中的17个指标详细阐述。我会在这里在做简单回顾。最后在总结章节，在“未来”一章中，我会给出许多国家目前在这17个指标上情况，并且探索其中可能成为引领性的指标，以便于我们对日后发展进行预测。

**在成就一个伟大的帝国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

**……政府的领导力足够强大，并且有能力提供成功所需的基本要素，**包括……

**……强大的教育体系。**关于强大的教育体系，我不仅是教授知识和技能；教育还包括……

**……良好的个性、品行和职业道德。**这通常是从原生家庭和学校习得的。这些因素会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并作用在一些因素上，例如，……

**……较低的腐败程度和对规则的敬畏，例如敬畏法律。**

**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的引领下凝聚在一起**——也是十分重要的。当人们拥有知识、技能、好的个性和品行去一起工作，……

……**一个可以有效分配资源的制度**，可以显著提高，例如通过……

……**以开放的胸襟放眼全球**是一个国家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会为他们带来……

……**充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会带来比成本更大的收益，最终会带来……

……**收入上强劲的增长**，会给国家带来……

……**持续增加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会带来……

……**迅速增长的生产率水平**（单位时间劳动价值的提升）。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财富增长和生产力提升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生产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时，他们就会在很多领域带来富有创造力的发明……

……**新技术**。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领域都有重大价值。当一个国家在科技发明上的竞争力提高，自然的，他们会获得……

……**在全球贸易中占比逐渐上升且占较大的份额，**会促使一个国家……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保护本国贸易线路并对其他重要国家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一个国家会继而发展……

……**强大的，并且广泛使用的货币、权益资产和信用市场。**通常情况下，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货币，会成为全球交换中被推崇的中间媒介，和被偏好的财富储藏形式。这会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在建设上……

……至**少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来吸引并分配资本并且扩大全球贸易。

当这些因素相互强化和坚定的提高时，国家崛起并维持实力。

一个国家在获得上述优势的同时也播下了周期性衰退的种子。一个国家应当在以下方面注意……

……**失去竞争力**，由于……

……**走向成功和积累财富会导致新兴竞争者模仿**，这会导致……

……**工作上努力程度下降，并进行更多休闲娱乐且生产力较低的活动**，特别是……

……**新生的、没有经历太多“战争考验的”新一代，从更坚强、工作更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上一代人手中继承工作。同时，成为最富有且最有实力的全球霸主会让人**……

……**本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会造成……

……**能借更多资金的“嚣张特权”**会导致……

……**陷入更深的对外负债**可以维持超越基础的实力，为维持帝国发展的国内的过度消费、军费以及战争开支提供融资。当最富有的国家开始向贫穷的国家借贷时，这是早期的财富转移的标志。

负债和资本市场创造的经济繁荣导致金融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人们按照不同的比例从中获益，因此……

……当经济压力变大时，富有的国家同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加剧；起初是是逐渐增大，随后会更加剧烈。这会导致……

……逐渐增加的政治极化——例如，左翼民粹主义（主张二次分配财富，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主张保留富人手中的财富，例如，资本主义者）——导致……

……富人阶层担忧财富会被没收以及自身会受到敌视，导致将财富转移到能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其他地方、资产形态和外国货币。如果长期允许可能会导致……

……较高的支出需求下减税会导致……

……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增长的税率会导致……

……一个经典的自我强化的掏空过程是使有能力纳税、花钱和提供工作的人不断减少。这会导致……

……减少在必需品上的支出会使情况恶化，并且进一步提高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税率和赤字的提高。这会导致更严重的掏空。

在巨额债务以及央行尽可能地降低利率以刺激债务增长的背景下，央行丧失了利用硬性货币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

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同时存在a）内部对于资金的争夺愈发激烈，b）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并最终造成贬值。

一个国家的外部国家使得本国难以继续维系经济上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和防卫，因为日益增长的成本已经远超其所带来的回报。这会削弱领先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其海外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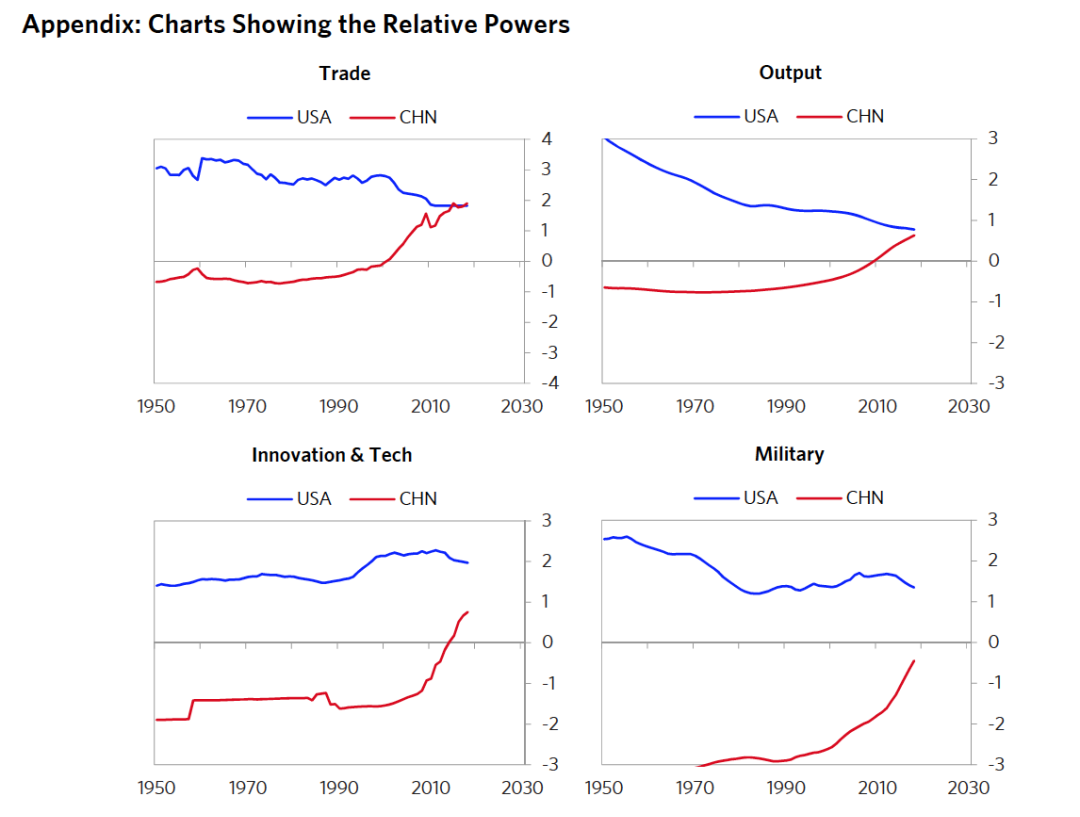
这些破坏性的情况削弱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导致整体经济“蛋糕”缩水，带来更多关于如何分配日益缩水的资源总量的冲突，增加社会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加剧左右两派民粹主义者试图各自践行自身理念的冲突。这是民主政体受到的来自独裁政体的最大挑战。

在领先国家走向衰弱的时候，新的崛起中的国家借机获得了足够的经济资源，地缘和军事上的实力去挑战领先国家。国际上，新兴国家同时a）更有效的赢得市场和区域影响力b）填补领先国家离开后留下的真空。

其他诸如自然灾害的外源性冲击（例如瘟疫，干旱和洪水）发生在国家比较脆弱的阶段。若其真的发生，会增加国家进入各因素自我强化并螺旋式衰退的风险。

美国内部的摩擦和挑战比外部的摩擦和挑战更重要、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战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如贫富、城乡、保守与进步、种族群体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控制和可测量的范围内，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做出改变，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正如丘吉尔对英国人民说的，“值得胜利!”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着眼于国家内部获得和失去秩序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尝试展望未来。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两国这八个最重要的力量的指数。事实说明一切。我会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变化了。



注释

## 大选将如何可能让美国崩溃

【编者按】

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11月号的封面报道在9月末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原因是该杂志考虑到这篇报道的重要性，提前在网上全文刊发了这篇题为《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的重磅报道。

这篇报道的作者正是美国大名鼎鼎的调查记者巴顿·盖尔曼（Barton Gellman）。盖尔曼是美国各大新闻奖的常客，曾以个人，团队成员和团队负责人的身份为他工作过21年的《华盛顿邮报》赢得过三项普利策奖，还作为PBS前线电影《秘密的美国》的编辑顾问，获得两项艾美奖，以及其它多个新闻奖。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调查性报道和国家安全保密方面的课程。他的畅销书《钓鱼者：切尼的副总统任期》获得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并入选纽约时报2008年最佳图书。盖尔曼也是斯诺登当年向其泄露政府监控机密文件的记者之一，今年，他出版了新书《黑镜子：爱德华·斯诺登和美国国家监控》。

在《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这一长篇报道中，巴顿·盖尔曼以详实的采访和分析揭示了2020美国总统大选呼之欲的种种危机，绘制了一幅美国将如何被带到“悬崖边上”的惊心动魄的地图。

报道推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问盖尔曼：“如果川普总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会怎么样?”

盖尔曼回答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除非川普在选举团中获得合法的胜利，否则我们对他的一切了解都表明，他将拒绝接受失败，并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工具撤销这个结果。”“川普将有很多选择来保持对结果的怀疑——在法庭上、在街头、在选举团和在国会。他所做努力的潜台词将是‘没有人知道’谁赢了。”

他说，最重大的风险是，川普会要求战场州的共和党盟友不顾结果，任命川普的选举人。

这篇文章中充满了可怕的细节。盖尔曼被问道：“有没有一个让你睡不着觉？”他说他感到害怕的是“川普掌握有这样的权力，只需得到共和党民选官员的适度帮助，他就能让选举结果沦为可疑，并且几乎无限期地让它悬而未决。”而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现有的法律就是“一个充满死胡同的迷宫”。很有可能在明年1月20日会出现两个人都宣誓就职的局面，那么“混乱的候选人和总司令将是同一个人”。

如此危险的境地，公民怎么办？说到“对进入11月的美国人有什么建议”时，盖尔曼建议读者们首先要认识到宪法外的挑战“很可能会到来”，“不要再以传统的方式来考虑这次选举”。

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采取行动”，“没有广大人民的某种默许，选举是不可能被窃取的。”“不要默许。”“去投票。如果你所在的州允许，就提前投票。如果你能承受风险，就亲自投票。因为超时统计的邮寄选票将是选后竞争的核心。”

《纽约时间》全文翻译了这篇报道，全文共两万多字，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如果你关心美国的命运，这篇报道值得你花足够长的时间阅读。 （编辑：新约客）

本文将出现在《大西洋月刊》2020年11月的印刷版上，鉴于兹事体大，文章于2020年9月23日首次在线上发表。文章原标题为《可能让美国崩溃的大选》。

文中配图均来自《大西洋月刊》。插图：吉列姆·卡萨苏斯 渲染：博尔哈·阿莱格雷

可能让美国崩溃的大选

如果选票接近，唐纳德·川普很容易将选举陷入混乱，颠覆结果。谁能阻止他？

报道：巴顿 · 盖尔曼

编译：新约客; 彦子

一批密切观察我国总统大选的学者、律师和政治战略家，发现自己来到了“9/11”事件前几个月，那些情报分析师所处的不安的位置上。随着11月3日的临近，他们的屏幕闪烁着红光，闪烁着政治体系不知如何消化的警告。他们看到了我们都能看到的明显迹象，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些微妙的事情。一些危险的东西已经进入视野，而这个国家正在它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危险，不仅仅是2020年选举将带来的不和谐。那些担心出现更糟情况的人已把动荡和争议视为理所当然。新冠状病毒大流行、鲁莽的现任总统、大量邮寄选票、被破坏的邮政服务、压制投票的死灰复燃，以及车载斗量的诉讼，全都压在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选举机器上。

总有一些代价要付，而当投票、核票和确认选票来临之际，则要付出更多代价。万事皆有可能，包括在选举之夜出现无可置疑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即使一方遥遥领先，“超时计票”的统计和诉讼——数以百万计的邮寄选票和临时选票——都会使结果在数日乃至数周内悬而未决。

幸运的话，这场多灾多难又功能失调的大选周期将及时到达一个传统的停摆点，赶上12月和1月关键的最后期限。竞选将以足够的权威来决定，失败的候选人将被迫屈服，我们将共同做出我们的选择——一个混乱的选择，毫无疑问，但足够清晰，足以让当选总统获得执政的授权。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从未踬踣于这一障碍。但是，在这个充斥着瘟疫、衰退以及灾难性政治的大选之年，决策机制面临着崩溃的切实风险。熟悉选举法和选举程序的学者警告说，发生宪法危机的条件已经成熟，这场危机将导致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权威的选举结果。而对于这种灾难，我们没有万全之策。因此，红灯闪烁。

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选举崩溃》(Election Meltdown)的书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UC Irvine School of Law）教授理查德·哈森(Richard L. Hasen)说：“如果选举结果接近，我们很可能会在法庭和街头看到一场旷日持久的选后斗争。”“我们所能看到的那种选举崩溃比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案还要糟糕得多。”

包括民主党提名人乔·拜登(Joe Biden)在内的很多人，都错误地理解了威胁的性质。他们将其框定为过去的总统不可想象的担忧，川普如果败选，可能会拒绝让出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像拜登一样，他们一般都会得出结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会非常迅速地将他护送出白宫”。

然而，最坏的情况并不是川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最坏的情况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阻拦出现对他不利的决定性结果。如果川普放弃所有的克制，如果他的共和党盟友唯他命是从，他就可以阻挠拜登在选举人团和国会取得法律上的明确胜利；他就可以阻止各方就任何结果达成共识；他就可以通过抓住这种不确定性以把持住权力。

川普的州和全国法律团队已经在为选后演习做铺垫，以规避各战场州的计票结果。宪法中的歧义和《选举人票计算条例》中的逻辑炸弹，将使得争议有可能一直延续到总统就职典礼日，这将把这个国家带到悬崖边上。第二十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的任期“应在1月20日中午结束”，但届时可能有两个人会出现在宣誓就职仪式上，而其中一个，将带着总统职位的所有工具和权力来到这里。

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历史学和公共事务教授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告诉我：“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谈论它，有些人担心它，我们想象它会是什么。但是，如果民主机制被用来阻止选举的合法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人对会发生什么有实际的答案。”

19年前的夏天，当反恐分析家警告基地组织即将发动袭击时，他们只能猜测一个日期。今年，如果选举分析家是对的，我们知道麻烦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可称之为“空位期”：从选举日到下一任总统宣誓就职的间隔期。这是唐纳德·川普的总统任期与未确定的继任者——川普第二任期或拜登第一任期——之间暂时的无主之地。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力交接有几个中间步骤，而这些步骤是脆弱的。

“空位期”共79天，由法律仔细限定。其中包括“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即今年12月14日，届时所有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举人开会，为总统投票；“1月3日”，新当选的国会就职；“1月6日”，参众两院联合开会，正式统计选举人票数。在大多数现代选举中，这些都是形式上的里程碑，与结果无关。今年，它们可能不是。

“我们的宪法并没有确保权力的和平过渡，而是以和平过渡为前提”，法学家劳伦斯·道格拉斯（Lawrence Douglas）在他的新书《他会走吗？》（Will He Go?）中写道。我们将进入的“空位期”将伴随着种种不利条件，在阿默斯特（Amherst）任教的道格拉斯称之为"完美风暴"。我们无法逃离这场风暴。11月3日那天我们将向着风暴中心航行。如果我们能不受创伤地驶出风暴，那么拯救我们的将不再是一艘牢不可破的船。

我们不要在一件事上避讳。唐纳德·川普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但他绝不会承认失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空位期”不会，之后也不会。如果最后川普被迫搬离办公室，只要他还能喘口气，他会在流放中坚持认为，选举是被操纵的。

川普对这一立场的矢志不渝将是即将到来的“空位期”最重要的事实。它将从头到尾扭曲诉讼程序。我们从未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也许你会犹豫。如果川普输了，不管怎样他都会拒绝失败，这是事实吗？我们都知道吗？技术上，你觉得有义务指出，这个命题是以未来条件为框架的，人算不如天算，等等。恕我直言，这是小题大做。我们了解这个人。我们不能再装下去了。

川普的行为和宣称的意图让人无法想象，如果投票结果对他不利，他将接受公众的裁决。他惊人地撒谎——要么是为了操纵事件，要么是为了确保优势，要么想逃避责任，又或者想避免伤害自尊。而选举，是所有这些动机的完美结晶。

病态可能对川普在过渡期的选择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已有充分的论证，其中一些论证也出现在本杂志里，表明川普符合精神病和自恋的诊断标准。按照医学上的定义，不管哪种失常都会使他几乎无法接受失败。

传统的评论很难正视这个问题。当记者和舆论制造者问到“如果”川普输了拒绝承认时，他们觉得有必要加上免责声明。《政治（Politico）》会加一句，“这些情景看起来都很牵强。”作者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他把这些情景比作科幻小说。美国前检察官芭芭拉·麦奎德（Barbara McQuade）今年2月在《大西洋》杂志上的文章，也说她无法让自己把这种风险当成真实的：“一个总统会藐视选举结果，这长期以来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如果不是真正的可能性，至少也是川普支持者在开玩笑。”

但川普支持者可不是唯一大声表达宪法以外的想法的人。在这次大选和上一次大选中，川普都被直接问到是否会尊重选举结果。他明目张胆地留下了自己的选择。在2016年第三场总统辩论中，他告诉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我的意思是，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给你留个悬念。好吗？”今年7月，华莱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又一次问了他。川普说：“我得看看。看，你——我得看看。不，我不会就这么说是，我也不会说不。”

到时候他将如何决定？其实川普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2016年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次集会上，他以一个爆炸性新闻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我想向我所有的选民和支持者，以及所有的美国人民承诺和保证，我将完全接受这次伟大的、历史性的总统选举结果。”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食指猛戳三下，以示强调接下来的三个单词：“如果... 我... 赢了！”这时，他才裂开嘴唇，模拟微笑。

这个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假设。川普对投票箱的尊重已经得到过检验。2016年，川普赢得了总统选举团票，却公然拒绝经过认证的计票结果。计票结果显示，他输掉了2868692票。他毫无根据但并非巧合地声称，至少有300万非法移民为希拉里·克林顿投了假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不存在一个川普祝贺拜登获胜的隔年版本。他已经告诉我们了。8月24日，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他们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这场选举的唯一方法就是，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除非在选举团中赢得真正的胜利，否则川普的拒绝让步——仅仅是否认失败——将产生连锁反应。

标志着选举结束的仪式在1896年才有了现代形式。那年投票结束后的星期四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收到了不受欢迎的消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詹姆斯·琼斯(James K. Jones)的一封信告诉他，“已知的情况足以确信我会失败”，布莱恩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给他的共和党对手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写了一封电报。布莱恩写道：“琼斯参议员刚刚告诉我，选举结果表明你已当选。我要赶紧向你表示祝贺。”“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美国人民，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

自布莱恩之后，礼让成为一种公民义务，通过电报或电话进行，后来通过公开演讲。1928年，阿尔·史密斯（Al Smith ）在电台进行了他的败选演讲，不久之后，又上了电视。

和其他仪式一样，礼让发展成了一种礼仪。落选人首先出场，感谢支持者，宣称他们的事业将继续下去，并承认对手已经获胜。胜者则在对降服者表示敬意之后开始自己的发言。

礼让采用一种语言学家称之为表演性言语的词语形式。这些语词并不描述或宣布一种行为，话语本身就是行为。“因此，败选演讲就不仅仅是报告选举结果或承认失败，”政治学家保罗·科科伦(Paul E. Corcoran)写道。“它是新总统权力的宪法体现。”

在实际战争中，而不是政治战争中，让步是可选择的。胜方可以强行拿走败方拒绝投降的东西。如果实力较弱的一方不肯求和，城墙会被攻破，总部会被夷为平地，领袖则会被俘虏或处死。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政治斗争仍然以这种方式结束，但不是这里。因此，输家的让步是难以取代的。

看看2000年的大选吧，乍一看，可能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选举之夜，阿尔·戈尔(Al Gore)向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认输，然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让步，并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场重新计票之战，直到最高法院将其关闭。人们普遍认为，法院5比4的裁决决定了这场比赛，但这并不完全正确。

12月12日，最高法院对“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做出裁决，此时距离选举团召开会议还有6天，距离国会认证结果还有数周。即使佛罗里达州的核票活动已经停止，戈尔仍有宪法上的手段继续战斗，一些顾问也敦促他这么做。如果他把争议提交给国会，作为参议院议长，他就能占据制高点。

直到12月13日，也就是法院裁决后的第二天，戈尔向全国发表讲话，这场较量才真正结束。作为一个弹药未用尽的人，戈尔放下了武器，他说：“我接受这一最终结果，下周一选举团将批准这一结果。今晚，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

如果拜登似乎赢得了选举团，而川普拒绝承认，我们并没有结束这次选举的先例或程序。我们将不得不发明一个。

从某种程度上说，川普是一个软弱的独裁主义者。他有嘴，但没有肌肉来保证其意志的实现。川普谴责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但无法解雇他。他指责他的敌人叛国，却无法将他们关进监狱。他扭曲官僚机构，藐视法律，但没能完全挣脱它们的束缚。

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不会冒选举失败的危险。他会提前确定自己的胜利，避免推翻错误的结果。川普不能这样做。

但他并非没有能力扭曲选举程序——首先是在选举日，然后是在空位期间。如果选票情况不妙，他可以扰乱计票。如果不奏效，就尝试完全绕过计票。在选举日，川普和他的盟友可以从压制拜登的选票开始。

在这一点上兜圈子也将会无法找到真相：川普不想黑人投票。(2017年，他就这么说过。据泄露给《政治》的一段录音显示，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他对马丁·路德·金联合创立的一个投票权利组织这样说过。)他不想年轻人或穷人投票。他有理由相信，如果投票率高，他赢得连任的可能性就会低。这并不是一个“双方”的现象。在当今的政治中，我们看到一个政党不断地通过剥夺另一个政党的追随者的投票权来寻求优势。

就在不到一年前，贾斯汀·克拉克(Justin Clark)在威斯康辛州对一群经过挑选的共和党律师听众进行了一次闭门演讲。他以为是私下演讲，但有人带了录音设备。他对选举日运作（Election Day operations，他们叫‘EDO’）说了很多。

当时，克拉克是川普连任竞选团队的一名高级副手；7月，他被提升为竞选副经理。“威斯康辛州是个或者倒这边或者倒那边的州，因此，这使得EDO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他说得很直白：“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人压制选民……(民主党的)选民都在该州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们开始稍微进攻一点。这就是2020年你将看到的，将会明显的不同。这将是一个更大的项目，一个更有侵略性的项目，一个资金更充足的项目，我们将需要所有我们能得到的帮助。”(克拉克后来声称，他的言论被误解了，但他的解释在上下文中毫无意义。)

克拉克解释说，在所有有利于川普选举日行动的迹象中，“首要的是同意令走了”。他指的是一项法院命令，禁止共和党特工使用一系列选民清洗和恐吓手段中的任何一种。这项命令的到期有着“巨大，巨大，巨大，巨大的好处，”克拉克说。

他的律师听众知道他的意思。2020年的总统大选，将是40年来首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投票站的任何“选票安全”行动都没有联邦法官要求获得提前批准。2018年，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共和党人最近违反了同意令，允许同意令到期失效。按照这种逻辑，同意令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是有效的。

同意令起源于1981年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根据地区法院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案中的意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涉嫌雇佣用休班执法人员作为“全国选票安全工作队”成员恐吓选民，其中一些人携带着武器和对讲机。原告称，他们在少数族裔社区拦截和询问选民，阻止选民进入投票站，强行限制投票站工作人员，质疑选民的投票资格，警告非法投票将受到刑事指控，而且通常会竭力将选民吓离投票站。这些方法的威力来自于有色人种对与警察接触的有充分理由的恐惧。

今年，在没有法官监督的情况下，共和党在15个竞争激烈的州招募了5万名志愿者监视投票站，挑战他们认为外表可疑的选民。8月20日，川普打电话给福克斯新闻，告诉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我们会有警长，我们会有执法部门，我们还会有，希望有美国检察官”来密切监视投票站。克拉克称，几十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可以在“民主党人管理的地方”自由打击选民欺诈。

选民欺诈是一种对选举结果的虚假威胁，是共和党人用来阻挠或放弃可能对手选票的借口。据无党派智库布伦南正义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一份权威报告计算，三次选举的选民舞弊率在0.0003%至0.0025%之间。另一项由洛约拉法学院(Loyola Law School)的贾斯汀·莱维特(Justin Levitt)进行的调查发现，在2000年至2014年美国10多亿张选票中，只有31项可信的冒充选民的指控。投票权案件的法官也做出了类似的事实认定。

尽管如此，共和党及其盟友还是以防止今年选举中的舞弊为名，提起了数十起诉讼。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寻求——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清除选民名单、收紧临时选票规定、坚持选民身份证明要求、禁止使用投递选票箱、减少可邮寄选票、丢弃有技术缺陷的邮寄选票，以及取缔在邮戳在选举日之前但选举日之后才送达的选票。这样做的目的和效果就是要丢掉大量的选票。

这些法律上的花招来自共和党的老套路。在这一轮大选中，除了努力的激烈之外，不同的还有对邮寄投票的关注。就在新冠疫情驱使数千万选民接受邮寄投票之时，总统对邮寄投票发起了无情的攻击。

今年的总统大选，邮寄投票的规模将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一些州预计邮寄投票的数量将增加10倍。《华盛顿邮报》对全美50个州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1.98亿合格选民，即至少84%的选民，将可以选择邮寄投票。

川普频频紧急谴责邮递投票，播放荒诞的噩梦。有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邮寄投票将导致大规模的欺诈和滥用。它还将导致我们伟大的共和党的终结。我们绝不能让这场悲剧降临我们的国家。”另一天，他提到一个想象中的——很容易被揭穿的——来自国外的造假情景。“2020年大选被操纵：数百万张邮寄选票将由外国和其他国家印刷。这将是我们时代的丑闻！"

到了夏末，川普对邮件投票的抨击达到了平均每天将近4次——这是他过去为了应对弹劾和穆勒调查等关乎存亡的危险时的频率：“对我们的国家非常危险。”“一场灾难。”“历史上最严重的操纵选举。”

夏天也带来了美国邮局被川普新任命的邮政局长路易斯·德乔伊(Louis DeJoy)从内部围攻的报道。美国邮政服务（U.S. Postal Service，简称UPS）作为政府最受欢迎的机构，德乔伊是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服务削减、高层管理重组和混乱的运营变化，正在造成长期的延误。《洛杉矶时报》报道称，在一个分拣站，“工人们处理包裹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进度，到了8月初，蚊虫和啮齿动物已经在腐烂的水果和肉类容器周围成群结队，盒子里的小鸡都死了。”

邮政总局开始以提高效率的名义报废了10%的邮件分拣机。接着又有消息称，UPS将不再把选票作为头等邮件处理，除非一些州将每封信的邮资涨三倍，从20美分增加到55美分。德乔伊否认有任何拖延邮件投票的企图，在批评者的猛烈抨击下，邮政撤回了这个计划。

如果对川普在这些变化上的立场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他在8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解决了这些疑问。民主党人正在谈判增加250亿美元的邮政资金，并向各州提供额外36亿美元的选举援助。“他们没钱去做全民邮递投票。因此，我想他们不能这么做。”川普说。“这很简单。没有钱做怎么做呢？”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

川普对邮寄投票的敌意部分反映了他的信念，即更多的投票在总体上对他不利。3月底，他在《福克斯和它的朋友们》(Fox & Friends)节目中说，民主党人想要达到的“投票的水平，只要你同意，你就永远别想再有共和党在这个国家当选”。

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川普的敌对行为会自食其果。密歇根州共和党前执行董事杰夫·蒂默(Jeff Timmer)告诉我：“在我看来，这完全不合理。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以及他们的州党组织，正在压制他们自己选民的投票率。”这包括多年来通过邮件投票的共和党老年人。

但川普对邮寄投票的讨伐，只是他对过渡期计划一种策略上的表达。总统其实并没有企图完全阻止邮寄投票，他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是在诋毁这种做法，剥夺它的资源，向他的支持者发出亲自投票的信号，并且，为大选之夜后对结果提出质疑的计划做准备。这是一个预期自己会被淘汰，意图捣乱投票的人的策略。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说法，“在正常时期”，通过邮件投票并不有利于任何一方。但那样的表述却能起很大作用。他们在6月发表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考虑总统言论可能产生党派倾斜。川普对选举欺诈的系统性预测似乎对共和党的投票意向产生了强大影响。以佐治亚州为例，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 在7月底的一项民调发现，60%的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但共和党人只有28%。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两个战场州，要求邮寄选票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出数十万。

换句话说，川普创造了一个区分朋友和敌人的指标。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律师会发现这在诉讼计票时很有用。只需要通过数字游戏，他们可以把通过邮寄方式投出的选票视为敌对选票，就像他们对待城市和大学城选民亲自投出的选票一样。这些都是他们要争夺的选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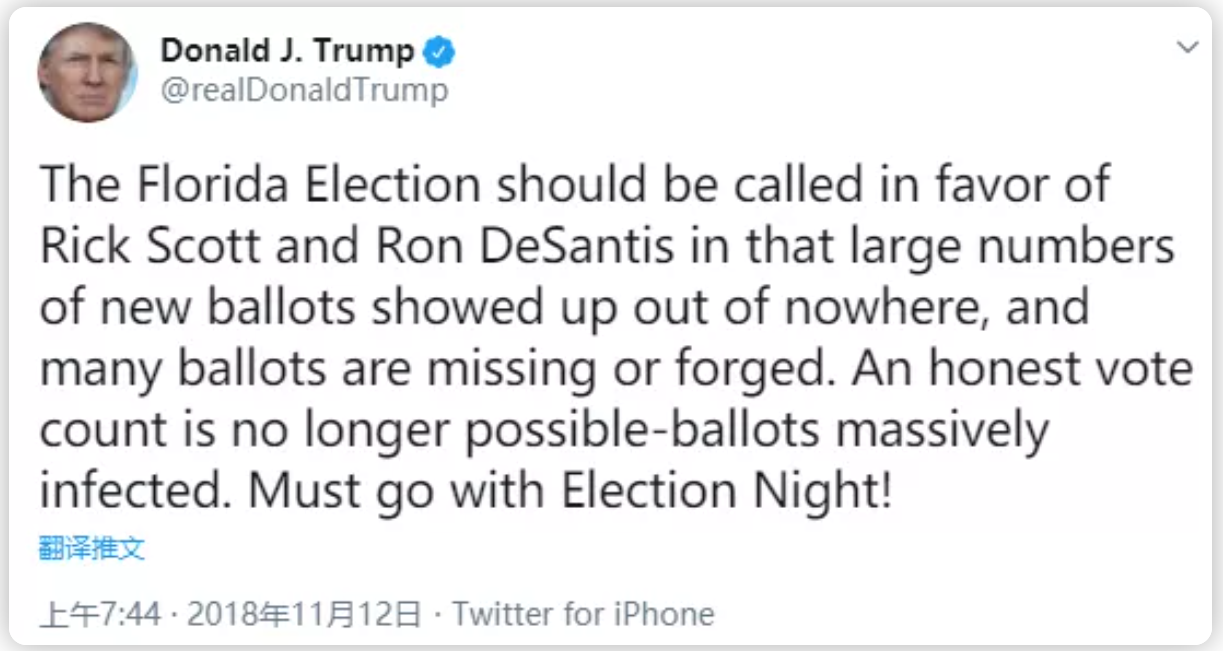
如果趋势保持不变，空位期的选战空间将由一种被称为“蓝移（blue shift）”的现象所塑造。

俄亥俄州立大学宪法学教授、选举法专家爱德华·弗利(Edward Foley)是研究蓝移的先驱。他在超时计票中发现了一种以前未被注意到的模式——大选夜之后的核票工作会统计迟报的选区，未处理缺席票以及资格需要确认的选民所投的临时票。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超时计票没有产生可预测的党派效应。在大选年，有的州在大选日后的核票转向了红色，有的则转向蓝色，但这些转变很少能大到足以产生影响。

大约20年前，有两件事开始发生变化。超时计票越来越多，而且趋势也是越来越蓝。在今年一篇更新的论文中，弗利（Foley）和他的合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斯图尔特三世(Charles Stewart III)表示，他们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种转变有利于民主党。(有一些因素：城市选票的计票时间需要更长，而且大多数临时投票的选票都是年轻人、低收入者或流动选民，他们一般倾向蓝色）。在2012年的超时计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佛罗里达州(净增加27281票)、密歇根州(60695票)、俄亥俄州(65459票)和宾夕法尼亚州(26146票)等摇摆州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不管怎样，奥巴马都会赢得总统大选，而这种幅度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势均力敌的竞争的结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赢得了数万张超时投票，但还不足以挽救她。

蓝移尚未决定总统选举，但它已经颠覆了2018年亚利桑那州参议院的选举。共和党人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在选举日次日领先15403票，似乎胜券在握。弗利写道，随后几天的核票活动，则让民主党人基尔斯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以“巨大的超时计票71303张选票的优势”一举进入参议院。

然而，当年抓住川普注意力的是佛罗里达州。选举之夜，共和党人在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激烈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随着蓝移的生效，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眼看着自己在州长竞选中的领先优势缩小了18416张选票。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在参议院的优势下降了20231。11月12日凌晨，也就是大选日的第六天，川普已经看够了。他在推特上毫无根据地写道：“佛州大选应该宣布里克·斯科特和罗恩·德桑蒂斯胜出，因为大量的新选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而且很多选票要么丢失要么是伪造的。诚实的选票统计已经不可能了—— 选票已被大规模污染。（计票）必须锁定选举夜！”



川普对别人选举中的蓝移的恐慌，让他编造了舞弊的指控。这次大选，当他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时，蓝移可能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即使在正常年份，邮寄选票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统计，而今年的邮寄选票将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多出数千万张。很多州禁止在选举日之前处理提前邮寄的选票；有些州则允许计算迟到的选票。

2018年，川普作为旁观者的本能——停止计票——今年看起来更像是策略。川普全国竞选团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顾问告诉我：“大选之夜会有结果，全国都会预期赢家和输家被宣布。而如果大选日之后的计票改变了大选夜的结果，那么就一场狗屎风暴（shitstorm）的基本要素就具备了。”

我说，没有“如果”，计数一定会变。顾问同意，“是的。”核票会产生更多支持拜登而不是川普的选票。民主党人会坚持尽可能延长核票的时间，好统计到每一张选票。这位顾问说，由此产生的冲突是自作自受。

他说：“这是他们自找的。他们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投票率，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坏处。他还说，“在选举之夜会有一次点票，点票结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终点票结果会被质疑不准确，或者欺骗——随你用哪个词。”

有的选举建模师认为，有序计票最糟糕的情况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根据亲自投票结果，川普在大选夜领先，但随着邮寄选票的统计，他的领先优势慢慢让位于拜登的胜利。民主党数据建模公司鹰鱼（Hawkfish）的首席执行官乔希·门德尔松(Josh Mendelsohn)称这种情况为“红色海市蜃楼（the red mirage）”。在街头抗议、社交媒体以及川普拼命锁定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动荡可想而知。川普的一名法律顾问说：“你能想到的任何场景都没现实那么怪异。”

选举律师在激烈的竞选中讲究“诉讼余地”。早期报告中的计票越紧，剩下的选票就越多，就越有动力在法庭上打官司。如果真有选举管理者的祈祷，就像有些人半开玩笑说的那样，那将会是：“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压倒性的胜利吧。”

压倒性的胜利能让我们在空位期免于冲突吗?从理论上说，是的。但可能性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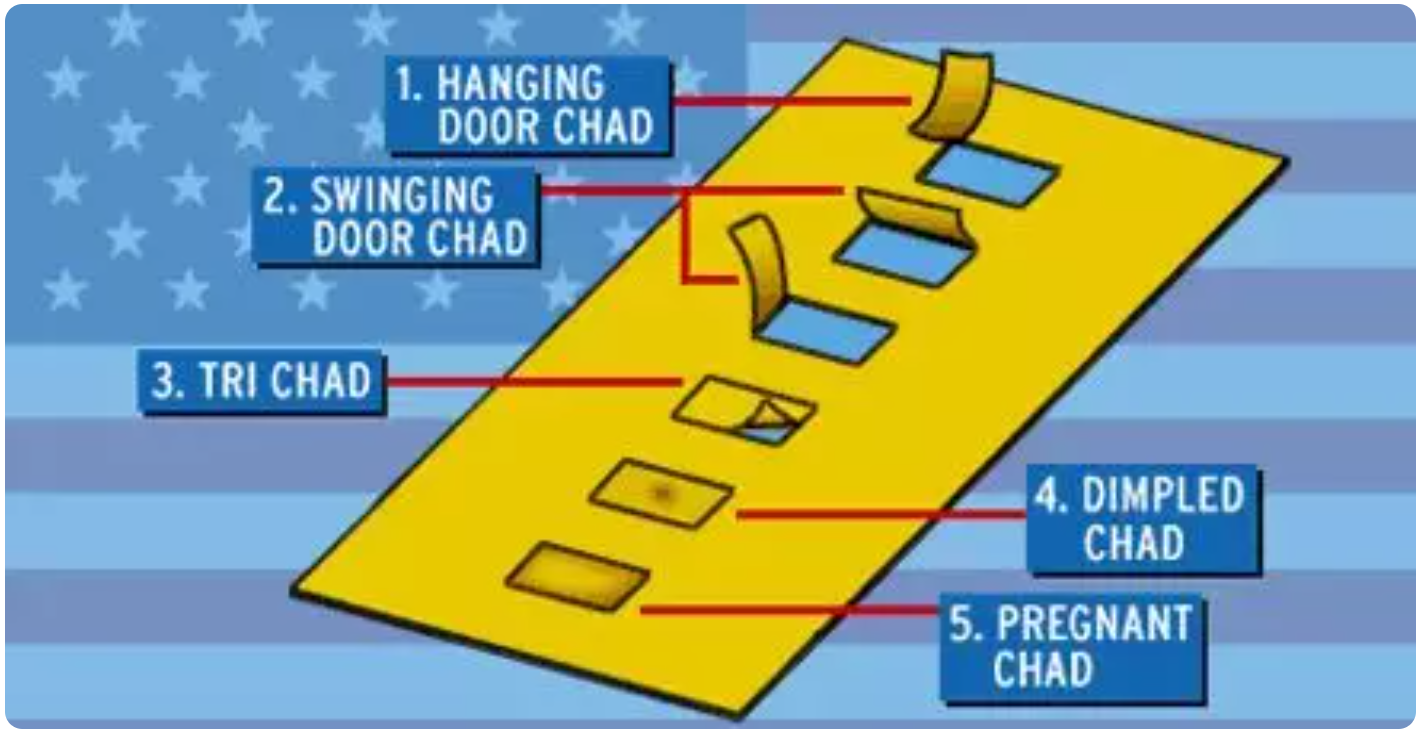
很难想象，川普在选举之夜会有如此巨大的领先优势，以至于让拜登望尘莫及。除非摇摆州能够在当晚清点大部分邮递选票，而这对其中有些州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对蓝移的预期将让拜登继续战斗。另一方面，如果拜登在大选夜大幅领先，川普就没可能追上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能会首先在佛罗里达州看到。但考虑到共和党在亲自投票选民中的优势，这种情况对拜登来说是极其乐观的。无论如何，川普不会认输。空位期早期，他会有实际的选择来让这场竞争继续下去。

双方都在为州和联邦法院紧急动议的洪流做准备。他们已经在40多个州的法院小打小闹了一整年，大选日将开启一个法律斗争的高潮阶段。

邮寄选票会有很多川普律师可以抓住不放的缺陷。邮寄投票比亲自投票更复杂，在每一个步骤中技术错误都很常见。如果选民提供了新的地址，或者写了不同版本的名字（比如将Benjamin缩写为Ben），或者多年来的签名发生了变化，或者在签名栏写了印刷体的名字，或者没有将选票封在内层安全信封内，他们的选票都有可能不会算数。在亲自投票的情況下，选区內的投票站工作人员可以解决类似这些小错误，例如指引选民在正确的签名栏签名，但以邮寄方式投票的人可能没有机会解决这些问题。

今年春天的初选期间，共和党的律师们在全国各地的县级选举办公室为11月的投票进行了演练。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一名律师马修·沃尔夫(J. Matthew Wolfe)6月份撰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报告了这样一次演习。沃尔夫与另一名共和党律师以及川普竞选团队的一名成员一起，密切注视着费城选举专员对邮寄投票和临时投票进行核票，但没有进行干预。沃尔夫对不完善的地方进行了编目，标记下其政党可能提出的异议。

签名缺失，部分签名，签名放错了地方。里面的安全信封上应该没有标记的名字，还有根本没有安全信封的选票。沃尔夫写道，有些寄来的信封“没有邮戳，或者邮戳难以辨认”。—— 注意，邮戳将成为2020年的“hanging chads”。有些选民在签名日期处填上了自己的生日，还有的人则写了“一个不可能的日期，比如初选后的日期”。



*“hanging chads”缘起于2000年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的总统竞选。“chad”是在卡片上打孔时留下的纸片。当时佛罗里达州的选民使用打孔卡选票。如果打出的小孔完全脱离了选票，计票机就会将每个小孔登记为一张选票。但有时小纸片会部分或完全粘在选票上——这可能让机器无法读取它们。所以，“hanging chads”就是当你在卡片上打了一个孔，但没有打完全部，留下一小块悬空。还有“pregnant chads”，指你试图打一个孔，但只是留下一个凸起，没有真正打穿。这两种情况未被机器计算时，争议就出现了。人们的选票没有被计算在内。（译者注：）*

沃尔夫写道，委员们的一些决定“明显违反了选举法中的方向和措辞”。他建议到11月，“与政党有关的人审查每一份申请和每一个邮寄选票信封”。这，正是计划。

双方的法律团队都正在计划在多个战场州同时进行诉讼，规模与2000年大选期间的佛罗里达州相当。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投票权和选举主任迈娜·佩雷斯(Myrna Perez)告诉我：“我的钱会放在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些要成为麻烦的点。

在任何选举中，都有无穷无尽的偶然情况可被律师利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蒙哥马利县，离沃尔夫的费城实验地点不远，县共和党委员会收集了初选期间据称在投票箱发生的可疑事件的监控式的照片。在一个序列中，一名县政府雇员被描述为将“没有安全保障的选票”放在汽车的后备箱中。另一张照片则称一名保安“正在断开为监控摄像头供电的发电机”。这些照片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脱离背景是不可能判断的——但它们正是那种伪证据，肯定会在空位期早期被病毒式传播。

选斗不会局限于法庭。地方选举裁判员可能会被指名道姓，被当作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或安提法（antifa）的代理人而遭受诬蔑和攻击。自命为选票监护人的激进人群将竭力重演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案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时的“布鲁克斯兄弟暴动（Brooks Brothers riot）”，当时布什竞选团队出资的示威者上演了一场暴力抗议，阻止核票员完成迈阿密·戴德县（Miami-Dade County）的重新计票工作。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尽管规模比我们预期11月的要小。对于川普，我们还必须问：一个无情的在任者可能会做什么从未尝试过的事情？

假设川普支持者的大篷车，戴着第二修正案的配饰（由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延伸而来的拥枪权，这个配饰可想而知是什么。译者注），在大选日聚集在大城市的投票站。他们说，他们来调查社交媒体上关于选民欺诈的报道。反抗议者到达后，发生拳脚相向，枪声四起，选民要么逃离，要么无法到达投票站。

接着，假设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穿着战斗服的联邦人员，提前在附近就位，进场恢复法律和秩序，以确保投票安全。在持续的冲突中，他们留下来监督投票，关闭通往投票站的街道，保管未清点的选票，以保存舞弊的证据。

“总统不能取消选举，但如果他说‘我们处于紧急状态，因为发生了暴力事件，我们要关闭这个地区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呢？”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简称AEI）的诺姆·奥恩斯坦（Norm Ornstein）说。如果你是川普阵营轻忽边界的人，“我能预期的是你不会只做这些假设中的一两件事——你会尽可能多地做。”

梦魇有不同的版本。干预的地点可以是邮局。而那个断言也可能是一份假定的情报，报告从中国发来的伪造选票。

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些场景没有哪个与总统已经做过或威胁要做的事情相去太远。川普向华盛顿特区派遣了国民警卫队，在夏季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中，以保护联邦建筑的羸弱借口，向波特兰和西雅图派遣了国土安全部部队。他说，他可能会援引1807年的《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向“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部署美国军队”，以保护“生命和财产”。联邦政府在选举期间几乎没有什么依据进行干预，选举主要由州法律管辖，由大约10500个地方司法管辖区管理，但熟悉司法部长比尔·巴尔（Bill Barr）对总统权力的看法的人应该不会怀疑他能为川普找到授权。

11月3日之后的每一天，总统和他的盟友们就可以喋喋不休这样的信息：合法的统计已经结束，民主党人拒绝尊重结果。川普已经如此大张挞伐了好几个月。7月，他在推特上写道：“必须在选举当晚就知道选举结果，而不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后！”

川普说什么重要吗?人们很容易将选票计数比作体育赛事的比分。输掉比赛的教练尽可以怨天怨地，但当裁判员做出裁决时，比赛就结束了。关于空位期，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此时没有裁判——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威可以决定比赛胜负，让它偃旗息鼓。只有一系列较低级别的司仪，各人均受其管辖权限制，为不透明的规则所缠累。

川普在空位期这一阶段的策略会是一场拖延时间游戏，一场压制计票和取消拜登胜选资格的协同尝试。法院最终可能会介入权衡。但到那时，裁决的场所可能已经转移去了其他地方。

空位期分配了35天的时间来解决计票和随之而来的诉讼。第36天，12月8日，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到来。

在这一阶段，实际的计票统计对结果的影响就不那么显著了。这听起来好像不对，但事实的确如此：交战方，尤其是川普，现在将把注意力转移到总统选举人的任命上。

12月8日被称为“安全港”，是任命538名男女总统选举团成员的截止日期。选举人要到六天后的12月14日才开会，但各州必须在“安全港”日期前任命他们，以保证国会接受他们的资格。控制法规规定，如果在此日期之后仍存在“任何争议或争论”，那么国会将决定哪位选举人(如果有的话)可以将该州的选票投给总统。

我们习惯于通过普选来选出选举人，但宪法中没有规定必须这样做。第二条规定，各州应“按该州立法机关所指示的方式”任命选举人。自19世纪末以来，每个州都把决定权交给了选民。即便如此，最高法院还是在布什诉戈尔案中确认，一个州“可以收回任命选举人的权力”。而一个州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这样做，一个多世纪以来都都没人试过。

川普可能会这么试。据州和国家层面的共和党消息人士透露，川普竞选团队正在讨论应急计划，绕过选举结果，在共和党占据立法多数的战场州，任命忠诚的选举人。基于舞弊猖獗的指控，川普将要求州议员不顾全民投票，行使他们的权力直接挑选一批选举人。川普能成功地让计票结果存疑的时间越长，州议员们在“安全港”到期前采取行动的压力就越大。

从对现代民主的觉察来看，为了党派利益而抛弃民众投票，就像一场政变一样令人不安，无论其在法律上能找到什么样的许可。共和党人对这样的立场会感到不安从而抵制吗？在采取这种伎俩之前，他们会让出选举吗？川普支持者会让共和党人因这种背叛付出高昂的代价，等到那个时候，党内官员会被围困在舞弊的说辞中。

与我交谈的川普竞选团法律顾问告诉我，急着任命选举人将被说成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意愿。这位顾问说，一旦认定超时计票被操纵，州立法者们将希望自己判断选民的意图。

“州议会会说，‘好吧，我们已经被赋予了这项宪法权力。我们认为本州结果不准确，所以这是我们认为正确反映我们州的结果的选举人名单，’”顾问说。民主党，他补充说，因为超时计票创造条件，而容易受制于这种谋略。

顾问接着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选票能在我都不知道的多少天后才到达——有的州是一周，有的州是10天——那么大量选票就会被推后，推后，再推后。所以两难择一：是由议员指定选举人更糟，还是在选举日收到选票更糟？”

当《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询问川普的竞选团队有关绕过投票、任命忠诚选举人的计划，以及文章中讨论的其他策略时，川普连任团队副全国发言人西娅·麦克唐纳(Thea McDonald)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她在电子邮件中说：“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因为维护法治和透明地争取自由公正的选举而被丑化，这令人愤慨。对于民主党人企图彻底颠覆制度，让我们的选举陷入混乱，主流媒体却给予了免费通行证。”她写道，川普正在为一场值得信任的选举而战，“其他任何论点都是阴谋论，目的是混淆视听。”

在宾夕法尼亚州，三名共和党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内部讨论了直接任命选举人的问题，其中一人说，他已经与川普全国竞选团队讨论过这个问题。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主席劳伦斯·塔巴斯(Lawrence Tabas)告诉我：“我已经跟他们提过了，我希望他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不认为现在是我讨论这些策略和方法的合适时机，但（直接任命选举人）是选择之一。它是《宪法》规定的现有的法律选择之一。”他补充说，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一个迅速而准确的统计。“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有缺陷，而且有重大缺陷，我们的公众就可能会对选举的公正性失去信心和信任。”

宾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杰克·科尔曼（Jake Corman）倾向于转移话题，强调他希望清点票数将在选举之夜产生最终的计票结果。“时间越长，产生的意见、理论和阴谋也越多，”他告诉我。如果随着安全港限期的临近，争议仍然持续，他允许，立法机构将别无选择，只能任命选举人。“我们不想走那条路，但我们明白法律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会遵守法律。”

共和党人控制着六个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州的参众两院。其中，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也是共和党人。在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州长都是民主党人。

俄亥俄州选举学者弗利推演过如此操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如果共和党议员无视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等州的投票，任命川普的选举人，民主党州长会以证明官方计票结果作为回应，这是他们行使权力的例行程序。他们会辩称，在投票发生后，议员们不能合法地选择不同的选举人。他们向国家档案馆发出的“确认证书（certificates of ascertainment）”，上面写着他们所在的州已经指定了支持拜登的选举人。每一组相互对立的选举人都将得到州政府一个部门的批准。

在亚利桑那州，负责监督选举的州务卿凯蒂·霍布斯(Katie Hobbs)是民主党人。她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力对投票结果进行认证，并提交一份拜登选举人的名单。即使在共和党统一执政的佛罗里达州，承诺选拜登的选举人也可以开会认证自己的选票，以期引发“争议或异议”，让国会来决定本州的选举结果。在2000年的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之战中，几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年11月26日，共和党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为他的兄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认证选举人，而当时重新计票的诉讼还在进行中。戈尔的首席律师罗纳德·克莱恩(Ronald Klain)的应对是在佛罗里达州旧国会大厦为民主党选举人预订一个房间，为戈尔投下竞争票。直到戈尔在总统选举团投票前五天作出了让步，才让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总统选举团都会在12月14日召开会议，但却无法就谁有合法权利投出决定性的票数达成共识。

对立的选举人可能在哈里斯堡（Harrisburg）、兰辛（Lansing）、塔拉哈西（Tallahassee）或凤凰城（Phoenix）举行镜像会议，将相同的选举人票投给其所代表的一方。按照宪法规定，各方都将把选票“传送到美国政府所在地，直接送达参议院主席（译者注：根据宪法，副总统担任参议院主席，并主持参议院的日常程序。）”。下一步行动将属于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

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政危机，是“空位期”的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然后我们就会被扔进一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世界。” AEI的诺姆·奥恩斯坦说。

两个人都宣称担任总统。离解决这一问题的下一个时机还有三个多星期。

1月6日是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后的日子。现在，控制参议院对总统之位至关重要。

彭斯，作为参议院主席，手中会分别持有几个战场州的两份相互冲突的选举人证书。第十二修正案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做了这样的规定：“参议院主席应当，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场的情况下，打开所有证书，然后选票将被统计。”

注意这里的被动语态。谁来计票？计入的是哪份证书？

川普团队会采取的立场是，宪法语言将这些问题留给副总统。这意味着彭斯拥有单方面宣布自己连任和川普连任的权力。民主党人和法律学者会谴责这是“自我交易（self-dealing）”，并指出国会将用《选举人票计算条例》填补第十二修正案的空白，为如何解决这种争议提供指示。而这些指示的问题在于人们普遍认为——用弗利的话来说——这些指示“错综复杂，难以理解”，“混乱而丑陋”，“是国会颁布过的最奇怪的法律措辞之一”。

如果说空位期是一场寻找裁判的比赛，那么它现在有535名裁判，还有一本没有人知道如何解读的规则手册。而主持比赛的官员就是场上的选手之一。

弗利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法学杂志（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上发表了一份2.5万字的研究报告，推演了如果仅剩一个州的选举人票能起作用，接下来的斗争可能采取的路径。

如果民主党赢回参议院，并守住众议院，那么《选举人票计算条例》列出的所有道路最终都会通向拜登的总统任期。如果共和党人守住参议院，并意外赢回众议院，则情况正好相反。但如果国会仍然分裂，则存在着不可能出现决定性结果的情况——没有一个结果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每个党派都可以引用自己的候选人获胜规则的合理解读。没有一决胜负的加时赛投票。

国会怎么会陷入无法打破的僵局？在这些部分，法律是一个迷宫，太复杂了，无法在杂志文章中描绘出来，但我可以勾勒出一条道路：

假设宾夕法尼亚州单独派出对立的选举人名单，他们的20张选票将决定总统的人选。

对《选举人票计算条例》的一种解读是，国会必须承认由身为民主党人的州长认证的选举人，除非参众两院另外达成协议。众议院不会另行同意，所以拜登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白宫。但彭斯敲响了他的法槌，裁定反对这种法律解读，而是倾向于另一种解读，认为国会必须放弃两份有争议的选举人名单。这条混乱难解的法规从两个角度来解读都合理。

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资格被取消，还有518张选举人票。如果拜登在其中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他就又能获得总统职位，因为他拥有“最多的选票”，正如第十二修正案所规定的那样。但共和党人指出，同一修正案要求“全体选举人的多数票”。彭斯规定，全体选举人的票数是538票，而拜登没有没有达到要求的270人。

按照这个论点，没有人取得总统职位，决定权扔给众议院，每个州一票。如果目前的党派平衡保持不变，50张票中将有26张支持川普。

在彭斯从宾夕法尼亚州转到罗得岛州之前，也就是国会计票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下一个州，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将所有参议员赶出众议院。现在，彭斯无法按照宪法要求，在众议院“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计票。佩洛西宣布计划无限期拖延。如果在就职典礼当天仍未完成计票，议长本人将成为代理总统。

佩洛西准备在1月20日宣誓就职，除非彭斯推翻裁决，接受拜登获胜。彭斯并不让步。他在另一个地点重新召集将众议院共和党人也挤进来的参议院会议，旨在完成计票，让川普成为当选总统。现在，三人声称其赢得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都是言之有据的。

迷宫里还有其他的路，很多都通向死胡同。

这就是下一个宪政危机，比三周前的危机更严重，因为法律和宪法没有规定任何其他协商机构。最高法院可能会进行干预，但它也可能会回避与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另一次创伤性接触。

自大选日以来已经过去了64天。僵局已经形成。距离总统就职典礼日还有两个星期。

弗利预见到这种僵局，他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他无法告诉你，根据现行法律，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或者它如何结束。此时，它并不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川普已拥有白宫。为了保住白宫，他会把界限推到什么程度，谁会反击？这也是总统自上任之日起就产生的问题。

我希望能从一群前民选官员、学者、政治战略家和律师在今夏进行的一系列演习中获得一些启示。在为期四天的模拟中，“过渡期诚信项目（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对选举及其后果进行了模拟，以期找到可能出现分崩离析的支点。

他们发现了很多。其中一些情况包括我所描述的那种对决的选举人名单。在一个版本中，是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州长首先诉诸于任命选举人，此前川普命令国民警卫队停止计票，亲川普的警卫队士兵摧毁了邮寄的选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带领拜登团队在另一种情况下，准备跟随川普步入内战边缘，鼓励三个蓝色州威胁脱离联邦。对规范的破坏导致规范的破坏。(克林顿本人在8月接受Showtime的《马戏团》（The Circus）采访时，看出她有同样观点。“乔·拜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步，”她说。)

关于诉讼程序的文章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报道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空白。没有一篇文章充分解释了大选如何结束。我想知道谁宣誓就任。

我打电话给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她是项目的共同创始人。令人不安的是，她没有答案。她不知道事件的结局如何。模拟有半数情况是参与者没能进行到就职典礼日。

“在这些模拟中，我们陷入宪法僵局，看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法，街头暴力事件，”她说，“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我记得我们让川普援引了《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在街头部署了军队......五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好像说，‘好吧，我们结束了’。 ”她补充道：“一旦事情明显偏离轨道，确切知道到底事态会何去何从，并没有特别的好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找出干预的时刻，找到某些时机，当我们回顾时会说：‘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怎样才能让事件不至于变得如此糟糕？’”布鲁克斯说。项目到那就没能取得太大进展。就一旦发生冲突，怎样约束无法无天的总统方面，没有学到任何经验，也没能设计出替代措施，以避免灾难。“我想你可以说，我们陷入未知世界，没有人能够预测会发生什么，”布鲁克斯在一封后续电子邮件中告诉我。

政治制度可能不再强大到维护其完整性。把选举委员会、州立法机构和国会有能力划定界线，以确保合法投票和有序移交权力看作理所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可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自己划定这些界线。

有些改革需要改天再考虑，当没有选举来临时。小的改革，比如清除《选举人票计算条例》（Electoral Count Act）的模糊部分。大的改革，比如取消总统选举团。显而易见的改革，比如拨款帮助资金匮乏的选举当局，提升其运作水平，以加快并确保选举日的计票工作。

目前，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随时为此捍卫民主。首先要拒绝诱惑，不要以为这次选举将像通常的选举一样进行。很可能会发生一些远超出常规的事。可能不止一件事。期待其他事情发生会使我们的反应变迟钝。它会让我们陷入虚假的希望，认为川普会轻易驯服于制约正常在任者的力量。

如果你是一名选民，请考虑亲自投票。在今年的初选中，即使没有川普试图压制，仍有超过50万张邮递选票被拒绝。如果你患新冠肺炎的风险相对较低，请自愿到投票站工作。如果你认识的人都是开明的人，就请传播信息，和他们说选举夜过后，结果会不断变化是正常的。如果你管理新闻报道，请预见宪法外的措施，并安排记者和工作人员，对此作出应对。如果你是选举管理员，请为你从未想过的突发事件做好计划。如果你是市长，请考虑如何部署你的警察，以抵御居心不良的干扰者。如果你是一名执法人员，请保护投票自由。如果你是一名立法者，请选择不参与欺骗行为。如果你是战场州的法官，请重新熟悉选举案例法。如果你在军事指挥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请记住你有责任将撤销非法命令。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请知道当你被要求做其他事情时，你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做正确的事情。

夺回主动权。除非美国人民在某种程度上默许，否则选举是不会被窃取。布鲁克斯在演习结束后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大规模和平抗议的力量。“我们双方的候选人都试图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大量出动，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来决定，这是起作用的吗？它的作用在哪？”她说。“这给一些人留下了一些大疑问，如果你有橙色革命式的持续数周大规模抗议，会怎么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仅有一次，即1877年，“空位期”使美国濒临真正崩溃的边缘。我们现在不会在那次事件中找到我们的榜样。

在1876年民主党人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和共和党人卢瑟福·海斯（Rutherford B.Hayes）之间的总统竞选中，四个州向国会送出对立的选举人名单。当一个特别法庭祝福海斯的选举人时，民主党人在议会采取措施，以阻挠国会的选举计数。

他们的计划是耗尽时间，一直耗到就职典礼日，届时共和党现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就不得不下台。

直到格兰特任期届满前两天，蒂尔登才作出让步。他的让步是基于一个令人反感的交易，即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军，联邦军在那里保护被解放的黑人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蒂尔登的唯一动机。

军事力量的威胁悬而未决。格兰特让人们知道，他准备在纽约宣布军事戒严，因有传言说蒂尔登计划在那里宣誓就职，并以身着制服的军队支持海斯的就职典礼。

这对2021年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未能产生合法总统，如果川普将僵局维持到新的一年，那么混乱的候选人和总司令将是同一个人。

## 中国大周期和货币

文 | Ray Dalio

近日，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他的领英（LinkedIn）主页上发布了2万字长文《中国大周期及其货币》（The Big Cycle of China and Its Currency）。这篇文章是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达利欧以一个海外观察者的角度，针对中国近年的改革与发展给出了思考。

本文剖析了中国的历史更替脉络，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运作方式，并着重分析了从1949年到现在的中国崛起之路。达利欧将中国崛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6年的基础建设，第二阶段为自2008年之后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今的成为世界大国之后的时期。

“自1985年左右以来，中国一直在管理汇率和利率。”达利欧分析认为，实施健全的货币政策，建立适用于借款人和贷方的良好信用体系的关键是，使该货币不会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商品和服务价格产生任何大的上升或下降。

有不少人告诉我撰写这篇文章的风险，因为美国正与中国进行着某种摩擦与角力，双方都情绪高涨，所以当我说中国的好话，许多美国人会生我的气，当我谈到有关中国的批评时，中国人会生我的气。双方不认可我一些观点的人会迁怒于我，媒体上的许多人也会歪曲我的话。

但是，我不能因为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公开发表我的观点，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且极具争议，对于了解中美两国的人而言这个议题都是难以回避的。对我而言，不诚实地谈论这种话题会有损我的自尊。

9月24日，星期四，我将发布本章的后续章节，该章节涉及美中关系。与过去的前几章不同，该章讲述的是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一章很有趣，那么您会发现下一章更是如此。

我现在正在传递的是我最新的知识更新迭代成果。我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我的直接经验和研究来学习，写下我所学到的东西，向聪明的人展示它，然后让他们批判它，以便对其进行压力测试，然后探索差异，再进一步发展它，一遍又一遍，至死方休。

因此，这项研究是我迄今为止36年来所做的结果。它并不完善，是非对错还未被充分检验，它是为了帮助我们共同找出正确的事物而提供给您使用或批评。

本章是关于中国和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的。它的目的是传达中国人的来历。接下来的章节是关于美中关系的，这是前两章和本章所涵盖背景的延伸。

### 1、背景

尽管我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治理方式的专家，但我在过去的近40年中与中国有着许多直接的经验，我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历史和经济研究，并且拥有美国和全球视角。因为我需要在实际运行的宏观经济方向上下注，这个视角让我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使我对中国过去以及目前的状况有一些不同寻常见解，这可能对那些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有所帮助。

更具体地说，我在这里传递给您的观点来自于我过去36年与中国人就中国和世界问题（主要是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和市场）进行交流以及进行大量研究所获得的经验。通过我的自身的经验，加上对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的学习了解，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以及中国治理模式的运作方式以及它几千年来的发展：比如家庭礼序、儒家思想还有新儒家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的为政得失。

当我说“中国文化”时，我指的是这些典型的中国价值观和经营方式，我在自己的经历和研究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发掘出中国是如何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愿意。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还研究了中国历史，这是我研究帝国及其货币的兴衰的一部分，目的是总结出关于帝国兴衰更迭的普世规律，并帮助我理解受历史影响很大的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我在研究团队的帮助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世界上一些最博学的中国、美国和非美国学者以及从业者进行了相互验证，从而完成了这项研究。

尽管我对自己直接接触过的人和物的印象有充足的信心（这使我对我对华人的主张比在本书前文中对荷兰和英国帝国的主张更加确定），我当然无法完全把握自己没有直接接触过的人和环境。因此，我对它们的想法更是一种基于广泛研究后的推测。

在我与中国36年的经验中，我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保持着比较亲近的联系。与我经历过的美国一样，我也经历了中国的最近一段时期的历史。最终我相信我对美国和中国的看法都是正面的，我会尽力在这里传达他们。

我敦促那些没有在中国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摆脱对旧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并回顾那些偏见的政党经常描述的情景，这些政党也没有在那儿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错了。我敦促您与在中国工作了很多时间的人一起，对所听到或阅读的内容进行交叉验证。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诚以及媒体扭曲阻碍了人们对不同的观点的周密探究，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可怕标志。

明确地说，我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做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例如，我不会根据是符合美国、中国还是我自己的思想信念来选择美方或中方。我很实际，就像医生一样，医生通过逻辑来对待事物，并且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是会行之有效的。我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使我对有效的方法产生了信念。

在本书开始时，我认为对使国家富裕起来最重要的是17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而在我经常提到的8种衡量标准则更为狭窄。因此，当我看中国时，正是通过这些因素来判断中国。我也尝试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他们的情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乞求您的耐心和开放态度，因为我与您分享了我学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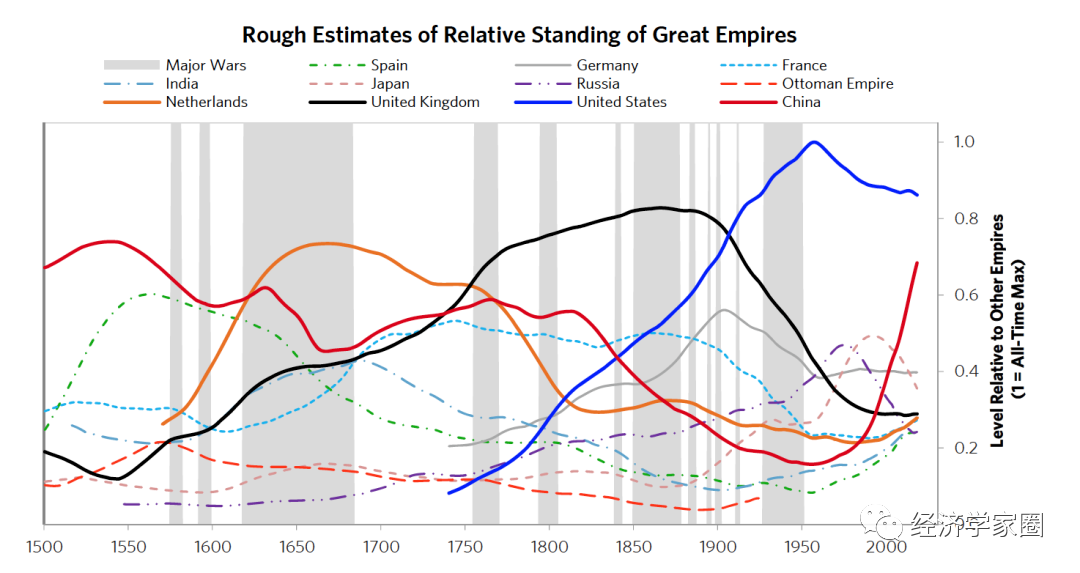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诞生，我们将简要回顾它从1800年代初的卓越无比到20世纪初的微不足道的衰落历史，并且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它起于毫末到与成为当今世界领先大国的兴起，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了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如何分别成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储备货币帝国，然后在由一个普世的因果律驱动的周期中变得相对衰弱。然后，我们看到了美国如何在相同的原型因果率驱动下，按照相同的周期性模式广泛取代英荷两国，成为世界主导性帝国。我们看到了在它的八个主要领域中，有些领域先起后衰（例如，教育，经济竞争力，世界贸易和产出的份额），有些依然卓越（创新和技术，储备货币地位，金融市场中心），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例如，货币和债务周期，财富/价值/政治周期等）如何在美国演变。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中国看待过去的方式，并借助客观的统计方法使我们了解现在，从而客观地描绘出形势。

就像在美国一章中一样，我们将简要探讨古代和近代的历史，对1949年之前的220年历史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最近的40年，中国从相对弱小的国家演变为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力量，这段历史将会着重讨论。

这将完成我们对过去500年来主要帝国的兴衰的考察。然后，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目前存在的中美关系和风险，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我们将尝试窥探未来。



### 2、中国历史简述

任何想基本了解中国的人都需要了解中国大约4000年历史的基础知识，以及其中不断重复的模式，和从中提取得到普世原则，即使了解这些知识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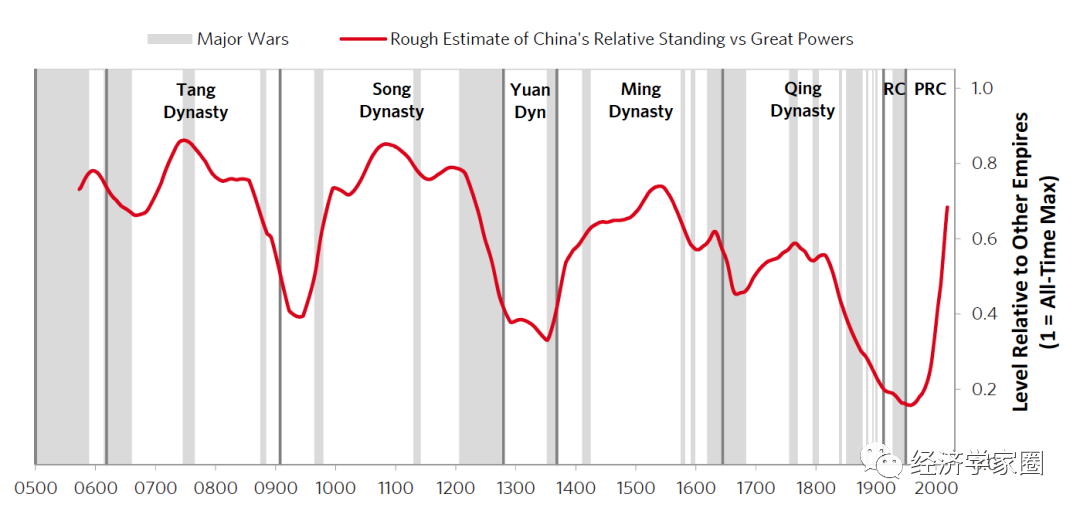
中国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对它的看法如此之多，以至于我觉得没有一个说法是完全客观可信的，尤其是我肯定不是。但是共识依然存在，而且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学者和实践者都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尝试将他们的经验知识拼凑在一起，并辅之以诸如数据统计和文字史料，这是一个既有价值又令人着迷的工作。

尽管我不能保证我对中国的观点是最好的看法，但我可以保证它们已经与世界上一些最有见识的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以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呈现在这里。下面是简要的叙述。

中国文明以其高度文明的行为，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我无法描述它的广泛性，因为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朝开始（历时约400年，以其高度文明化而闻名，并以创造青铜时代着称），到公元前500年的孔子（其哲学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人的举止），到秦王朝（在公元前221年将我们现在所指的大部分中国地区统一），高度发达的国家汉代（发展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治理系统）从公元前200年左右持续到公元200年左右，然后是许多其他朝代，再到到618年的唐朝，这期间经历了无数朝代更迭。

我快速浏览了从夏朝时期 [1]到公元600年的中国历史（即在显赫的唐朝之前），查看了大部分的王朝，仔细了解其形态。我写了关于他们的研究，这部分将在以后再分享。现在，我将简要地简要介绍600年后的时期。

**在下面的图表中，我绘制了一张公元600年至今中国的力量比较图。它传达了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帝国的强大力量。**尽管该国各地还有其他朝代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存在，但我没有在这张图表中显示它们，因为那样会产生太多细节，以至于无法展现真正的大局。如您所见，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除了1840年左右到1950年左右急剧下降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如图所示，大约在1950年，它开始重新崛起，起初缓慢然后非常迅速，重新获得了其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地位。



在过去的14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朝代都非常强大，文明且繁荣。

唐朝以后，中国扩大了疆界，并经历了文化的繁荣。在南北朝时期（从900年代到120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和活力的经济体。在明朝（1300到1600年代），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大国，享有一段既富裕又和平的美好时期。在清朝初期（1600到1700年代），中国拥有最大的领土扩张范围，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时拥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然后在1800年代初期到1900年代上半年，中国实力衰落，而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实力增强。从1800年左右到最近，亚洲的财富和权力逐步转移到了欧洲，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的财富和权力转移，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衰弱，这种权力和财富的转移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不是常态。这种演变和这段历史所提供的教训在中国人的心中非常重要，对我而言尤其有趣。

在上图中，周期性的起伏是值得关注的。其中的原因我在描述大循环周期的时候解释过，源于周期性力量的获取与衰弱和短板的暴露和修补（我将在本书的第2部分中为您详细介绍这些朝代的兴衰，其中将更深入地介绍本书所涵盖的主要帝国和朝代的主要周期）。

请注意，这些朝代大周期通常持续约300年。在每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皇帝为使王朝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所做的工作，以及挫折和衰落的原因。换句话说，这些历史中蕴藏着许多教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学习历史以汲取经验教训，以帮助他们计划未来并处理眼前的事件。相信我，从这些历史中汲取的教训现在正在指导中国的决策。

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是，看到原型大循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并进行了如此详细的描述，因为中国的连续历史是如此古老，而且文献记载如此丰富。有趣的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世界相遇并互动时发生了什么？随着自那时以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和西方大循环如何受到影响？彼此之间的联系使它们成为这两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最大影响力之一。

在自习研究不同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并初步了解他们几千年更久远的历史后，最重要的感受就是我看到的与我之前所认知的完非常不同。我发现这对于我观念的改变类似于在Google地图把视角拉高，这样我可以看到之前从未见过的历史轮廓。我还可以看到，同样的故事由于基本相同的原因而反复出现，并且我学到了关于一些大事件如何发生以及更好应对的普世真理。除了影响我对事物的看法之外，我还了解到对历史不间断的研究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只拥有大约300年历史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来自欧洲的定居者），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大，我可以看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想法截然不同。

例如，对美国人来说300年是很长的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近的事。尽管一场革命或一场战争会颠覆我们的体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看到他们一直在发生，而中国人已经研究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特定事件，特别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并根据它们的发生情况进行了分析。尽管美国人为目前的需求而战，但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制定如何在未来达到目标的战略。由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国人通常比美国人更具有思想性和战略性，而美国人则更加冲动和战术。

我还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具哲学性（从字面上读懂哲学）。如果您阅读他们的著作和演讲，您会发现这是真的。关于现实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的哲学融入了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表达。

就历史的长期周期以及他对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交换了看法。谈到了阅读老子的《道德经》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对理性的批判》，以及如何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最终事情到来之前，尽力做好自己的事。

要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价值观，这与了解他们的历史以及通过几代人的经历和反思所产生的价值和哲学同样重要。他们的历史和由此产生的哲学，最重要的是其儒道，道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相比于美国的历史及其犹太，基督教，欧洲哲学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历史，以及学习历史。

例如，毛泽东，像其他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是历史和哲学读者。写诗，并且练习书法。例如，一位尊敬的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毛泽东读了无数次《资治通鉴》（这是一部长达294卷的中国历史志，涵盖了大约16个王朝和1400年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960年）还有更长篇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和非中国哲学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他最喜欢的书是《左传》，覆盖从公元前722年至468年之间，它以“理性的写实风格” [2]聚焦于政治，外交和军事事务。因为《左传》提供的经验教训与他正在遇到的情况高度相关。他还写哲学著作和演讲。

如果您还没有阅读过他写的书，并且对他的想法感兴趣，那么我建议您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这里有他对一些主题探讨的语录汇编，我只有时间略读，但印象深刻。这本书非常有趣且丰富，内容与今日息息相关。[3]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感兴趣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谋求发展，相比之下美国人更愿意寻求快速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具备战略性，美国人更加有战术性。

中国人最关注百年的历史长度（因为这是一个好的王朝可以持续的时间长度），他们了解典型的发展过程有数十年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们做好了计划。

例如，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发生，赢得国家控制权，权力和机构得到巩固的时期。第二阶段发生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领导下，在不威胁领先的世界大国（即美国）的前提下，建立财富，权力和凝聚力。第三阶段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将中国推向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阶段。中国将成为“一个繁荣，强大，民主，先进，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将使中国经济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两倍[4]。近期计划中列出了近期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例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5]《中国标准2035》计划以及通常的五年计划。[6]

中国实现了大部分目标。我并不是说这个过程是完美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导致挑战的分歧，包括一些关于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私下里）有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他们有更长期、基于历史的观点、以及规划视野，他们把这些划分为更短期的计划和运作方式，通过遵循这种方法，他们已经出色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顺便说一句，多年来我巧合地发现，我学习历史、寻找模式和处理战术决策对我看待和做事情的方式有类似的影响。现在把过去的500年看作是近代历史，最相关是近100多年，从这个角度看，我观察所采取的模式是非常有助于预测事件如何发生，并让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和几年中如何定位。

### 3、中国的经验及运作方式

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对中国人的经验和他们在千年中汲取的教训的延伸。他们在哲学中阐明了事物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在处理这些现实时什么方法最有效。这些理念明确了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进行政治决策以及经济体系应该如何运作。

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犹太基督教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每个人几乎都从这些中选择出适合他们的组合。在中国，主要的思想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直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从历史上看，最受欢迎的搭配就是皇帝最喜欢的搭配。皇帝通常会研究中国历史，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并提出自己的偏好，将它们付诸实践，学习和适应。如果这种组合有效，那么王朝就可以生存并繁荣发展（按照他们的说法，它具有“天命”）。如果不是，它将失败，并由另一个王朝取代。这个过程从记录历史开始就一直存在，并且只要有人决定如何共同做事，这个过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我很难用几句话就把这些哲学解释清楚（我将在第二部分更深入地讨论它们），以下是我能做到的：

1、儒家思想寻求通过让人们知道自己在等级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知道如何很好地扮演角色来实现和谐。从家庭开始（在夫妻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等）一直延伸到统治者及其臣民，他们通过善行和顺从绑定在一起。每个人都尊重和服从他们之上的人，他们既善良又对他人施加行为标准。所有人都应该善良，诚实和公正。儒教重视和谐，基础广泛的教育和任人唯贤。

2、法家主张专制领导人尽快征服和统一“天下”。它认为，世界是一个“杀或被杀”的丛林，皇帝的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对它的严格服从必须存在，而皇帝/政府不能给人民太多的仁慈。西方与之对应的是法西斯主义。

3、道教教导说，自然规律和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最重要的。道家认为，大自然是由对立的事物构成的，和谐来自于良好地平衡了它们的阴阳。这对中国人如何寻求对立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其中，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通常还会加入一些法家思想。直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国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我将简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当然，很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都变得有血有肉，并随着政府的运作方式而演变。

从记录的历史开始，所有这些中国制度都是等级制。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美国人将个人放在首位，而中国人把家庭和集体高于一切。过去的几百年，中国人以父母经营家庭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自上而下，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将集体利益置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孝顺尊重层次结构中的人员，以便系统有序地工作。

“国家”一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符组成，代表着如何看待自己在照顾国家/家庭中的角色，就像严格的父母一样。因此，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政府是自上而下运行的（就像一个家庭），为集体而优化，而美国的方法是自下而上（例如民主）而运行，并且是针对个人的。（这些方法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对立的政策，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至于治理结构的工作原理（即在中央政府的等级结构中谁向谁报告，和如何延伸到与地区和地方政府的互动），这已经演变了数千年，许多朝代都发展了成熟的方法。因为离题太远了，所以我不会介绍这些方法。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存在着一种完善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皇帝拥有负责不同领域的大臣，这些大臣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各省市进行互动，而与此同时，一直以来，皇帝和臣民都有很多争夺权力的斗争。

从地理上讲，中国基本上是被山脉和海洋包围的大平原，人口众多。因此，中国的大部分领土都在这些边界之内，大多数战争是为了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而且都发生在这些自然边界之内，主要是中国人自己之间的战争，不过有时也会发生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

就战争及其哲学而言，传统上的目标是理想地赢得战争，不是通过打仗，而是通过悄悄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使之大于对手的力量，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人们还广泛使用心理学来影响对手的行为以产生预期的结果。[8]

历代以来，中国境内发生过许多暴力战争，尽管在中国境外并没有很多。中国境外的战争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相对实力、安全和贸易，而不是为了占领。学者们认为，中国缺乏在中国以外的显着扩张是因为中国的土地面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其进行控制已经绰绰有余，因为它的资源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更愿意通过隔离保持自己的文化纯洁。与征服并占领其他国家的其他大帝国不同，中国占领遥远的国家相对罕见。传统上，中国人倾向于与境外帝国建立关系，这种方式类似于先前提到的哲学所期望的-即当事方了解自己的位置并据此行事，其位置由其相对权力决定。

例如，如果中国更强大（在该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实力较弱的国家通常会以礼物和恩惠向中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它们通常会得到和平的保证、对其权威的承认和贸易机会。这些从属国家通常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家的管理没有受到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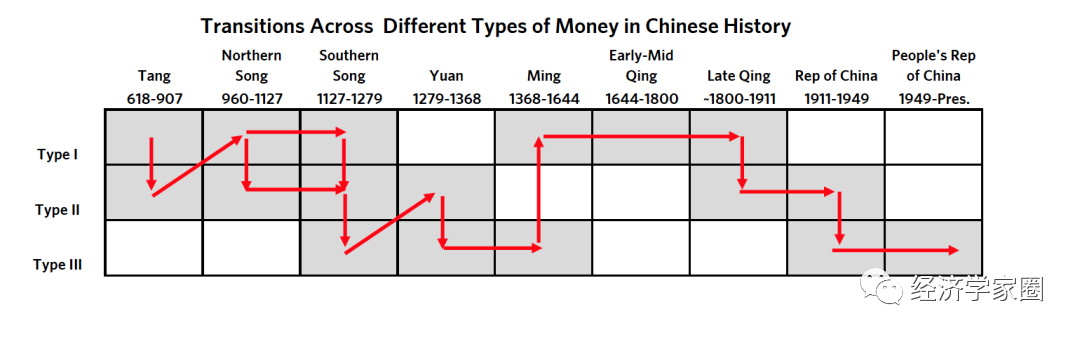
至于中国货币、信贷和经济而言，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经历了第二章及其附录中描述的全部货币/信贷/经济体系和周期，因此，中国与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情况基本相同，尽管确切的时间和方式有所不同。

更具体地说，像在中国境外一样，在中国内部，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货币系统，各种实体发行的货币，所有系统都以我所描述的方式运行。在中国，几千年来最常使用的货币是金属（主要是铜），第二章中描述和债务周期由同样的因素来驱动（即债务创造了购买力，因此提供债务使人们感到更富裕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并被允许增长到远远超过为他们提供服务所需的货币数量，并且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在这些大的债务周期中，有稳定的时期，即债务增长不过度；相对的泡沫时期，债务的增长相对于可以维持的水平而言过高；债务危机时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债务；印制货币为缓解债务危机而印制钞票的时期，这导致了通货膨胀。

在国际上（有时在国内）白银是主要的金属货币，尽管有时也使用黄金。至于经济的变化，主要是从原始农业演化至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以制造业器具划分的经济时代，包括与外国人/野蛮人进行贸易的各种途径（最重要的是通过丝绸之路）。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时会允许私人企业家经营企业，这通常还会产生财富和财富悬殊，导致财富重新分配。这些也以大周期发生。例如，财富创造、分配和破坏方式都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与中国是一个聪明勤劳的社会相一致，有许多技术发明创造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它们以前面各章中描述的典型方式发生。尽管大多数情况都相同，但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趋势有所不同。例如，即使中国在9世纪发明了纸币，但是直到19世纪后期人民币问世之前，使用铜币的传统一直很强。



下图传达了有关中国货币和信贷如何周期行运行的一些信息。正如我在第2章“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的大循环”中所解释的那样，货币系统具有三种基本类型，其中：1）货币具有内在价值（例如金，银和铜币），我将其称为第一类货币系统；2）货币与具有内在价值的资产相关联，即具有固定价值的纸币可以兑换成黄金或白银（第二类货币系统）；以及3）没有任何联系，称为法定货币系统（第3类货币系统）。

正如所解释的那样，随着历史上的每一个缺点变得无法容忍，这些问题在历史上从一个变为另一个。下图显示了这些货币体系自唐代以来在中国历史中的变化情况的极简图。

事实上，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不同地区经常有不同的货币，有时来自其他国家的硬币和铸币（如16世纪晚期的西班牙银币）的变化比图表中显示的要频繁得多。图表仍然具有广泛的指示性，旨在表明它们拥有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基本相同的全部货币体系，最重要的是，硬通货导致了债务问题，导致了对硬通货的抛弃，导致了高通货膨胀，导致了硬通货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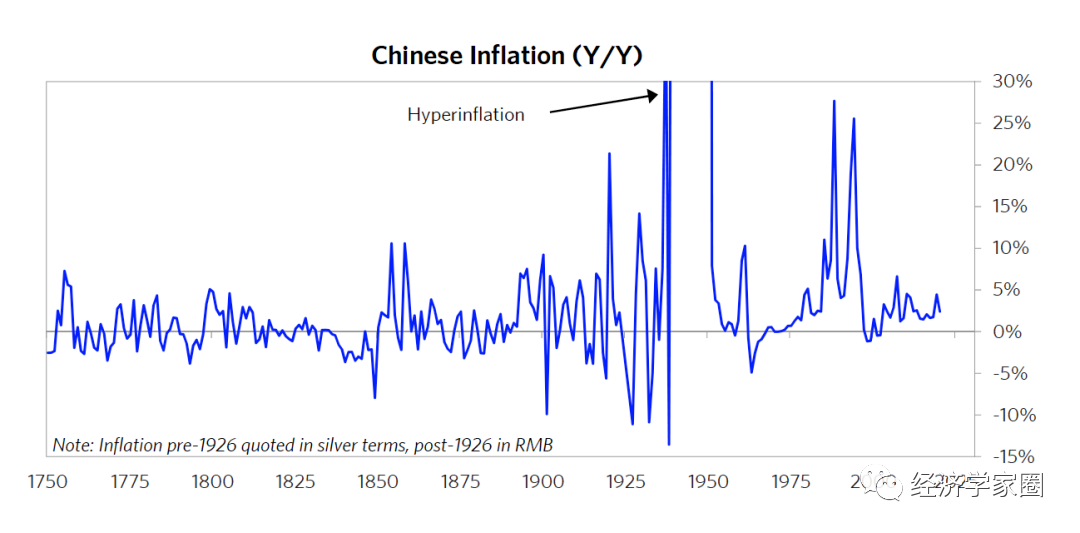
下图显示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追溯到1750年，这反映了货币价值的变化。早期相对稳定的通货膨胀主要是中国使用金属（银和铜）作为货币的结果。与印制中央货币不同，金属按照原始重量被兑换成货币（即一型货币体系）。清朝破败时，各省宣布独立并发行自己的货币，货币由银和铜制成，其价值取决于重量（一型货币体系被保留），这保证了货币价值的稳定，并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期，这些钱也没有出现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债务(承诺交付资金)增长使得传统的债务周期提供资金的承诺远远超出了提供资金的能力，并出现违约问题,这导致了传统金属标准的废弃，金属硬币与银的私人所有权被取缔。

如前所述，货币用于1)国内贸易，受政府垄断控制，可以不受法定货币和虚假货币的影响；2)国际贸易，此时货币必须具有实际价值，否则将不被接受。一般来说，用于国际交易的货币要比较好一些。对一国货币实际价值的检验，是看该国货币是否在与本国相同的国际交易所中被积极使用和交易。当资本管制阻止本国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时，这种货币更容易贬值，这也是为什么要把不进行资本管制作为储备货币的标准之一。因此，一个原则是，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这种货币就会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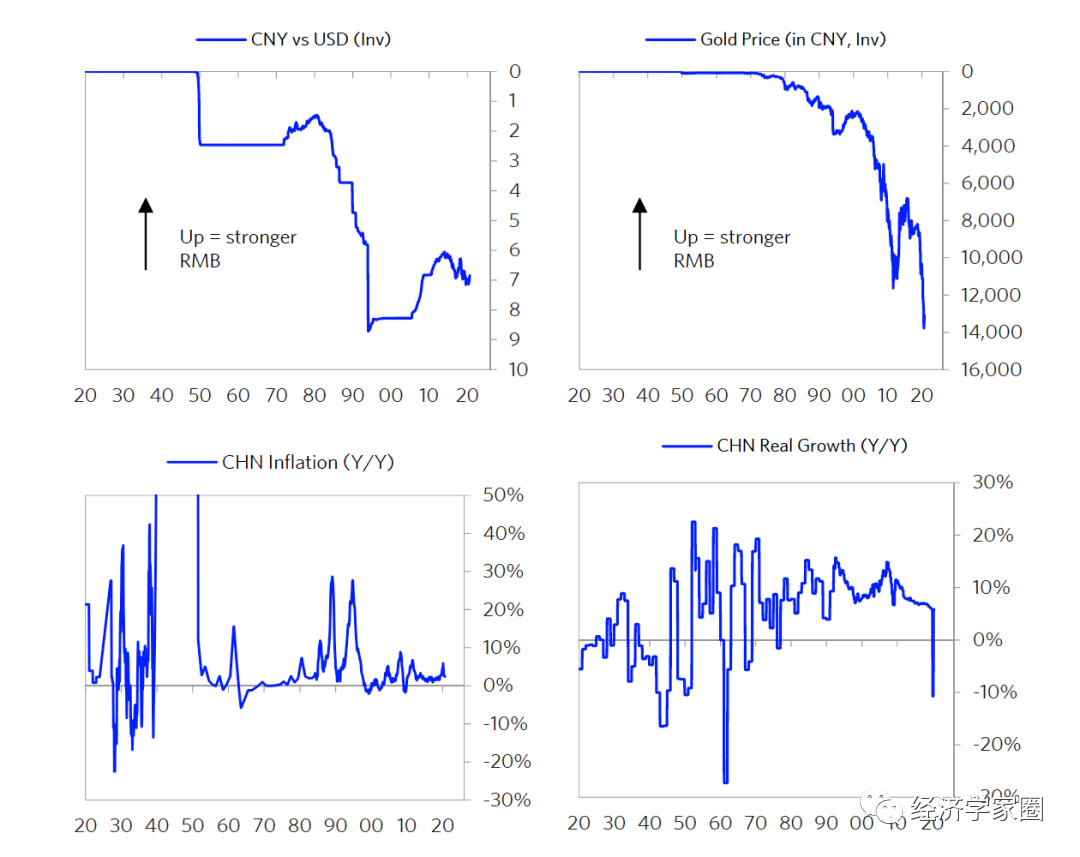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有两种货币，一种是用于国内的法定货币，另一种是用于国际支付的金银货币。在国内使用的法定货币被大量印刷，贬值很多，而且发行这些货币的政府由于内战失败，所能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在图表中看到的那个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记住，作为一个原则，在债务危机和战争期间不要使用法定货币，因为它们会被大量印制以支付债务，这将导致法定货币贬值，并导致高通胀或恶性通胀。

如下图所示，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的动荡之后，1948年12月，第一批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发行，并保持有限的供应，以结束恶性通货膨胀。1955年发行了第二批人民币，1962年发行了第三批。从1955年到1971年，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2.46元。从1972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控制货币和信贷方面做得更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你可以看到另一轮高通胀。它是由1971年全球货币对黄金贬值、全球通胀压力、中国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宽松信贷以及国有企业缺乏支出控制等因素造成的。1996年，中国允许经常项目可兑换，但资本项目不允许。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8.3。2005年，中国结束了与美元挂钩的政策。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自1920年以来以美元和黄金计算的人民币价值，以及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在此之前，汇率的历史非常零散，没有参考意义。正如你所看到的，一共有两次贬值，一次是在1948年建立新汇率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从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贬值，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出口商和管理经常账户赤字，[11] 这导致了那个时期非常高的通货膨胀。如图表所示，1978年前后，增长相对较快且不稳定；1978年以后，增长较快且比较稳定，直到最近由于COVID-19而出现短暂的下降。



**总的来说，市场和经济的漫长而动荡的历史赋予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对于货币、债务和经济的与其他历史一样深刻而永恒的看法。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

**虽然它给了大多数中国人强烈的储蓄欲望和恰当的风险意识，本能地驱使他们保存安全流动资产(如现金存款)和有形资产(如房地产和一些黄金)，大多数中国投资者在股票和风险债务等风险较高的资产方面有经验有限，因而他们在这些领域表现得很天真，但他们学习得非常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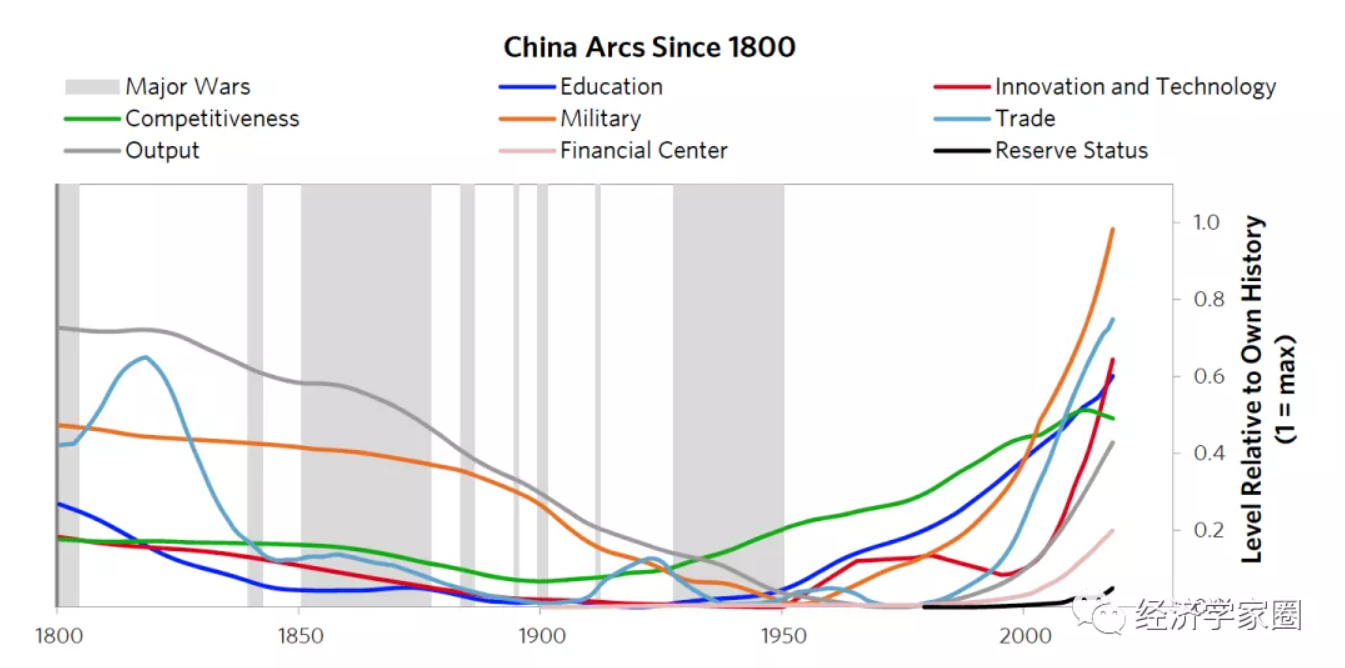
当政策制定者了解货币、信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如何重组坏账时，我发现中国有很好的远见，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回顾中国从1800年至今的历史。

### 4、从1800年到现在

立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我想浅显的回顾一下18世纪后期至今。我们会用20页左右篇幅完成这些。

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下，我之前向你们展示的1800年以来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八项力量的衡量标准。如下图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注意到荷兰、英国、美国的帝国周期经历了上升或者下降，但是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周期是从最初的下降到最近的上升。正如你所看到的，尽管顺序不同，中国和其他帝国的衰落和崛起的背后，有着相同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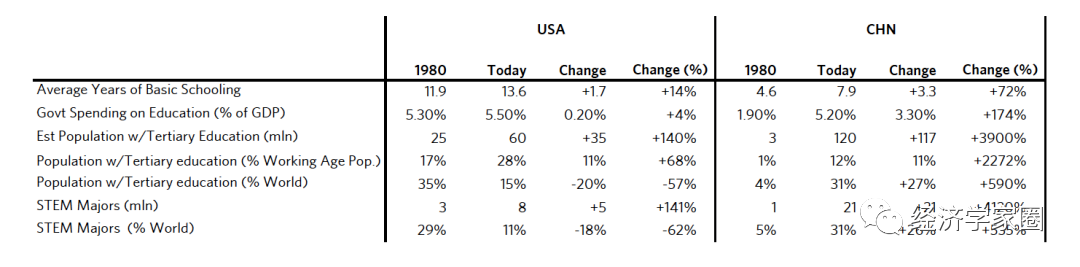


正如所展示的，八大力量有教育、创新和技术、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这八个权力的最低点出现在1940-1950间。从那时起，大多数力量——最明显的是经济竞争力、教育和军事——都在逐步提高，直到198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贸易开始起飞。从那时起直到2008年左右，增长非常强劲，债务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中国，像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使用大量的债务扩张来刺激其经济，债务相对于收入增加了。

2013年以来，改善中国的债务管理,继续创新和发展技术。如图所示，中国现在在贸易、军事、创新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相对实力正在迅速增长。尽管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度经济竞争力，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改善速度正在放缓。与此同时，在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方面，中国仍处于落后地位。

虽然这些指标具有广泛的指示性，但并不精确，因为这些力量都无法精确衡量。例如，就教育体系的力量而言，尽管我们的指数以相当快的速度上升，但它未能完全反映中国的相对进步，因为这一指标是由平均教育水平和总教育水平组成的。下面的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表中显示了这个索引中一些最重要的统计数据。如图所示，虽然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但中国的高学历人口总数明显高于美国。

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总数大约是美国的三倍(见下表)。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平均质量水平并不高，尤其是在大学阶段。例如，只有一所中国大学——清华大学(排名第36)进入了世界前50名，而美国有29所大学。这张图表列出一些指标，这些指标中，中国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但总量高于美国，原因是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较低，中国的总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在很多统计数据中都有体现。这些力量的衡量只是泛指性的，而不是精确的。



### 5、1800至1949的衰退

简单讲，19世纪中国衰退始于a)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走向腐朽与衰弱b）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强大，并且使得本国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显著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活动c)同时，在大量债务无法按时偿付的情况下财政与货币体系失灵，大量印钞导致币值与债券价值迅速崩溃d）大量国内起义与内战相继爆发。[14] 当各种主要力量都开始相互导致衰退时，自1840年持续至1949年的猛烈的大周期衰退开始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多数外籍人士相继离开中国（除了香港与台湾），同时一场在中国大陆的内战最终决定了国内财富与权力的最终分配。

这一长达100多年的大衰退——在中国亦被称为“耻辱的世纪”——是一个由许多典型问题相互交织、逐渐自我导致化衰退并最终导致大周期衰退的经典案例。在这一经典的大周期衰退案例中，后续重新回归上升阶段来自新的领导人重新掌控局面，巩固权力，在继承先人成就后，开始构建新的后续发展所需的初始架构。

从更具体的角度看，在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跨国商贩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和陶瓷销售回国。但是，英国当时并无法提供任何中国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能用全球的通用货币银元来进行贸易。英国人原有的银元储备快速耗尽，并最终导致他们开始尝试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换取用于同清朝进行官方贸易的银元。清朝政府很快开始阻止鸦片走私，并导致了1839-19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科技遥遥领先的英国海军面前，清朝军队溃败并被迫签订将当时中国主要贸易口岸（主要包括上海、广州和香港）交给英国和其他战胜国管辖的一些列条约，并最终导致清朝政府将北部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沙俄，和现在被称作台湾的地区割让给日本。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大规模举债以用于镇压内部叛乱，最终带来了大量的欠款与赔款。特别是b义和团运动（1901年中国人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为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债——约1.7万吨银元——需要清政府长达40年才能还清的债务。西方列强利用自身控制的口岸获取高额关税以保证清政府能偿还债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极度缺乏金融资源的同时，耗尽财政储蓄以镇压频频出现的国内动乱。

当1）清朝政府缺乏领导力，2）金融资源严重不足，3）频繁的国内动乱严重削弱生产力、减少人口、消耗金融资源，4）对抗外部入侵的西方列强再度消耗金融资源并减少劳动力，5）经历一些破坏性巨大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同时出现并相互强化时，“耻辱的世纪”由此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历史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观念——例如，马列主义视资本主义为一种允许企业通过帝国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通过控制和压榨其他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满足资产阶级富人并压榨无产阶级劳动者。毕竟，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这真实的发生在中国；而且1935-1940年的世界也正处在“富有的资本家”同“穷苦的劳动者”之间的激烈对抗中。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同我个人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都是正确的。因为我身处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了我和绝大部分我了解的人，包括全世界的移民在内，巨大的机遇——美国是一个公平也充满机遇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学习、贡献并获得无限制的回报。

我成长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并且一直欣赏并钦佩那些一同拼搏进取、创造价值的人以及那些同员工一起奋斗来实现个人理想并最终造福社会的创业者们。当我从个人视角和他人视角同时审视资本主义时，我意识到开放的思想和充分思考后产生的分歧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这驱使我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让我从哲学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其拥护者。

### 6、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渴望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马列主义，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资本主义者，我需要更好地理解它。这促使我更仔细地研究它，改变了我对它的看法。如前所述，在我研究它之前，我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功能失调的资源分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理论上“各尽所能，需求分配”，但由于缺乏创新和高效的激励机制，无法产生很多产出。我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我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值得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解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的过程促使我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的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物质的（即物理的）存在，并与其他事物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相互作用。马克思鄙视那些与现实没有联系的理论，那些不能产生好的变化的理论。所以我想知道马克思，一个非常注重实践的人，认为哲学只能通过其产生的成功和失败来判断，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完善共产主义的运作方式。

简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产生变化的体系，是一种观察事件演化，并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的矛盾来影响事件发展进程的方式。矛盾促使了斗争，当矛盾被解决，进步就出现了。马克思的意思是它适用于一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中所体现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众多此类冲突中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这听起来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比如，1）矛盾/对立会产生斗争，而产生这些冲突、反思这些冲突并努力克服它们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并且2）“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上。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认为冲突产生斗争，冲突和斗争产生进步，我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即“有”和“没有”）是推动历史的三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你会记得,研究历史之后我相信帝国兴衰背后的三股最强大的力量是1）货币/债务/资本市场周期，2）财富差距/机会/政治周期，和3）挑战现有力量的外部力量周期，这有点类似，不过我相信总共有17个重要因素。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两点是错误的。

用他的话说，或者我的，在1930 - 45年期间这些力量都在下降/冲突阶段的周期里，导致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战争，以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形成了20世纪的格局。马克思所指的这些力量是影响中国的重要事物。正如往常一样，这些衰落的力量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国内和世界秩序开始出现。更具体地说，这场外部战争于1945年结束，随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外国军队离开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中国发生了内战，这场内战在1949年结束，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假设你身处1900- 1949年，想象自己读马克思的著作。你会有所感悟。

就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言，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严格的法家思想都是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注意，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解一个人在等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的重要性，并以指定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所以这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

我将非常简要地概述1949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深入研究中国从那时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阶段。

### 7、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1）1949年到1976年，2）从1978年直至2013年, 3）从2013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简而言之，这些阶段沿这一曲线发生如下：

从1949年到1976年，a）巩固了政权，b）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c）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而中国又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中国借给美国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而中国获得了美国欠中国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以基本稳健的方式悄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2013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它的债务是国内债务）。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加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1930年代。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

####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6年 基础建设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谈及建立一个负责基本服务的政府的实际问题。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之下。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不管一个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报酬。没有基于业绩的薪酬。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行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正如上一章所解释的那样，1945年的世界新秩序将世界分成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以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第三类国家。这些不结盟国家中有许多仍然是殖民地，多数是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如第四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影响北方，美国影响南方，按照三八线划分。美国与联合国一起，对朝鲜的入侵做出了回应，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然后将战斗带到位于中国边境的朝鲜。中国不能让美国在自己的边界或领土上，所以中国必须战斗。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边界上的敌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胜利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不错，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1-2%，获得了约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

1976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和“开放”。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20]并对外开放。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将让中国的经济更强大，只要没有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想要阻碍当时经济疲软的中国的发展, 所以关键是要追求这些方向上获取利益。1979年与美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国需要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由此认识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的，比如，认为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将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不断的对于矛盾的解决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取得进步。政府观念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在进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国富强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改革政府的决策结构。领导团队遵循同样的基本路径, 使中国更富裕, 更强大的通过使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增加中国的贸易和学习其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1984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从那以后，我的直接接触，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事实，影响了我的观点。因为这些互动对与我建立我的观点和帮助你们理解我的观点都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会在相关的时候提及其中的一些。同时，因为我不想失礼，我也不会传递我认为那些给我消息的人不愿意让我公开的信息，而且我也不会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向他们解释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家公司是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学习和试验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在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习惯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因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们根本不了解或无法获得外界拥有的东西，并且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消极的系统中工作。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设备。当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或工作，他们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足够激励，所有企业（包括小餐馆)都是国营，没有财产（如房屋）的所有权，并且就最佳服务和产品而言，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

我很清楚，消除这一障碍只是刚刚开始，这自然会使得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就像水会在没有约束时自然寻求相同的水平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记得我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我的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我们过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长，其背后最大的力量就是开放。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中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的表现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在中国独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制定和实施改革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让他们能去实现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国的加入也有很大帮助。我当时经常听到的明确目标是“打破铁饭碗”，这是指不提供消极的保底就业和确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励性的补偿代替它们。

在具体管理上，决策人员仔细询问我很多细节，比如新加坡机场的运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运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这样出众的成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邀请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贵客在内，我们问他对当时不同领导人的看法、他对过去的伟大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使他们伟大的原因。我们渴望了解他的观点，因为他认识过去50年时间中的大部分伟大的领导人，并且也是这50年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多年来，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1989年，新中国建立第一个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看到许多人把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通过这一切，我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迅速进步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尊重。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可以说，全球化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全球化始于1995年，始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中国于2001年加入。此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涨。2001年，美国与80%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现在，在大约70%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22]

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以极低成本生产的消费品，而中国借钱给美国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先买后付”的交易。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通过持有美国借据以世界储备货币的形式积累了自己的储蓄，而美国人通过借钱来获得所有廉价的东西。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们却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消费品，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借贷条件。对我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举债来为他们的过度消费融资，而中国人更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国家希望通过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务进行储蓄，从而导致新兴国家建立债务资产，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同时，中国不得不应对他们放任其发展的内部债务危机。1991年，债务和经济问题被称为“三角债务危机”。结合对中国环境的实际了解，采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坏账银行”清算，出售和减少坏账）这个方式帮助清理了过去问题，得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开始，从而刺激了增长。

1995年，我带着11岁的儿子马特（Matt）来中国，上了一所当地学校（史家胡同小学）。自从马特3岁起，他就和我一起去过中国很多次。他会跟着我去参加一些会议，在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些善良的人会给他饼干和牛奶。他参加午餐和晚宴，这些都是有趣的宴会。所以马特爱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他的生活条件是基本的（例如，通常每周只有两天有热水）。

那时，学校和中国的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都很贫穷。他不会说这种语言，所以他必须通过沉浸式学习，他做到了。尽管他的学校条件较差（比如，11月下旬才有暖气，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穿着大衣），但我看到了他们有多么聪明和体贴的老师，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优秀的、完整的教育，包括人格发展。

虽然马特的生活方式很艰苦，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到人们的喜爱，比我们富裕的社区里的人要发展的更好。他与他的老师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感情至今仍然存在。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并引导他成立了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基金会，他经营了12年，这让他和我在中国有了更多关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经历。因为我对中国及其前景感到兴奋，所以我也通过我的公司Bridgewater，同时聘请了一个本地投资团队，该团队在当地进行了投资，将美国机构资金投资到对我来说有吸引力的中国企业中。我推进了几年，后来之所以停止，是因为我发现在家中同时运行它和Bridgewater太困难了。我做了几笔盈利的小投资，从来没有要求机构投资者把钱投到那里。

这些经历，加上与我以前认识的中国朋友的经历，使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人，从最谦虚的人到最崇高的中国人，我都非常喜欢并尊重他们。

在1995-1996年间，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人再也不想再处于劣等的军事地位了，因此他们为在该地区作战的军事能力显着增强。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传达a）台湾与中国统一的重要性，以及b）25年前的局势有多危险。

从1978年开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近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六倍多，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长到将近15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为今天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2500亿美元以上）。储备从1978年的年进口量的60％增长到1998年的进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时，外汇储备几乎覆盖了外债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须解决“三角债务”问题（即国有银行因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向国有企业放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债务和公司重组，以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经营和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建立，打击腐败，发展和改善市场以及市场功能。这些以及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变化都是整个过程中重要的进化步骤。我很幸运能与基层组织紧密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例如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这让我有了一种紧密的接触和让我拥有现在的观点。尽管这些事件当时看上去比回顾起来要大，但它们都是致力于中国进步的聪明的中国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我还遇到了腐败和不良行为的案例，以及善恶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和结果。

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如此，当国家领导权没有受到威胁并且新兴国家尚未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特指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特指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除了从学习中获益，他们还从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获益，直到这种方式变得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们认为商品和服务应能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生产，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自由流动，不受其国籍影响，民族主义是坏的，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是好的。2）同时，1978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

随着中国人了解并变得更有能力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他们首先为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之后又为世界提供了高级商品，在此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富裕。其他新兴国家也这样做，世界的范围扩大了，最富国与最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因为最贫穷国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国家的增速放缓。在此期间，该系统几乎使所有人获利了，特别是全球化主义精英们，而且即将到来的威胁并不明显。在此期间，中国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美国媲美，它们共同创造了大多数新财富和新技术，而世界其他地区相对于这些先锋而言却倒退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欧洲是全球最大强国的发源地，但欧洲变得相对脆弱，日本和俄罗斯成为第二大国。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外围国家。印度等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条件改善了，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

#### 第二阶段：2008年之后 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

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泡沫在2008年破灭（如1929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2009年开始上涨（如1933-36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1933-38年）。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1930年代。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

在此期间，中国人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尤其是美国政府机构贷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都没有让持有这笔债的中国人知道美国政府是否会背书。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G20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并同意通过积极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刺激其经济，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债务并要求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贷为其融资。在2009-2012年期间，由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被用来帮助中国和世界经济摆脱疲软，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 成为世界大国的阶段

2013年之后，制定计划的过程包括许多集思广益的会议，讨论哪些政策和计划最合适。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他们就如何应对许多困难和敏感的情况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包括如何应对腐败，过多的债务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有着不同观点的希望帮忙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合作。这些讨论带来的坦率、开放的态度、友善和智慧十分美好。这些决策者显然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即，转向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包括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支持，减少对产生不良贷款的实体提供的保护），必须大力清除腐败，加强法治。

从那时起，我就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财务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们债务的过度增长，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与美国的其他争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研究了事物的工作方式（即因果关系），事物在整个历史中的工作方式，当前的工作方式，并讨论了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您可能已经知道，我相信一切都像具有永恒和普遍因果关系的机器一样工作。这些案例以及处理此类问题的永恒而普遍的原则将如何适用于当前的局势。我发现，当我全面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所有考虑因素时，我几乎总是会奉行他们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为这种情况的机制需要这些对策。我当然最关注经济和市场问题，尽管我们的讨论涵盖了其他问题，例如人性，文化和地缘政治。

就经济和市场而言，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市场和经济，控制和管理债务增长，更灵活地管理货币，特别是在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行业中支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建立由发达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明智法规，在未来的技术和行业中建立其能力，扩大经济利益，从而将其扩展到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和人民那里，控制环境污染。

它完成了许多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工作。尽管如此，一些人是不这样认为，这是因为a）它们在其他措施收紧的同一时间出现，b）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不及一些人的预期，c）中小型企业的某些支持（例如信贷可用性）不如大型国有企业那样好（这更多地涉及到中小企业赚钱和获取贷款的挑战，以及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意图的减少）d）中国不允许某些外国公司以与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相同的条件开展业务，e）与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实现其目标。

但是，提出批评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也不了解影响其决策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如何权衡，这是最主要的批评原因。多年来，我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与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多次讨论，从这个信息充足的角度来看，可以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能比大多数非中国观察者对中国人在经济和市场上的成就更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待事物，并对关于经济和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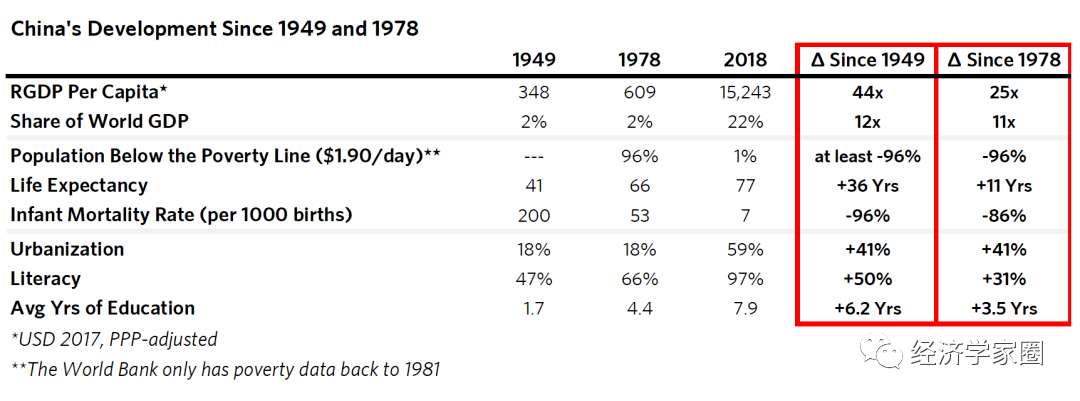
然后，我们爆发了大流行病，经济衰退，大量印刷货币和信贷，并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冲突（最明显的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抗议和骚乱），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当我们总结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值得快速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孤立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改革”的转变，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的影响。a）分别在中国和美国，b）在两国之间以及c）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变化。更具体地说，由于中国开放和改革体制，向外国学习，获得外资和吸收资本主义技术，它学到了很多东西，高效的生产，出口和赚了很多钱，借来了很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彻底的改变了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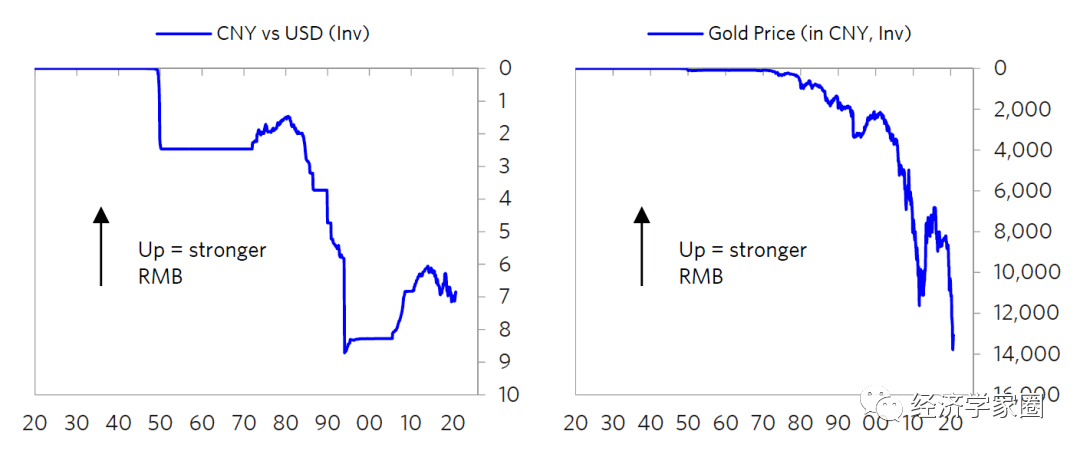
在大多数年份中，这是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经典时期发生的，在那个时期，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与合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10年左右，之后，随着典型的“大循环”的发展，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抗性和保护主义。在过去的40年中，根据我的八种力量衡量标准，中国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过渡到了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

其政策的结果反映在下表中，该表仅显示了一些代表性统计数据。他们和大多数其他统计数据都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人均产出增加了25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96％下降到不足1％，预期寿命平均增加了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大约80％。我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举几乎每个领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中国现在在许多领域显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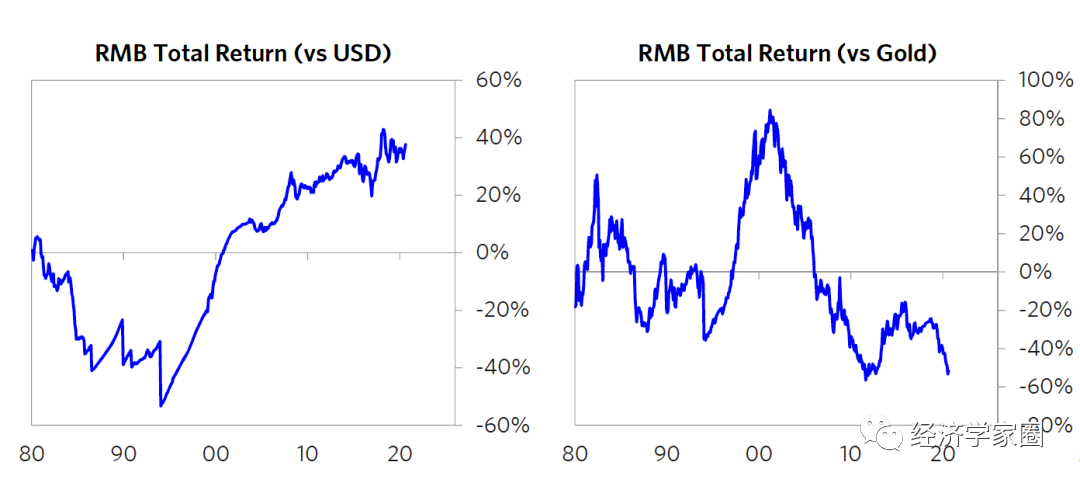


关于货币价值，下图显示了自1948年人民币问世以来以美元计算的人民币价值。如图所示，直到1971年a）美元对黄金和其他多数货币贬值，包括人民币和b）所有货币对黄金贬值，包括人民币。

那时，中国以及美国和大多数货币实行法定货币体系，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初升值损害了出口和经济，从而导致人民币在1980年至1994年期间贬值了83％（或每年约12％），这使这一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上升至7.8％。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一直坚守在每美元8.28元，尽管没有自由交易。2005年7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以一篮子外币进行管理（每美元起价8.11元人民币）。自那时以来，人民币一直有一定的波动，但一直没有跌破2005年的汇率（取消钉住汇率）。左图以美元为单位显示现货价格，右图以黄金为单位显示现货价格。如图所示，自201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一点点（每年约2％），而人民币兑黄金汇率则下跌了更多（每年8％）。



这些现货价格不包含持有人民币的利息收益，而持有人民币本应获得的利率高于持有美元的平均利率，也高于持有从持有黄金的0%利率，持有中国人民币的总回报率高于上图中展示的收益率。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自1980年来中国的利率；图表显示了从那时起以美元和黄金为计价单位的持有人民币的估计总收益。



实施健全的货币政策，建立适用于借款人和贷方的良好信用体系的关键是，使该货币不会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商品和服务价格产生任何大的上升或下降。自1985年左右以来，中国一直在管理汇率和利率。

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9月24日，星期四，我将发布本章的后续章节，内容涉及美中关系和摩擦。与过去的历史不同，这一章讲述了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发现其中一项很有趣，那么您会发现更多。

**万千悲喜，唱罢古今。**